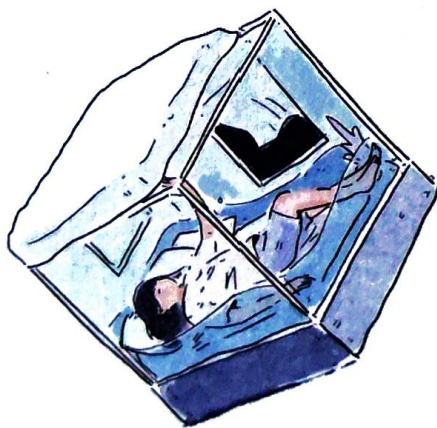


逃走的人

李颖迪 著



文匯出版社

李颖迪

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先后供职于《智族GQ》《时尚先生Esquire》，长期从事非虚构写作，也在试着写小说。



逃走的人

李颖迪 著



文匯出版社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

出 品

从前那种照亮了现在和未来的希望，都到哪儿去了呢？为什么生活才刚刚开始，我们就变得厌倦、疲惫、没有兴趣、懒惰、漠不关心、无用、不幸……了呢？

——《万尼亚舅舅》，契诃夫

THE

LIBRARY

OF

THE

目 录

第一部分

出走 3

隐居吧 9

第二部分

一通电话 35

雪城 45

水母 61

不同的房子 71

倒计时 87

生活实验 97

第三部分

一间公寓	123
------	-----

第四部分

“把坑填满”	149
剧本杀、饭局与猫	161
离开鹤岗	175

第五部分

无人知晓	189
离开的，留下的	201
围墙中的故乡	211
致谢	229

第一部分



出走

《不这样做，我会后悔一辈子！》

早在五年前我就有这种想法，去寻找一处净土，与山川河流为伍，和猫狗为伴，过一种半隐居田园生活。也许我还能在边缘苟延残喘地活着，可我看不到未来，看不见希望。我不知道未知的前路是好是坏，但这是自己选择的路，也只需一心向前，别无他念。

* * *

出发那天，左杰开着一辆迈腾小轿车，车上有睡袋、被子、便携式酒精灯、铁锅、折叠椅。他从武汉出发，四个月里经过重庆、广西、贵州、广东、陕西，翻过层层叠叠的山。白天，他在车外生火，炒土豆烧牛肉，休息时喝一罐啤酒。晚上，车停在省道的服务站、县城小区、超市停车场或者高速路桥下。睡袋放在后车座，里面垫两床被子。他习惯让车窗开一道缝通风，在湿冷的雾气里惬意睡去。

那辆迈腾是他的好伙伴，一路陪他颠沛流离。在湘西

张家界，路上滑，撞烂了大灯。在贵州、云南，山路崎岖，蹭伤了底盘。保险盒和水箱风扇也都坏过。他一次次离开山里，进城修车。

路上，他爱听歌。比如《蜻蜓》：

每当我踩着咯吱咯吱的脚步声，重重嵌入柏油马路的时候，我只希望能够继续做我自己，看着那一颗颗表里不一的心，数着一个个难熬的夜晚。

在无法逃避的黑暗中，今天我又假装睡去，曾令我憧憬得要死的，花花都市“大武汉”。

拎着单薄的旅行袋，我一路向西向西……

在咀嚼到粗糙苦涩的沙尘后，我的正直心被按倒在地。如今才更感到分外深刻彻骨。

啊，幸福的蜻蜓，往哪儿，你要飞向哪里？

啊，幸福的蜻蜓，瞧，正伸出舌头笑着呢。

（他把歌中的“东京”改成了“武汉”。）

他来到了河背山，此山位于安徽六安金寨县，属于大别山山脉。田里是成片的黄芪和天麻，清澈的茶河流淌而过。他在网上看到山上有座民房出租，沿着盘山公路开到半山腰，经过村子，再驶进一条灌木丛遮住的小路。眼前出现一座灰色砖房。院子里有野生的波斯菊、紫苏叶，绿油油的柿子树、桃树。毛茸茸的栗子掉在地上。旁边有块

两三百平方米的菜地，竹林里藏着小溪，用手捧一把溪水，凉意在掌心停留好一会儿。密集的竹林像是一块屏风，四处有“啾啾”的鸟鸣声。

空气干净，水也干净，还有那么多树。他觉得就是这儿了，和房东签下半年合同。

要动手改造的地方不少，首先是房屋。屋顶漏水，院子里杂草长得有半人高。他重新漆墙，用除草剂和镰刀除掉杂草，开荒田地，把土壤调成酸性，播种，用羊粪、牛粪、厨余垃圾堆肥。四季豆发芽后，他砍来竹子搭建架子，让藤蔓往上爬。苋菜被虫子咬了，浇上烟蒂泡过的水。很快，四季豆、青瓜、辣椒都熟了。最近，他忙着在门前挖水潭，想养虾米，他铺上防水布，接水管引来溪水。虾米要是能活过冬天，日后就指望着它们过了。

不速之客有许多。短短时间，蛇来了四次。买来驱蛇颗粒撒在角落。院子后面有个野猪的三蹄脚印。稀奇古怪的昆虫不必多说，最让他烦恼的是山蚂蟥。山蚂蟥粘在马尾草、芭茅草背后，米粒大小，从房子到小溪那一路全是。晴天不能穿短裤，阴雨天更多，穿双雨靴，蚂蟥一路往上爬，牢牢粘着皮肤，吸血后快速膨胀。直到他抓来一把盐，或者滴上风油精和酒，它们才不甘心似的脱落，蜷成一团。

没有热水器，洗澡用电磁炉烧水。平常有条狗陪着。那是隔壁邻居送来的一只黑脸黄狗，五个月大，脾气温

顺。晚上，他用手机放歌，边听边唱，唱很大声。他喜欢听摇滚乐，比如 U2，一支都柏林摇滚乐队。再用竹子搭一座观星平台。他有一套望远镜，能从空中看见木星。等到秋天，拍板栗，摘猕猴桃，种点樱桃和蓝莓，养两头猪。他的梦想几乎就是这样了。

左杰四十一岁，武汉人。他肌肉紧实，皮肤黝黑。三天前，他回武汉处理房子，朋友听说他跑到河背山，说他疯了，不可理喻。从武汉到金寨县的国道，左杰开着车，一边抽烟一边说，其实没有那么复杂。1998 年，他从武汉一所高中毕业，当了五年公交车司机，每天线路一成不变，他仍有心气，就辞职。家里介绍了当兵的机会，去广东湛江当海军。但最后，他还是决定留在武汉——说到这里时，他换上一副惋惜的语气——“人生的命运就是这样，一次决定做错了，一辈子就变了。”

后来，他在武汉电脑城卖电脑，开饭店，然后去电力公司给老板当助理，一干就是十年。公司应酬多，他酒量不行，经常喝到去厕所吐，回来再接着喝。过节时，他去给客户送礼，有时一条烟，有时一箱茅台，有时是一整只羊。项目的开启总需要人情维护，他是负责维护的那个人，点头哈腰，曲意逢迎。“有时候觉得我像个奴才。”

又因为一些原因，他在结婚三年后离婚了。

2020 年初，新冠流行后，电力公司没了生意。此后半年，他和母亲一起待在武汉，没事干，在家里打末日生

存类游戏。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年轻的时候，他当然希望过得好。什么是过得好呢，就是赚更多的钱，有些成就，然后买房，婚后也想过要小孩，过最普通的生活。现在没这念想了。至于工作，在电力公司继续做下去，也不会有变化。如果说有什么理想的职业，他最想当的是动物园园长。不过朋友听了，总说他不切实际，说谁不是做份普普通通的工作活一辈子呢？

现在，他很坚决。城市生活过了二十来年，他觉得没有任何追求。还是换种生活方式吧，必须得上路，再不上路，一定后悔。他辞掉了工作。

他搜到一个叫“隐居吧”的论坛，注册了账号。他不知道哪里有合适的隐居地，在出售农村房产的网站“土流网”和贴吧里寻找合适的房子。他去了重庆，又到广东惠州，看上的地都被租走了，连一块七亩的鱼田都没幸免，还有一个云南的中介说，这里地贵，最好别来。

因此，来到河背山时，他决定停在这里。“没有人打扰你，你才能真正得到快乐。”他说。他在隐居吧里更新着隐居生活。

房子背后是座山，有人养了一大群羊。晴天，成群的山羊散落在草丛里，一半白，一半黑。头羊身上挂着金黄铃铛，走过去叮当响。羊四处跳跃，或安静吃草。左杰戴着草帽行走其中，狗紧随身后。大朵的云如海浪在天上飘。往前是棵古树，三个人抱不拢，标牌上说是棵白果，

树龄六百五十年。地上是踩碎的果子，空气里飘着苦味。

狗陪在他身边，四处嗅，钻入草丛，偷咬狗尾草。

左杰喊了一声。狗很快跟了上来。

隐居吧

我关注这个群体已经有三年了：隐居者、避世者、躺平的人、逃走的人、躲起来的人，我试着找一个称谓概括他们，但每个词都不算准确。

左杰是我在“隐居吧”里遇见的其中一个人。最早是在 2021 年，我偶然关注到了“隐居吧”，百度的一个论坛。在隐居吧，最早的帖子发表在 2005 年，成员昵称为“隐士”，男性偏多，年龄主要在二十岁到五十岁。这是个相当活跃的网络社区，共有六十六万人关注，七百万条帖子，分享着各种形态的隐居生活：在山野上，在桥洞下，以及在路上。初看上去，隐士们的行动多少带点浪漫色彩，符合我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古典想象，也贴合了流浪、避世这些更现代的精神图景。

当时我在一家杂志社工作，做过几年报道，关注社会新闻，观察当代人的生活方式。有一阵子，我相当痴迷隐居吧里的帖子。有人在此推荐隐居的去处，也有人详细记录了自己的隐居生活。当然，也不乏房产中介和骗子混迹其中。

有人为了寻找合适的海边隐居地，研究了中国的洋流规律，最后选择在山东省的乳山银滩买房隐居：

我隐居的地方是一个叫作乳山的小城市，大家口中的那个鬼城。2018年买了一个一百平左右的宅子，二手的，一楼，有花园的那种。有朋友要问了，“你一个**，洋流跟你有啥关系？你也不捕鱼？”海大概可以分为黄水与蓝水，黄水的地方水丑且浑，滩涂淤泥多。蓝水的地方礁石多，沙滩沙质粗。比如青岛的海滩，多是粗沙，大连的海滩多是颗粒状，海岸线都多礁石分布。大城市，大连、青岛、威海，好的海滩地块开发度都高，像我这种城市废柴是没有机会的，就算有也是倾尽所有……最后我就选择了乳山。

这个人自己搭建了放杂物的仓房，仓房外装上太阳能电池板，做光伏发电系统，还打造了一座温室。

还有人觉得世界马上要开战，而像安徽淮南这样矿产枯竭、已经被大众遗忘的城市，将是未来最安全的地方。他以房子为中心探索附近废弃的矿区，寻找水源，取样带回，检测重金属含量。不仅如此，他在家中打造了一个储存仓库，放了六百个罐头、三十箱铁皮装压缩饼干、二十箱矿泉水、一桶油、二十五包盐、三瓶酱油、两瓶醋、八包大米。储物架上还放着各类抗生素和维生素。在卧室门

后，他放了两把野猪矛、一把铁锹，床下还有一袋化肥，如果到了紧急的时刻，这些是他的武器：矛和铁锹用来防身和突围，化肥用来提纯硝做炸药。

贴吧里，很多内容连载几年了，配了图片。我坐在工位读这些故事，常常忍俊不禁。当时我在北京的金台夕照地铁站附近上班，CBD 高楼林立，外立面闪着光。每到饭点，打扮精致、身着西服的人们鱼贯而出，挤满餐厅，吃一份绿叶子沙拉。街上是成排的共享单车，黄色的蓝色的，总是早晨整齐，到下午就倒成一片。不远处的新城国际小区象征着一种更为遥远的生活：双语国际幼儿园门口的长队，在草地上奔跑的外国小孩和边牧，卖碱水面包圈和肉桂苹果卷的面包店飘来香气。夜晚，无数个小小的格子间亮起灯，人行走在高楼的缝隙中，犹如置身海底，有时大雾弥漫，身旁则是飘浮着的光晕。

每次下班，我经过这所有的场景，随后来到金台夕照地铁站坐十号线——这是北京最拥挤的一条地铁线路，每天都有一百多万人被塞进狭窄的列车里。如果碰到晚高峰——通常是下午 6 点左右，天还没黑，我从门口开始排队，长长的队伍要折上好几回。进了地铁站，继续排队过安检，进入闸口再排队。运气好的话，等两趟就能挤上车了。站在屏蔽门前，我有时会想起一则旧闻：正是在晚高峰，一个女人在惠新西街南口站上车，却意外卡在屏蔽门和车门之间，列车启动后，她被夹着带走，随后掉下站

台。我因想象中的恐惧放慢脚步，却被一股无形的力——后面的人流推上来。最终，我平安地挤进了车厢，寻找到一个角落。乘客们低着头，看着手机。因为站得太近，有时不得不窥看到他人的手机屏幕，短视频、玄幻小说、小红书……

那段时间，我的通勤乐趣就是看隐居吧。起初我爱看那些隐居日记，地铁信号不好，加载慢，我想象着隐居者在淮南的储物架，乳山空无一人的海滩，山路上颠簸的小车，音响里的都柏林乐队。到远方去。上路吧。无论如何，这些人在建设自己的生活。我明白这个贴吧为什么有人爱看了，它提供的是故事，也是寄托。在眼前这个如地铁般快速、如晚高峰车厢般拥挤、人人都要费力找到一块立足之地的时代，谁不会被那种将自己抛向无人之地的幻想吸引呢——原野，山峰，河流，还有一间自己一个人独占的房子。

在北京，我和朋友吃着饭，聊到房子。

朋友在南三环跟人合租，室友之间的了解就是租房软件上的介绍：性别 / 职业 / 星座。房子是两居，各自有密码锁。公共空间各享一半：冰箱三层，从第二层的中间隔开，上下一人一半。厕所里，牙刷、牙膏、手纸也保持距离。输密码，回房间，两个合租的人像两个影子进入各自的洞穴里。他们离得如此之近而又毫无联系。隔着墙，互相听见对方拿快递、上厕所，偶尔在厨房看见对方来不及

收拾的碗筷。两年里，他们几乎没说过话。

“有时候真想离开北京啊。”朋友说。

那天我们吃饭排队接近一小时。坐在街边等位时，天光变暗，梧桐快落叶了。身后的餐馆人声鼎沸。看着大众点评上的套餐、优惠券、秒杀，我们接着聊起乏善可陈的工作，兴致寥寥。

谈论工作的意义似乎早就过时了，太热情了甚至显得傻。“工作就是工作。”这才是正确的态度。我们说起工作，说的是绩效和 KPI，不是它的乐趣、意义和自我实现。当时仍在新冠流行期间，它更加剧了某种困顿感和停滞感。但我们其实也害怕真的停下——离开既定轨道，比如辞职了，之后还能找到下一份工作吗？就这样迟疑着，踌躇着，不满意想走，想走又不敢走。明明还“年轻”，按照教科书上的说法，这不应该正是踌躇满志的时候吗？

我聊起了隐居吧。“这些人说走就走了。”就像离群的羊，离开大路，走向了自己的小路。

我决定去见这些人，近距离观察他们。

我想知道，出走后，他们是不是真的得到了期许中的自由。

* * *

也是在那段时间，我读到了美国人奈特的故事。奈特常年游荡在美国缅因州中部的树丛里，独自生活，没有地址，不和任何人接触。秋天他在营地囤积食物，冬天躲进帐篷，忍受缅因刺骨的寒风，直到冬雪融化。他这样生活了将近三十年，直到一次因偷盗被捕。

奈特的新闻在美国引起震动，人们很难相信有一个人致力于完全隔离自己。他被称作“北塘隐士”。记者迈克·芬克尔给奈特写信，去监狱中探访，后来写成《林中的陌生人》一书——

对于奈特来说，最美好的寂静来自夏末热浪来袭的星期三，那时几乎所有的度假屋都空无一人……夜深人静，他离开营地，一直步行，直到林子突然在眼前消失，湖水在他面前荡漾。他脱掉衣服，滑入水中。离水面最近的几英寸水，被太阳炙烤了一天，几乎跟洗澡水一样暖和。“我在水里舒展身体，”他说，“仰天平躺，望着那些星星。”

隐士到底是什么人呢？在书里，迈克·芬克尔将历史上的隐士分为三类：抗议者、朝圣者和研究者。

抗议者弃世，主要因为他们憎恶现实世界。朝圣者，即宗教隐居者，是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总是试图走向精神觉醒，比如坐在菩提树下冥想的乔达摩·悉达多。研究

者则是最现代的隐士，他们寻求独处，是为了找寻艺术的自由、科学的洞见或更深入地了解自我。许多作家、画家、哲学家都被归为这类隐士。比如作家塞林格，成名之后，为了躲避关注和喧嚣，他离开纽约市中心，搬到四百公里外一个宁静小镇上，从此深居简出。在中国历史上，陶渊明正是隐士的完美形象。

美国作家比尔·波特于 20 世纪 80 年代来到中国的终南山，想厘清经过一个世纪的革命和动荡后，中国还有没有隐士。波特的确遇见了一些信仰佛教和道教的出家人，他们在深山里度过了一生，衣食节俭，住茅屋，自行垦荒。后来波特写了《空谷幽兰》一书，引发了近二十年来中国人去终南山隐居的热潮。这些人不认同城市里的高压竞争，希望通过隐居来寻求内心的自由。

很长一段时间，隐居吧似乎将“在终南山上”这样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奉为理想。在隐居吧的一些用户看来，隐居就是前往深山，有一个院子，几亩田地，远离城市的喧嚣，追寻精神的独立和自由。

就像前往河背山的左杰所说，“我向往这样的生活”。

但是，当我在隐居吧中逛得越多，我觉察到，“隐居”二字的含义越来越复杂。2019 年或更早，“隐居吧”出现了一些年轻人，他们选择隐居，并非为某种宗教信仰或修行，动机只与现实密切相关：背井离乡，前往遥远的城市，买一套便宜的房子，不工作，蛰居在家，以极低的成

本生活，又能享受到城镇生活的便利，比如水、电、网、暖气、物流。就像这样一种典型的声音——

“我就打算去鹤岗花三四万买套房，然后靠剩下的钱过了。”

鹤岗，这座城市首先引起了隐居吧里人们的关注。

2022年，中国城市的房子往往每平方米一万元上下——在北京，这个数字是四万（海淀、朝阳等地甚至每平方米九万），上海、深圳也差不多——在城市买房，往往意味着贷款，动辄几百万。年轻人买房等于交出人生的主动权：未来几十年运转于一场数字游戏般的任务，上班，赚钱，还房贷。但向往城市，就不得不挤上这条令人望而生畏的漫长轨道。

而在黑龙江鹤岗，房价低至三百五十元每平方米，一套四十六平方米的住房总价只需一万六千元。

很快就有人行动了起来。海员李海在“隐居吧”和“流浪吧”中发帖记载了他前往鹤岗买房的故事，随后引起大量媒体关注：

“我定下了一套七十七平的房，在六层顶楼，我立刻就签了合同，加上中介费、过户费，总共五万八搞定。我是做海员的，海上半年，休息半年，到哪儿都一样，最重要是有个安定地方。……这几个月我就在鹤岗躺尸。等到12月份，我就出去找船，再工

作半年，以后就打算夏天回鹤岗住，年底冬天出去干活。”（《流浪到鹤岗，我五万块买了套房》，正午故事，2019年11月4日）

隐居吧里的人发掘出更多相似的城市，内蒙古的伊图里河，辽宁的抚顺、阜新，山西长治，河南鹤壁，安徽淮南，云南个旧。这些城市多为重工业起家，曾重度依赖矿产，资源枯竭后，某些地段房价持续下跌，以至于三四万元买一套两室一厅成了事实。在贴吧里，最早一批去这些城市买房的人互称“老哥”。现实生活中，他们是海员、保安、流水线上的工人、建筑工、厨师、发电站的看门人、给仓库搬货的人，大多是体力劳动者。鹤岗、鹤壁、淮南、个旧成了他们口中的“流浪老哥基地”。

《隐居计划》

本人今年二十一岁，在激光切割厂里开机，工资在五千五百元左右，打算一个月存五千，存够三十个（万）就回家躺。

《在广州租了个一千的房子，熬到过年再说。》

工作这几年什么都没留下，只留了一身病。晚上无法睡觉，早上不想上班。身体红灯到极限。一直想逃离这样的生活，一直逃不出来。三十五岁，单身，

城市老光棍，不结婚不交女朋友。等父母不在就回农村生活养老。真心不想在城市打工生活了。

《我也是半隐居状态》

二十八岁，在宁波慈溪这边当保安，每个月四千元工资，每天上班玩手机，下班就睡觉，已经持续一年。我才二十八岁，为什么就想要隐居呢？也许是我没文化，又内卷不过别人。又不愿意去工地出卖体力。还不愿意进厂。流水线跟坐牢一样。****。无所谓了。不考虑结婚生孩子了，这种事情要让有能力的人去生，像我这种人，说难听点是废物，不能给国家创造价值的社会渣滓，就不要浪费社会资源了。

关于鹤岗买房的报道已经是网上的热搜话题。我想不如避开热点，先去个冷门的地方看看。我最初的兴趣地是河南鹤壁。在隐居吧，人们这样讨论鹤壁——有人说，鹤壁山城区的房子也只要三万多，还不像鹤岗那么寒冷。也有人说，鹤壁在京广线上，高铁去北京两个半小时，去郑州四十多分钟，去珠三角长三角都有车，在所有隐居地中，交通方便，进可攻，退可守。“如果在鹤壁隐居，你上午口袋没钱，下午就可以去首都送外卖了。”

有人建了一个去鹤壁买房的微信群，一百多人，都是隐居吧的常客。有人昵称就是“攒钱去鹤壁买房”。已经

入住鹤壁的人在这里分享生活：怎么骑哈啰单车，怎么坐免费的公交，有饭店老板娘自己做的送饭小程序，鹤壁冬天经常断网，最好办个随身 Wi-Fi；暖气也必须提前办好，如果中途外出打工，最好提前停暖。经常有人将街上张贴的卖房广告拍下来发在群里。

除此之外，另外一个热门话题仍是赚钱。

有人会劝新来者去江苏而非河南的工厂，最好去“大厂”。否则，“小厂”的长白班都是一天十四小时起步。

有人分享了自己在郑州一家食品厂逃跑的经历。“我是第一次进厂。”他说得很详细，中介说每天只干九小时，活儿不重，他盘算起码能干三个月。他被分到前端面房，用机器把面切成六七斤的面坯，再推到醒发库。早上 7 点 30 分进车间，10 点停机吃饭，10 点 40 分再开机，做到下午 4 点，最后花半个小时清洁机器。第二天，下午下班，他决定不干了。

他在群里打出很长一段话：

“再干就废了。不是身体废了，而是思想。我觉得进入车间后，你只是颗螺丝，机器转，你也转，一刻不停。你没有言语，没有交流，没有休息，就是麻木地、无感情地跟着机器走。你稍停下就赶不上速度，主任班长立马过来监督呵斥，你只能不断地加快速度。下班后，吃了饭，走在灯红酒绿、车来车往的马路上，你也只是匆匆而过，你不会去商场闲转，不会去衣服店问价，不会进网吧打游

戏，唯一的目标是那张床。唯一的消遣就是打开手机，刷一小时，然后入睡，再起床，洗洗，吃饭，进车间。”

有人劝他去工地。也有人对他的讲述不感兴趣。他的事情可能在大家眼里不算什么特别。

“换个话题吧。”有人说。

人们谈论着进入工厂和离开工厂，谈论着烟花厂、食品厂、服装厂、塑料厂、电子厂、娃娃厂，谈论着比亚迪、宁德时代、富士康。打螺丝，包装纸盒，钉牛仔裤的扣子，看管车床，做“小黄人”玩具，合上 iPhone 13 的手机后盖。

* * *

王浩就在鹤壁买房群里，他也是隐居吧的一员。王浩三十四岁，一米七的个子，戴黑框眼镜，小眼睛，驼背，说话小声，给人一种退缩感，但谈到富士康，他有很多话要说。

这座超级工厂承担了苹果手机七成的生产任务，而它的四十四座中国园区，又以郑州园区为主力。2020 年，郑州富士康全年出口总额三百一十六亿美元，是中国最大的出口贸易公司。王浩的工作地是郑州富士康航空港区，简称港区。港区占地五百六十万平方米，相当于七百个足球场大。来到此地的人第一眼看到的是堪称浩瀚的人

潮——最多同时有二十万人在这里上下班。庞大和渺小，这是富士康给王浩最直接的感受。

通常是在早上6点，王浩就从宿舍出发，站在富士康门口排队了。港区外，道路两侧的人步履匆匆，大部分都穿着白T恤，看着似乎都一样。他就走在这样的人流里。

厂房是栋白色的四层建筑，天花板上有一道道条形的白炽灯，入口是一面庞大的灰色格子储物箱。他换上衣服，进入流水线，岗位职责是给数控机床放料。他把这道工序讲得很详细：流程不难，那个机器是盒装样子的，里面有转盘和十来把圆锥形的铣刀，机器是数码操控的，他一般会搬来两斤重的金属块，让机器铣料。一块料用完再续一块。管子不断流出乳白色的切削液。味道很冲，戴着口罩也能闻到。最后用气枪冲洗雾化后的切削液。

一般来说，王浩上白班，上午8点到下午5点。但他必须主动把自己的时间投进这无止无休的机器。大多数时候他都在加班。“如果不加班，谁来富士康啊？”说到这时是带点玩笑的语气。

苹果发布新品时是王浩和同事最忙的时候。政策要求工人每周休息一天，但工厂有钻空子的办法。不打卡，线长手动记录工时，系统里显示是休息时间，生产线仍在运转。到了下班，停工音乐响起，工人停下来，生产线却在停歇后再次启动。所有人默认回到线上。在流水线，一个环节没完成，产品就无法抵达下一个环节。这是属于富士

康的“休息方式”。上厕所通常给五分钟，王浩会躲在厕所里放空一会儿。

饭后，工人坐在走廊，刷手机，闲聊，躺着睡觉，都是一脸疲劳。每个人都要消磨到最后一刻，才愿意进厂房继续上班，几乎每日如此。

2010年，深圳富士康“十三连跳”。此后，郑州富士康厂区的窗外也装上了绳网。所有窗户封死，不锈钢通风管道呼呼作响。厂房二十四小时不熄灯，通宵照明。那段时间，王浩的时间感模糊了。他常常恍惚，分不清白天还是黑夜，也看不出晴天、阴天和雨天。

有时他觉得自己进入了一种恍惚状态，对外界的感知似乎在走向失控。他怕这样待下去精神就会出问题。

如果身体全然透支，人还能维持健康的精神吗？

似乎毫无可能。但时间久了，他似乎又放任自己接受这种下坠感。

这时，王浩在富士康已经待到第三年。他出生在河南中牟，老家的人种玉米小麦，那里是丘陵地形，没有河流，很少降雨。父亲下煤矿多年，有尘肺。母亲种地。王浩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他度过了平淡的青年时期，读农业大专，选了园林技术专业。他说其实什么都没学会。当富士康在新郑和中牟交界处落成新厂时，二十三岁的他很自然地坐上公交，去参加面试：

站成一排。

做几个深蹲。

伸直胳膊。

握几下拳头。

再抓几下拳头。

短袖遮不住的地方不能有文身、烟疤。

通过检查，王浩进入富士康，三年过去，他手上的物件变成 iPhone 4，iPhone 4s，iPhone 5。不过工资倒没变，还是得看加班时间。他背出一个公式：“一个月扣除星期六、星期日，正常的工作日按照 21.75 天来算，底薪是 1850 元，除以 21.75，再除以 8 小时。我的一个小时就是 10 块钱（10.6321839 元）。”

头两年，王浩觉得，只要勤奋啦，努力啦，按部就班啦，像其他人说的那样，自己就能一步一步往上走。第三年，王浩当了线长。再往上——假如顺利的话，他可以当上个组长、科长什么的，更体面轻松，挣钱更多。不过很快他就明白了，线长是“夹心”，下面要管人，上面要拉关系，请组长喝酒、给组长送礼、帮组长代打卡，还有“义务加班”。你见过那种场景吗？科长和组长站在前面，线长站在后面，忍耐，听着。这种场景上演过许多次。

“他们骂什么？”

“我没法说，真的，我说不出来。”那是一些他没法转述的脏话。

两种选择：继续忍耐，或是等待希望渺茫的升职。

做线长一年后，王浩辞职了。离开富士康后，他和恋爱五年的女友分手。理由既现实也简单：他出不起郑州房子的首付。后来他再没谈过恋爱。他花了很长时间消化在富士康这三年，开始打零工度日，四处游荡，去了宁夏、河南的工地放电线，也在新疆照看过红枣地。这七八年，每攒一笔钱他就休息，一年选两个地方旅游。有时他也回富士康做临时工，组装苹果手机的屏幕和后盖。

“以前的人，有希望，有盼头，但是现在，你知道不管再怎么努力，也没有好的发展，你难免就不再想奋斗了。”他说。他觉得他的生活就这样了。

直到看到日本 NHK 电视台拍摄的“三和大神”纪录片，王浩似乎看见了一个新世界。“我的天哪，居然还有人过这种生活吗？我感觉我够颓废了，可他们竟然会去露宿街头。我再没有钱都会找个宾馆，不可能去外边待一晚上。”

然后，他在手机上看到“花五万元去鹤岗买房”的新闻，随后入群。他看到了隐居吧，最终看到了鹤壁。他向富士康请假五天，从郑州坐高铁到了鹤壁，最快的一班，三十一分钟。

他跟着中介看了一天房。快到傍晚，他想到只是请

假，还着急回去上班，就匆匆订下一套房子。五万块，六十平方米。两个月后他辞掉工作，来鹤壁装修了房子：灰色纹路的木地板，灰色瓷砖，深蓝色窗帘，海尔冰箱，五十五英寸液晶电视机，一张两米宽双人床，乳胶枕，还找人做了一床羽绒的被子，花了一千多。他第一次花这么多钱买被子。

装修完了，他什么也不干，凌晨睡觉，下午起床，一天吃一顿饭，去楼下菜市场买一瓶啤酒和几个小菜。醒来就打开电视，有时看电视剧，有时画画。他报了一个线上美术班，学素描、水彩、油画。还有拼图。他向我展示了那些拼图。宇宙、池塘、猫，把上千个碎片拼好。拼图时他什么也不想。

在一张拼图上，一个男孩骑着自行车，背对着世界，身后是辽阔的宇宙。

* * *

直到这时，我仍然是站在一个遥远的地方观察这种生活。也因此，我和这些隐居者交流时经常遇到一些相似的回复：就聊到这里吧；谢谢你的关心，但我不想说；我的生活你也看到了，只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还有——来隐居的人不正是因为有个不想谈论的过去吗？

诸如此类。我很快意识到，约隐居者见上两三面也许

不难，但想有更多接触就容易碰壁。这也不难理解。如果乐于社交，他和她为什么还要躲起来？我渐渐明白，想探寻这个话题就得克服这些难题——如果想要弄清楚这些人性格和生活的细微之处，想找到他们离群索居的理由，就必须试着让他们更多袒露自己。这是个矛盾。

2021年7月，酷暑，我从北京坐高铁出发，两个半小时就到了鹤壁东站，比想象中近得多。到站是晚上9点，出租车穿过高铁站所在的淇滨新区，窗外是万达商业广场，也有标识着“阿里云”“京东鹤壁”的科技园区。夜晚，霓虹灯牌上标语亮眼，“生态、活力、幸福之城”，是熟悉的城市景观。出租车司机三十岁上下，问我去老区干什么，还打趣说，那里的房子比墓地还便宜。

四十分钟后，我到了鹤壁老区，隐居吧里说的便宜房子就在这里。老区的中心是一尊毛泽东雕像，十条街道切分出四方的井格形布局。只要经过五条街，就能从南端走向北端。夜晚，街道冷清，我拉着行李箱走进酒店大门，第二天天亮，从酒店窗户望出去，黄蒙蒙的晨光笼罩着低矮的楼房。

中午，我在一家火锅店等待杨亮。他二十七岁，隐居吧的一员，从上海过来，在鹤壁买房后就没离开过，也不再工作。这是一家自助火锅店，三十元一位，来鹤壁隐居的人常来改善饮食，他也是常客。

火锅店不大，客人不多。一旁的不锈钢盆装着火腿、

蔫了的蔬菜、银耳，没有肉。一个男人走进来。他身材微胖，小眼睛，寸头，肚腩显眼，穿黑色的紧身衣、牛仔裤和运动鞋。他坐在我对面，有些拘谨，不时用手抚摸下巴。脸有些憔悴，尤其是那双疲惫的眼睛——充满血丝，眼眶周边泛出淡淡的青色。来鹤壁生活后他昼夜颠倒，上网，通宵打游戏，看时事新闻。他一般睡到第二天中午才起来。

“如果我没告诉你，”杨亮换上一副认真的语气，“你能看出我之前是保安吗？”

他讲起来鹤壁之前的故事。他出生在江西上饶市的一个村子。父母离婚后，他和外公外婆一起住，读到初中时辍学。十八岁外出打工，第一站是江苏南通。但是，第一份工作——“我不想说，真的，说那干吗呢”——他起初不想多谈。过了一会儿他说，他原本打算靠亲戚，亲戚在菜市场里摆摊卖萝卜饼，他待了几天，觉得还不如自己找份工作。联系上中介后，对方推荐他进电子厂或者去建筑工地拧钢筋。他选了后者，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戴着手套，把钢筋拧成承重墙的框架，再灌混凝土。那个夏天很热，很晒。他对当时的疲倦记忆犹新。“你下了班以后就什么事都不想了，只想睡觉。”

后来他决定去上海看看，也许大城市资源多。他在58同城、赶集网上找到很多机会：会展咨询员、敲excel的文员、平安保险销售。这些工作“做六休一”，休息的

那天他做兼职，游戏代练，打《英雄联盟》，有时去办婚宴的五星级酒店做临时服务生，提前换上制服，给客人们上菜，端盘子。他记得制服虽然看着干净，袖口和胳膊窝却沾满污渍。酒店在上海最繁华的地方，他住闵行，离得远，下班总是赶不上地铁，骑车回家要两个小时。

算上兼职，他一个月可以挣七千元。这是干满一周不休息的收入上限。最后，他去一家淘宝店做客服，有一阵负责客服部，手下管四个人。他一直拿四五千的工资，直到店铺生意不行，他就辞职了。

他很快意识到一切都在重复。不同的工作只是看上去不同，说到底没区别。最初的热情渐渐消退，他开始在上海尝试短暂“隐居”：不工作，不出门社交，住在月租五百的四人宿舍，下楼吃便餐，回来打《刺客信条》和《文明》。他也喜欢上了日本动漫，比如《火影忍者》《进击的巨人》。现实生活充满谎言，真假难以辨认，他觉得动漫反倒更真实。《火影忍者》里，他最喜欢的角色是李。那部动漫里的其他人不是天赋异禀，就是出身不凡，李是剧里唯一的普通人。

他觉得自己可能欠点运气，上升机会不多，不如干脆找一份轻松点的工作，就去了一家航空公司做保安，每月工资五千。新工作符合预期，不难，没压力，不痛不痒，波澜不惊，房屋漏水都算一件大事儿。2019年底，他看到了有人在鹤岗五万买房的新闻。他动心了，在网上看

到了隐居吧，看到河南鹤壁。他开始计划隐居，决定攒到三十万就辞职。

保安工作第三年，他和领导吵了一架。那是件小事，保安队长占了他的网线。但他不想再这样低声下气地和人打交道，又觉得已经攒到十万块，至少够待一阵子了。

吃完饭，我请杨亮带我去家里看看。他说还有个室友，因此不便让我进入。那个室友每月付三百房租，住客卧，待在房间打游戏的时间比他还长。但他说可以去楼下看看。我们沿着鹤壁老区的街道往前走。走到长风路，经过一片灰色的楼房，墙面爬满枯萎的爬山虎，有的玻璃窗碎了，看进去黑漆漆的。地图上这块区域没有名字，当地人叫这里“小角楼”。楼群中有块空地，蔓延着杂乱的野草、玉米秧和南瓜藤。有老人推着摇篮车，或者坐在竹椅上乘凉。不远处火车呼啸而过。

他站在一栋楼房前。就是这里了，他说，他的“隐居地”就在顶层。抬头，往上看，麻雀飞过，天色灰黄。

大多数时间他就待在那间房子。之后他发现视频介绍了他的日常，偶尔出门去菜市场买菜，做一次饭吃两天。后来办法更简单：网购成品料理包，雪菜毛豆肉丝、巴西烤肉或者香辣鸡杂，一袋能吃一天，这样每天生活成本约五块。厨房有一桶大米、一箱大碗面、二十四罐梅林午餐肉罐头、八十包压缩饼干，还有一些固体酒精。这是储备物资，轻易不动。看到东北拉闸限民用电的新闻，他买了发

电机，两块太阳能发电板，装在楼顶。河南发生暴雨，他又连夜买了皮划艇和一套救生衣。做好哪里也不去的准备。台风也好，暴雨也好，做足预案，只为坚守在这所房子。

“你现在觉得鹤壁的生活怎么样？”

“没那么好，但也不坏。”他说。

“一个人的生活真爽啊，根本不用考虑别人。”不过他还是喜欢在网上这样分享生活。最近他买来一只橘猫。他吃速成料理包，还是惦记着给猫买猫粮，喂驱虫药，去菜市场买鸡胸肉水煮给猫吃，又买来一台二手自动猫砂盆。来鹤壁一年，猫胖了，他也一样。猫在水泥地上打滚、伸懒腰、睡觉。冬天，鹤壁老区时常停电。这时能陪他打发时间的只剩猫了。

老城区的地王广场里，服装店正在促销。甩卖，甩卖，最后一天！有人牵着一头梅花鹿，鹿脖子上挂着金黄色的铃铛。胆大的女孩上前摸鹿。鹿耳朵颤了颤。再往前走，我们又到了那尊毛泽东雕像。两个老人穿过马路，双手合十，在雕像下鞠躬。离开城中心，街上人少了许多。路边有座荒废的房子，大门敞开，油漆剥落。

继续往前走。杨亮聊到以前的恋爱经历。说到和女孩的相处，他总是回避我的目光。他说起在上海时尝试追过两个女孩，都失败了。来鹤壁前半年，带着最后试一把的想法，他在网上发帖，说要在上海有偿找个女朋友——他声称有十来个女孩应征。

“我当时选了三个，一个学民族舞的女孩，一个正在上大三，还有一个年纪比我大。我当时在航空公司做保安，然后在工作单位附近，上海青浦区比较偏的地方租了一间房，租金一千六一个月。她们先后搬过来。”

“你知道她们的名字吗？”

“我不知道，我只喊她们‘喂’。”

在他的描述中，女孩对他很亲近。

“你当时和她们一起干了什么？”

“去城隍庙坐了邮轮，吃五百元的海鲜自助餐，还一起去上海迪士尼乐园。”他说那是他第一次去迪士尼乐园，好在不是节假日，人不算太多。

她们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只说自己在一家航空公司上班。“我从来没说我是一名保安，怎么能告诉她们实话？”

关系很快结束了，花去不少积蓄。他提供的聊天记录证实了其中一段经历。他认为绝大多数人生活的最终目标就是结婚生子，他自己也是。他信奉金钱在婚恋里的主导作用。来到鹤壁后，他将更多时间花在网络上，为热点事件发表看法，与人争执，似乎成了一个躲在网络后面的人。

我几次和杨亮交流，聊到有关游戏里的逃跑，现实中的逃跑。眼下积蓄还够他在鹤壁待半年，之后呢，他知道可能还是得回上海打工。攒到三十万，他就打算隐居一辈

子。再往后，他不愿再出门跟我交流了，理由是外面太热，他又是个宅男。

告别杨亮后，我一个人在鹤壁走。离开老区中心，往边缘去，看见一些老旧的厂房，金属管道，封闭的园区，废弃的澡堂，篮球场。早年鹤壁共有十一个矿区，现在已废弃一半。有个矿区被砖墙包围着，一对夫妻看守。我去那里看了看。黑狗叫个不停，鸡关在笼子里，地面泥泞。一座高四层的红色砖楼从中间裂开，藤蔓伸出来，楼房周围是树木、灌木、苔藓、爬山虎。矿井口被封住了，但还是有枝红色的蔷薇从泥土里钻出来。继续往深处走，一座黄黑色的小山，罩着绿色纺织布，底下堆着细碎的煤铅石。我爬上去。空中弥漫着金属的味道。

我想着此前在隐居吧里看到的这些人的生活，这些短暂的一瞥，短暂的交谈，模糊的身影。如果试图回答最初的疑问，那么，我应该走到这种生活当中去。

后来，我去到了鹤岗。

第二部分



一通电话

有一段时间，我很少想到隐居生活的事。那是在2022年的春夏之交，为了应对可能的变化，我和许多人一样，尽力准备物资。我在网上看新闻，搜寻物资攻略，忙于购买番茄罐头、梅林午餐肉、豆豉鲮鱼，还买了一些不易腐烂的肉类制品，比如腊鸡、腊鱼。主食不能少，意大利面、大米，蔬菜则是冷冻的青豆和玉米。还有人说需要备好布洛芬、阿莫西林、纸巾、卫生巾。最受欢迎的东西是可口可乐。时间难熬。我每天给龟背竹浇水，翻土，把根部拨出来，又种回去，黑色的炭泥撒在地上，我再一点点清扫干净。我的勤奋最终导致了两盆龟背竹的死亡。

5月，我迫不及待想出门走走。朋友小吴介绍了一对情侣，刘晓和安曼。两人都二十多岁，原来在北京工作，后来，他们去了海南万宁一个村子生活。他们也乐意我过去看看。

我从北京来到万宁。刘晓开着一辆白色奇亚——安曼父亲留下的老车——到机场接我。我们一路越过高大的槟榔树和椰子树，水坝，墨绿的潭，然后来到一条小路。安

曼的祖宅在路的半途。我住进一个房间。随后是海南雨季，接连下雨，天气变凉，安曼从柜子里找出一件带有雨水味道的大衣。他们养了一只金毛。狗无精打采，眼皮耷拉下来。院子里，甲壳虫被狗玩到奄奄一息。窗外青蛙和壁虎发出交错的响声。

刘晓之前在北京一家新媒体公司。安曼是编剧，因为行业萧条，她大半年没接到活儿了。来海南后，两人都闲着，靠此前的积蓄生活。我坐着他们的车到镇上买菜、拿快递、吃饭、去一家叫作“自由人”的台球俱乐部。台球厅空调很足，卖冰凉的柠檬茶。我们开车去万宁出名的日月湾，在海边坐着。有年轻人开着租来的敞篷车从我们面前经过。刘晓大声打出一个嗝，安曼咯咯笑。

每天早晚，我和他们一同去遛狗，田野里稻谷正香，空中有许多星星，没有月亮，树与树的缝隙间是一条河流。每隔约一刻钟就有一趟动车从高架上穿过，这时河上也会出现一道快速逝去的光亮。偶尔还能连着看到几只萤火虫，如同一些微弱的绿色火把。

不过，当我快待到月底——这对年轻的爱人来这里生活恰好快一年了——两人开始争吵不休。刘晓希望赶紧走，他说再没法忍受海南这无穷无尽的雨，无穷无尽的蜘蛛，还有会飞的蟑螂。他们不认识村子里的其他人。刘晓经常熬到天亮，去厕所冲一个凉水澡，睡几个小时，下午醒来，在电视机前打足球游戏“FIFA”，三天喝掉一瓶

三十元的劣质白兰地。安曼买来几瓶指甲油，没人和她说话，她坐在桌前，把指甲涂成暗淡的绿色或肉粉色。钱快花完，作息混乱，似乎一切都无所谓了，有时，他们甚至一天只吃一杯泡面。安曼经常想，怎么变成了这样？

两人原打算搬去上海，重新找工作，继续在大城市里生活。但这项计划被一再推迟。有阵子真是难熬。客厅里风扇发出沉闷的转动声，狗不知道去哪了。两人默不作声，等待对方开口说话。再到后来，他们决定分开，一个回到北京，一个去了昆明。

我也不得不结束这趟旅途，回到北京。当时新冠还在流行，生活还没回到正常秩序，人们对时间的感受仍然模糊不清。我决定搬家，跟着租房中介看了很多大同小异的老房子，多建造于九十年代，砖红色外墙，种着高大的白桦。有些房子被纳入了新的租房体系：统一的密码锁，统一装修，淡黄或天蓝的墙漆，三层格档的书桌，白色的书柜，白色的床，床头是一幅油画装饰。

我最终租下一个十来平方米的小房间。房子两室一厅，新室友是对年轻情侣，女生在一家教育公司做动画设计，男生在国企。之前在“自如”租房软件的界面上，我看到这样的介绍：男/女，狮子座，动画设计行业。两人像是勤勉、朴素的那类年轻人。第一次在门口见面，男生对我说，女生是河南人，他是河北唐山人。

“不过，我现在有了北京的户口。”他说，“只是没有房。”

我后来和他们交谈不多。男生去深圳出差，离开了很长一段时间。女生两个月后经历公司裁员，每日待在家里。她说暂时打算在家里待着，练习画画，再考虑未来的事情。同样，我们维持着合租者应有的边界感。我的房间挨着厨房，她煮面条，我就待在房间，她端着面条回去，我出来煮水饺，等我回到房间，她再出来打开洗衣机。隔着墙，滚筒的声音微微轰鸣。秋天来了，天凉了，桦树叶子簌簌作响。可能是墙壁老化，窗沿长出一圈黄色的泡沫状黏菌，看起来还在生长。街上人很少，我也不太出门，商场越来越空旷。人们都在等待新冠的结束。

就在这时，我在网上看见一个消息。那是个女生，年纪大约在二十六岁。她从南京出发来到鹤岗，用一万五千元买下一套四十平方米的房子。那原来是间老房子，木头门框都已腐坏。但现在房子焕然一新，她把整间房漆成白色：墙壁、桌子、电脑椅、柜子、厨房台面、阳台，连扫把和猫爬架也是白的。一只暹罗猫趴在墙下。她还在阳台上装了一道拱门。印象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关鹤岗隐居的新闻里出现女性。我有点好奇，躺在床上，看完了她所有的视频。

女生说，她自己设计了整间房子。她反复强调“一个人”“独居”：

因为房子小，我选择拆墙，卫生间本来想加玻璃

隔断，后来觉得太拥挤，决定不做干湿分离，反正不会出现一个人上厕所，一个人洗澡的情况——毕竟我独居；

卫生间装全透明玻璃门，不考虑磨砂，我想在洗澡上厕所时还可以隔着门看见我们家猫；

一个人吃饭，不需要太大的餐桌，所以，我在卧室和厨房中间建了一个拱形半墙，上面放台面当餐桌吃饭。

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居住。她还有五只猫——一只狸花、一只暹罗、一只橘猫、两只布偶。房子前后的对比图让我印象深刻。这种简约的北欧风格吸引了不少人，我也跟着开始想象拥有一套房子的感觉。在北京这当然很难，或许，我想象着，我也可以模仿她。这是我第一次产生去鹤岗买房的冲动。我试着联系她。两天后，女生回复我：可以聊聊，但只能电话。她说长年独居，上次和人见面还是在好几年前。我不知道这句话的真实性。生活在城市里，一个人真能完全脱离人群吗？

我拨通了电话。那是个很年轻的女声。

“你好。”

“你好。”

“请向我介绍一下你吧。”

“南京人，出生于1996年。”

“你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待在家里画画，赚钱。我不太出门。”

尽管此前我已见过一些选择蛰居生活的人，女孩描述的生活依然有其特别之处。她平常的生活必需品依靠外卖和快递。之前两三年，她在安徽租公寓，房租一个月六百块。她通常每月出门一次。那天出门透气，一般会选择傍晚，绕着一条固定线路散步，从小区周边走到超市，路上戴耳机听重金属摇滚乐。现在，她来到鹤岗买房，维系着此前的生活节奏，每天中午起来，做饭，下午打扫一遍屋子，开始画画，陪五只猫，烘焙，做饭——厨具都是白色的，砧板、刀、调味罐、烤箱、打蛋器，优雅整洁。她烤着蔓越莓奶油面包和草莓蛋糕，跟《蜡笔小新》学做奶油炖菜。还是每月出门一次。

我在电话里想象她的生活。如果她说的都是真的——在一个独属于自己的纯白的屋子里，过着干净的、秩序井然的生活，但门外则是另一个陌生世界——一个初来乍到的陌生城市。

“遇到过人口普查吗？”

“遇到一次，然后我也没开门，让他隔着门给我做的人口普查。”

多数时间，女生很安静，等待我的提问。话筒对面的声音很轻，有时显得虚弱。她说刚来鹤岗，还不会用新买的热水器，洗了冷水澡，感冒了。又到周三了吗？她不清

楚时间，她说，因为长期在家，感觉不到时间的变化。

谈到自己时，她频繁使用“普通”：读着普通的学校，学的普通的专业，普通的外貌，普通的体形。“非常普通，不胖不瘦，那种在人群中找不到的类型。”如果说有什么特别的，还是她的生活方式。

“我没有朋友，没有家人，没有亲戚，没有同事，没有老板。”电话中她笑了笑，停下来。

她决心离开南京，来到鹤岗。“到鹤岗，走进的那一刻，我想我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好像，以后的生活就终于自由了。”她以一种自豪的语气介绍鹤岗：超市便捷，还有自助收银，城市很大，还有好吃的喜家德水饺。她打算未来存一些钱，再在鹤岗换一套更大的、带电梯的房子。在网上更新生活日记时，有人给她留言：鹤岗医疗很差，教育也不好，没有山姆超市，也没有盒马鲜生。“房价已经是这里最大的优势，为什么要拿一二线的条件来与鹤岗比呢？”她说。

她暂时不考虑去大城市生活。“我不想过那么有压力的生活，我想摆烂，我想过轻松的生活，我想开启 easy 模式，反正我没有那么高的物欲，不需要星巴克，不需要奢侈品之类的。”电话的最后，她说，如果必须做和人打交道的工作，面包店服务员是个不错的选择——待在家里多舒服，为什么要去自讨苦吃？

比起男性，去一个偏远的地方独自生活，对女性来说

往往困难更多，比如安全问题。我继续在网上搜索，又看到更多只身去了鹤岗的女性。我判断，鹤岗已经形成一些小规模的新群体，女性在其中已经不是少数。

我决定去鹤岗。一方面，我想继续观察这类隐居生活，那么鹤岗始终是个绕不开的地方；更重要的是，我自己也想去待一阵试试，看看我能不能像这些女生一样，也在那里生活一段时间。

出发前，我看到了她的新闻——

近日，一条“女子逃离大城市去鹤岗全款一万五千元买房”的消息引发网友关注，黑龙江鹤岗又一次因为低房价登上微博热搜。当事人赵女士表示，今年二十五岁，职业是画师，原本在南京租房工作，觉得生活压力比较大，了解到鹤岗的生活成本较低后，便去鹤岗买房安家。最让她意外的是，每月只花一千元就能请到保姆，生活质量有了极大提升。据了解，她的工作完全在线上进行。目前，她非常满意自己这次移居决定。（2022年10月21日，《每日经济新闻》）

到了晚上，她的故事已经被大面积传播了，微博、小红书、抖音，各种热搜。短视频、快讯、播客，各种自媒体，都在讨论她。

女子花一万五在鹤岗全款买房，回应来了

在黑龙江鹤岗一万五买套房上热搜！当事人：宅家画画收入过万

一万五在鹤岗全款买房，本想躺平却意外开启幸福生活

沸腾的议论里，她似乎成了移居鹤岗的标志性人物。我问她什么感受，她说她打算躲起来，等这阵喧嚣过去。不久后，鹤岗市住建局的人找到她的地址，敲开门——带着大米，香菇，土特产，问她需不需要帮助。她说谢谢，但没什么要帮助的。透过猫眼，她看着他们翻修了门外的楼道。他们希望她多多宣传这座城市，宣传它对年轻人的友好，宣传它宜居，介绍这座城市正在寻求转型。

但这个女生并不打算趁这些关注度多做什么，她再也没有接受过采访，我也最终没能见到她。那段时间过后，她消失在公众视野，依然拒绝一切访问。后来，我去到鹤岗，走在她提起过的街道，路过那些柳树，有时看着楼房里的窗户，仍然会想到那天晚上的那通电话。

上篇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八章
第四十九章
第五十章
第五十一章
第五十二章
第五十三章
第五十四章
第五十五章
第五十六章
第五十七章
第五十八章
第五十九章
第六十章
第六十一章
第六十二章
第六十三章
第六十四章
第六十五章
第六十六章
第六十七章
第六十八章
第六十九章
第七十章
第七十一章
第七十二章
第七十三章
第七十四章
第七十五章
第七十六章
第七十七章
第七十八章
第七十九章
第八十章
第八十一章
第八十二章
第八十三章
第八十四章
第八十五章
第八十六章
第八十七章
第八十八章
第八十九章
第九十章
第九十一章
第九十二章
第九十三章
第九十四章
第九十五章
第九十六章
第九十七章
第九十八章
第九十九章
第一百章

雪城

当我写这本书时，想起鹤岗，我首先想起的仍是那里的雪和那里的冷。不同于南方，鹤岗的雪蓬松、干燥。最初一两场，雪飘落在街道、屋顶、草地、车窗。雪在路灯下发亮。随后几天，雪慢慢融化。直到一场大雪——用当地人话说——雪“站”住了，此后鹤岗就将一直笼罩在白雪之下。雪逐渐增大，变得残暴，如龙卷风，城市严阵以待，连续的预警，铲雪车、挖机、警车四处劳作，将道路上的雪推到一旁。风中刮起烟雾一样的雪，漫天蔽日。平静时，雪又变得顽固，僵硬，冻住狗屎、烟蒂、人的脚印。街上，人们穿加厚的羽绒服、羽绒棉裤，戴防风口罩，但还是没一会儿就冻得身上疼。随着呼吸，睫毛、鼻孔、口罩里都结上一层薄霜。

这是一座与雪共生的城市。雪成为人们的度量衡，承担人们的欣喜、担忧与烦闷。伴随雪来的是如梦一般短的白日。下午3点，太阳落下，城市就陷入沉寂。这里似乎天然适合过上穴居的生活——正如来到鹤岗的年轻人所选择的生活。

2022年10月底，我从北京出发，带着一件短款羽绒服，两件毛衣，坐上前往黑龙江的飞机。鹤岗在黑龙江省北部，约有八十九万人口。网上能找到这些描述鹤岗的话：“地方政府财政重整”——2021年12月，鹤岗市政府公布取消招聘政府基层工作人员计划，理由为财政重整；“人口流失”——2013年至2021年，鹤岗市区人口减少幅度达17.12%；“资源枯竭”——2011年，鹤岗被中国政府列入第三批二十五座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名单。看多了这些，人们很难不产生这个印象：鹤岗，一个寒冷且遥远的边陲之地。它与俄罗斯隔江相望，没有直达的火车、高铁或飞机，多数去鹤岗的人往往选择在哈尔滨或佳木斯中转。

我飞到佳木斯，拼车到鹤岗，在高速路“南风井”卡口排队、登记信息，看着运送成团草料的大卡车来往，再坐车来到市区。旅途漫长，徒增疲惫，那会儿想去中国哪里都不容易。电话里，一个女人要求我到鹤岗之后得居家隔离。不许点外卖，她说，当然了，你可以吊根绳子，从窗外把外卖拿进来。

最终我在网上找了一间民宿，租金一百元一天，包月一千五，装备齐全，拎包入住。相比这里的房价，民宿的价格算昂贵。后来我才得知，如果有耐心的话，也能在鹤岗找到三千元租半年或一年的房子，但得自己在城里找那些挂着“出租”纸片的房东，打电话就行，至少半年起

租，自带家居用品。

站在楼下，我环顾四周，手心冒汗：黑暗，没有声音，没有常见的电视声、人的交谈声，安静得只能听见自己的呼吸，还有风。小区没有边界，几栋居民楼排在一起，暗淡的月光下，就像西北被风蚀过的石头堡垒。一棵柳树随风婆娑摇摆，居民门前，摄像头闪了一下白光，又暗下来。晚上8点，几乎没有窗户亮灯。我不知道那些楼房里是不是真的还住着人。

后来，我认识了一个在鹤岗生活的女孩。她和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推荐我去买个手电筒。

“鹤岗很多地方都没灯。”她说。她发来一个商品链接。“一块五毛二，便携式迷你工作灯，强光。”

单元楼没锁，我在黑暗中摸索上楼。打开手机照明，墙上盖满了“有证开锁”的红章，一些纸条写道，“由于不清楚户主是谁，给执行防疫政策带来了一定困难。请尽快联系”。也许这些房子已经空置了。这是片棚改区，正是网上最常流传的那些便宜房子，两三万就能买一套顶层的。我输入密码。屋子里干燥、暖和。10月底，鹤岗已通上暖气。民宿是个开间，铺了大理石瓷砖，摆着沙发、茶几。打开水龙头，水有股隐约的锈味。窗外还是一片黑暗，有时传来远处的火车汽笛声。

隔天，天亮得早，我开始隔离生活，无聊时望向窗外。楼房都很像，橙黄色的外皮，六层楼高，一楼不锈

钢阳台上挂着歪歪斜斜的金属“福”字。草地上有少量的雪。远处还是长得一样的回迁房，只是颜色不同：墨绿色、米色、白色，整齐排列的窗口就像积木。到了白天，人们走出家门。中年人，老年人，牵着狗，提着菜，戴着口罩。他们彼此点头，在寒冷的空中呼出热气。楼与楼的间隙很大，很空旷，一些家具被遗弃在单元楼门前，灰色布沙发，生锈的金属座椅。

我开始在网上寻找来鹤岗买房生活的人。我加入一个鹤岗的微信群聊，里头有两百多个从外地过来买房生活的人。线上群聊几乎每分钟都有人说话。一个女生说她开网店，用线上虚拟币交易。她的对白也很简单，“我不出门”。另一个女生，二十五岁，住在南边的“大陆南”小区，她是网络小说写手，最近一边写小说，一边帮人装修。一个女生画漫画，住在松鹤小区，和另一个女生相约晚上一起喝鸡汤，看恐怖片《乡村老屋》。一个女人从佛山过来，带着孩子。群里也讨论外界对鹤岗的关注。随着报道越来越多，一些人将备注改成“不在鹤岗”。

有人不断分享近期的新闻链接：

“鹤岗不是北欧”“鹤岗不是乌托邦”“去鹤岗躺平，无非又是骗你去买房”“2022年新骗局：去鹤岗买房躺平”“五万卖房热潮过后，鹤岗再次沦为鬼城”“鹤岗会重生吗？”

人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低廉的房价将源源不断地吸引年轻人来到鹤岗，从而形成新的活力。

但另一个人说，人们在城市里购房，购买的只是那一套简单的钢筋水泥么？

他接着说，不，人们购买的是希望。“房价走低不可能带来希望。没有希望，这里的房价才会走低。”

还有一个男生说，无论外边说什么，他都要去鹤岗。他来自河北涿州，原来在保定一家直播运营公司做商业代播，但公司快倒闭了，他打算辞职，然后去鹤岗。“我像块橡皮，每天都在消磨。”

他写道：

感觉鹤岗就是那个样子

天黑以后就没有什么生活了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房子里待着

等待天亮

* * *

我决定等喧嚣过去。隔离完，我重新在网上找房子。最初那套民宿过于偏僻，夜路令人心生恐惧。我搜到九州松鹤，一个庞大的回迁房小区，位于鹤岗中心偏南地带，

区分楼房的标牌从A组一直到G组。它交通方便，挨着一间大超市，还有一条宽敞的道路，两侧遍布餐馆。小区没有边界，所有人都能通行。楼房十来层高，线条简洁的粉色立方体建筑，裸露在外的阳台凸显出来，印着“保温”。在九州松鹤，顶楼的房子也是三万到五万元左右。鹤岗刚出名时，房产中介经常向外地购房者推荐这里。群里就有不少人买了九州松鹤的房子。他们另一个选择是处在更南边的兴安台，那里以一个马路转盘为中心，周围的“大陆南”“松鹤B”“滨河南”“光宇”都是回迁房小区。

我重新租的房子在九州松鹤一栋楼的四层。房东是鹤岗一名年轻的警察。他说，鹤岗的人们大多有两份工作——一份体制内，一份体制外。他和朋友开车将我在隔离期间购买的食物送过来，留下一箱矿泉水。和许多地方一样，这是楼梯房，楼道很老，剥落的油漆呈现鱼鳞般的纹路。有房门敞开，老人坐在室内，耷拉着眼皮，漫不经心地瞥向门外。楼和楼缝隙很窄。我的房子还是一个开间，一面墙隔开客厅和卧室，刷了简单的白漆。厨房在阳台，总能看见对面住户正在做的晚餐。墙壁很薄，不时传来过路人的脚步声。

外界看来鹤岗是个偏远之地，但身处其中，我很快确认，它依然按照一个城市的节奏运转。这也许可以解释，比起鹤壁、淮南，同样房价低廉，为什么来鹤岗的人最多。人们依然需要城市感。这里外卖便捷：麻辣烫、麻辣

拌、手撕鸡架、鹤岗小串、喜家德水饺。楼下的大商场，虽然蔬菜种类不多，但网购可以弥补这个缺陷。一个女生说，她时常线上购买鲜嫩的豌豆尖。其余与大城市没什么区别，鲜肉、冻鸡翅、冻鱼、蜜瓜、活着的大闸蟹。附近有包子店、韩国拌饭，水果店卖黑色的冻梨，路边还有冻带鱼摊位。等下大雪，店铺时而关门，那阵子得靠自己储备食物和水。没人用线上打车软件，人们坐公交，或伸手拦出租车。出租车很多。当地人说，一些煤矿倒闭后，工人都转型开出租了。

鹤岗的马路上种着松树、柳树和白杨，各个城区都有一两家鹤岗本地的连锁商超“比优特”或是“一百家”。城市中心的“比优特时代广场”——“B.U.T TIMES PLAZA”——负一层的餐饮中心人声喧哗。人们谈论到鹤岗的种种好处。在人民广场，一名老人说，年轻人在外打工，房租又高，攒不到钱，为什么不回鹤岗呢？他是名老矿工，在鹤岗煤矿待了四十年。他列举旧时煤矿优渥的收入，集体宿舍，集体医院，集体学校。但他的孩子还是在哈尔滨生活。另一个老人指向远处一座高楼，你看，这样的房子，也才十万元一套。街边一对卖炒冷面的中年夫妻说这里节奏缓慢，生活也惬意。从前，人们爱说这是座鬼城，说这里已经被抛弃了。但现在，网上的关注让人们开始改变对这座城市的叙事。

这里娱乐生活虽然不够丰富，但也存在，剧本杀馆、

桌游馆，都是年轻人爱去的时髦场所，还有三家酒吧，分别叫“Everything To Life”“Always Welcome Bar”“DH”，来自同一个商人的决定。“Everything To Life”在一家卡拉OK的一楼，霓虹灯流光溢彩。年轻人在台上唱歌，舞台上装饰着黄色的气球，还有写着“Caution！”（注意！）的彩带。歌声震耳欲聋。门前是一道铁路，晚上8点，拉煤的火车轰隆而过。

有家叫作“奥斯卡”的夜店很时髦，但人不多。年轻的服务员端来带黄色霓虹灯的酒塔。9点后，迪厅放出干冰，昏沉的暗紫色灯光闪烁着。有对驻唱歌手，一男一女，在台上唱《红色高跟鞋》《被伤过的心还可以爱谁》。三个年轻女人登台，她们穿着贴身短裙，跳舞，漫不经心。

后来的日子，我接触到的就是这样一个仍在呼吸、生活缓慢行进的鹤岗。鹤伊公路旁有一家能打实枪的谕霖靶场。许多人会在五号水库那儿钓鱼。郊区有两间马场，鹤岗中产家庭常会在那儿度过亲子周末。鹤岗与伊春交界的地方有一家滑雪场，隆冬之际，一些年轻人会去滑雪，夏天则会露营。人们也可以在鹤岗的电影院里看到卡梅隆的新片《阿凡达：水之道》。许多地方都有公园，高大茂密的树林、清澈的人工湖、游走的水鸭。冬天，公园被白雪覆盖，层层叠叠。鹤岗正试图利用丰富的森林资源来打造新的城市招牌。主干道上有这样一句

话——“鹤岗市森林公园欢迎您”。

在人民广场，正在读初中的男生说他想考哈尔滨的高中。在精酿啤酒馆，两个中年女人正在讨论为孩子买套学区房，以及如何为高考进行相应的教育储备。但她们试图向我强调：鹤岗真的很难看见年轻人了。

为了打发时间，我找到一间爵士舞蹈工作室。店长是两个年轻女生，她们同样在体制内有份工作。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十八岁的男生。他出生在鹤岗，头发染成银色，跳舞时爱穿松垮的长袖和破洞牛仔裤。最近他在湖南长沙的酒吧里学会了打碟。我问他会不会去鹤岗本地的迪厅打碟，比如“奥斯卡”。“去那里会拉低我的档次。”他说。他的梦想是去北京当模特，或者做主播。

另一个二十五岁的女生说，她刚回鹤岗休息了一阵子，打算再过几天去杭州。她听说杭州的直播行业还有机会。此前，她在北京一家在线教育公司，随后经历裁员。她扎着马尾，戴副眼镜，身材瘦削。她仍然在谈论大城市的生活，比如怎么运营小红书账号。说起感情——她说会用一些互联网人常用的相亲平台，比如有个平台的简介写道：三百万互联网、金融、高校、公务员优秀青年聚集地。

“年龄大的男人，恨不得在两天内就把我的信息套完。他们只想搞清楚我到底想不想结婚，想不想生孩子。”她说。

她对未来的想象依然在大城市。她想去杭州买房，如果能攒足几百万。“无论如何，人还是要为自己的未来打算。”她觉得留在鹤岗没有未来。在本地的年轻人里，她的想法算是主流。

另有一个染着黄头发的男生，被他们称为富二代，家境不错，据称在鹤岗有四套房子——两套楼房、一套洋房、一套别墅。

我们去了一家马场。马场不大，在鹤岗北部的黎明屯，远处是荒山。老板是他的朋友。路上他说，鹤岗生活真是无聊啊，之前他买过水母、蝎子、蝾螈、观赏热带鱼、三只猫。除去猫，其余全死了。上个月，他在哈尔滨买下三辆卡丁车。他原本只是想买第一辆，老板问他要不要再买一辆，他同意了，接着又买了一辆，买，买，买。

“但没意思！”他大喊一声，踢了脚路上的石子。

他请我上车，一辆黑色 SUV。从上车开始，他用力踩油门，踩刹车，每个动作都在加速。车在道路上高速漂移，我抓紧安全带。边开车他边说，他二十二岁，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在鹤岗一个单位上班，每天坐在桌前等着收材料，五小时后下班。每月工资两千元，开车上班的油费花掉一千五百元。但他不愿放弃这份工作。家附近有一个研究所，他托人就能进去参观。

到远郊一片田野，我们最先看见一匹瘦削的骆驼，毛发灰白，正在吃草，神情警惕。再往里走，马圈在稀松的

黄土上。黑色白色黄色的马挤作一团，靠近时才能觉察鬃毛下的热气。冬日，田埂荒芜，树林冷清。我们往前走，老板正坐在挖掘机当中清河沟的淤泥，机器轰鸣作响。那是个四十五岁的男人，光头，戴针织帽，有个“9999”结尾的手机号。他在一个学院工作，同时在外面开公司包工程。

老板下车。二人打过招呼，聊起工作，“富二代”开口说：你是什么编？

好一会儿我才理解“编”是指的什么——两人交流事业编、公务员编、市编、省编。老板提到如今日子不好过。男生又说：“我们领导都说，能按时发工资已经不错了。”

老板说，他在这片马场投入三百来万。马场里有十匹马、两匹骆驼。马是他从哈尔滨跟车运来的，都是本地品种，玉石眼，两三万一匹，只有一匹矮脚的棕马是个洋货，叫 Tony。他不太爱买外国品种，说那些马扛不住鹤岗的冬天。他还打算买孔雀、鱼。一只边牧乖巧地蹲在身边。据他说，之前离婚，“可把自己整糊涂了”，净身出户，原来爱玩车，买过路虎、奔驰、宝马，现在都出掉了。他不指望能靠马场挣钱。不过在鹤岗做生意不容易，他提到一些受阻的经历。

“要赚钱还是得去南方啊。”老板说。“鹤岗太穷了，黑龙江倒数第一！”

我们站在温暖的房子里。屋外田野上有只落单的马。

那是老板的第一匹马，一匹棕色母马，被另一匹黑马踩瘸了。它只能独自待在马圈外，俯卧在地，吃身边干枯的玉米秆。老板说，马瘸就相当于被判死刑，治不好，只能慢慢饿死。

离开马场，男生和我坐上车，改道去鹤岗一个别墅区。他在鹤岗没有同龄的朋友——多数同龄人都离开了鹤岗。摩托是他的新爱好，但鹤岗骑摩托的人总共加起来不到二十人。他独自住在两百多平方米的别墅。男生说，好像没什么能带来长久的满足——无论是得到房子，得到工作，得到一辆卡丁车，一辆蹦蹦车，一张弓箭，三只猫，一只狗。别墅有四层，他在每个房间都放上智能音响，包括厕所浴缸前。在家时他总是和音响说话，命令音响放歌、拉开窗帘。三只猫被关在蓝色笼子里，很瘦，毛发稀疏。他打算将猫送给别人。

人们究竟想要什么？他也说不清。“待在鹤岗，没有人听我说话，也没有人需要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毕业后这年，他从一百四十斤长到一百九十斤。别墅区点不到外卖，他就吃速冻的饺子。

鹤岗的人们或多或少都曾与煤矿相关。他的父亲依靠运煤起家，又在煤矿行业收缩前离开鹤岗，去外地开厂。男生说他选择留在鹤岗，因为外界变化太快，而他在鹤岗能轻松拥有一切。但即便如此，他也并不清楚会在鹤岗有什么样的未来。

未来——人们总说这里没有未来。过去已经远离。这座城市不再有太多煤的痕迹，街道上偶尔才会看见被遗弃的厂房和金属管道。

我去了鹤岗的博物馆和图书馆，想看看这里的过去。鹤岗产煤很早，能追溯到1918年。清代，作为“龙兴之地”的东北受到封禁，长期发展缓慢。清末东北解禁，政府推动官方采金，大量采金者和垦荒者涌入。民国初年，有人偶然在鹤岗石头河西岸发现煤苗，开启鹤岗长达百年的煤矿开采历史。虽然时有生产事故，但煤矿带来了繁盛和富足：第一个实现机械化的露天煤矿、第一对现代化采煤竖井、矿区文化宫影剧场的隆重集会、矿务局招待所、煤矿工人疗养院。媒体也记录过那时的兴盛：矿务局年年放鞭炮，两三个小时不停，人们裹着棉服出门看。街上，宾利、劳斯莱斯，8或6连号的车牌，呼啸而过。2012年，鹤岗的房价在繁荣中上涨，城区房价每平方米五千元，同年，鹤岗GDP达到峰值——三百五十三亿六千万元。

但由于煤矿接近枯竭，鹤岗在2011年被国务院列入第三批二十五座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名单。2014年，年鉴里的一份政府报告写道，“即将过去的2014年，是我市矛盾凸显、困难叠加的一年，因宏观形势、产业结构和煤炭行业‘双降’等影响，预计全年生产总值下降百分之十，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百分之四十三。”

煤矿关停，拆迁，一些被改造成公园。有次，出租车司机带我来到矿山公园，我们来到路边，俯视着山坡对面巨大的露天矿坑，树木枯黄，斜坡上，灰色的矿层和雪交织在一起。底部的平地有辆黄色挖机，停着不动，像个景点。附近有家废弃的炸药厂，铁门露出一小道缝。

我试图往里走，但司机拦住了我。“底下埋的都是炸药呢。”他说。

鹤岗房价暴跌的消息首先在“58 同城”上传播开来。2019 年 4 月，鹤岗由于低廉的房价登上微博热搜，越来越多的买房客来到鹤岗。

这种热络带来了商机。梁云鹏是其中一位掘金客。他是一名房产中介，三十八岁。我到店时，他戴着耳机，一台苹果手机摆在面前：他正在接受抖音官方的连线采访。他穿着一件耐克棕色夹克，中等身材，开一辆黑色奥迪。自从鹤岗凭借低房价出名后，他的房屋中介生意蒸蒸日上。他手上一共有一万多套房子，其中五万以下的只有四分之一，一两万元的更少，只有几百来套。最近，由于那位二十六岁南京女生的新闻，更多人涌来了，都想买两万的房子。

“必须要找到更多两万的房。”梁云鹏说，“客户需求最大。”

他们决定去鹤岗那些偏远的角落找房子。第二天，我跟着梁云鹏去鹤岗南部的峻德老城区核实十二套房子的情

况。峻德曾经依傍着鹤岗的四大煤矿之一峻德矿而建立，现在只剩下一些老人在那里生活。在峻德，楼房间距很宽，户与户之间的距离很窄，外表由政府改造过后重新装修，密集，毫无美感可言。楼道里是腌酸菜的气味。有些房子呈现出废弃的景象，霉味浓郁，地上堆着水泥、拆掉的火炉和玻璃碎屑。

梁云鹏举起手机拍照，在租房网站上更新房子信息。不少客人直接通过网络远程买房。他的车座上放着一张新的公证书和委托书，那是一个四川女孩前天通过三分钟的视频电话后定下的房子。

也是他将房子卖给海员李海，卖给那个二十六岁的南京女生，卖给“隐居吧”“流浪吧”的男人，卖给做网络写手、游戏代练、直播、微商的人们，也卖给想要过来抄底的山西老板，上了岁数的南方老人。但这两年，来鹤岗买房的女生更多。

“鹤岗的房子可能代表着一种退路。”梁云鹏说。

至于他自己呢，梁云鹏说，他没什么故事，没读多少书，去北京闯荡过，二十四五岁时，他回到鹤岗，赶上煤炭产业兴旺的时候，那会儿和煤炭沾边的工作都能挣钱。他去给热力公司运煤，每天运五车，两月能赚三万。后来煤炭产业不行了，他就转行做房产中介。在本地的房产中介公司里，他开得早，手头房子也多。不过现在，鹤岗房子出名后，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出现了。有条街都是房产

中介，街边的招牌写道，“鹤岗卖房、直播”。便宜房源还得靠抢。

随后我们回到峻德小区。在电线杆上，我看见这样一则广告——

“收1至3万房子！多破都收！”

* * *

天气预报提示说一场大雪即将来临，气温骤降至零下十度。人们从口音中辨别我来自南方，逐一询问我带的衣服数量，听后直摇头。面馆老板对我说，一定要买条“线裤”，就在时代广场买，越厚越好。我听从她的建议，在时代广场的二楼打折商铺里买了一条线裤，外表类似健美裤，里头是绒毛，紧贴皮肤。从外地来鹤岗的女生们又建议我买长款羽绒服——“至少得长到小腿那儿”。我在网上下一件“270g 鹅绒加厚保暖羽绒服”、羽绒裤、加绒马丁靴、护耳防风保暖口罩、毛线帽子和围巾。快递送至九州松鹤站点，我领着成堆快递盒回来，在暖气充足的屋里换上这些，烘出一身汗。再次出门时，我已全副武装，信心充足。

空气越来越稀薄、干净。夜晚的星星亮得惊人，似乎还能见到微亮的银河。早上，粉色的晨光照在楼上。雪就要来临。

水母

门推开，妈妈，爸爸，亲戚们，还有一个男人——和她相亲的人。她看不清男人的脸。他们还是来到遥远的黑龙江，这间房子——他们在争辩什么，不行，房子怎么乱糟糟的？你怎么能在鹤岗这样过？怎么能不工作？怎么能不相亲？

她从沙发上醒来，声音慢慢没了。是个梦。她不是经常做梦的人。这时刚天亮，光从窗户照进来。熟悉的空间和东西给她安全感。可能正是那些相亲让她无法再忍下去，2021年10月31日那天，她把钥匙扔在鞋柜上，拖着行李箱，从江苏常州的家里出发，坐上去鹤岗的火车。

房子花了六万块，一室一厅。最初她就是听说鹤岗有便宜的房子才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她精心布置每个角落：客厅中间，浅棕色木质岛台放着一盘上个月烤的曲奇饼干；投影仪和屏幕——夏天，她开着投影仪看电影，喝啤酒；插着红色火棘枝的玻璃瓶；两把高脚木质长凳；藏青色羊毛地毯；沙发下正在散发热气的电热毯；挂在墙上的环形暖色台灯——鹤岗冬天严寒、漫长，她觉得暖色的光

能让人好受一点。房子里还堆着箱装矿泉水、盒装鸡蛋、新鲜芥蓝，透明罐装的辣椒粉、黑芝麻、腌鸡粉。靠墙放着一个四开门金属冰柜。厚厚一层碎冰包裹着批发的鸡叉骨，方便面，鸡排，半年前的冻米饭，还没发黑的土豆片，“安井牌”鱼丸。

她在鹤岗生活一年了。之前，她想到未来的生活该怎么过，就买下这间屋子，改成外卖炸串店。这既不用和人打交道，也不难。在鹤岗的外卖市场，最好卖的是“麻辣香锅大胃王套餐”——蔬菜、肉丸、方便面做成的麻辣拌，还有“油炸鸡叉骨”。她就做这两道菜。

每天，她早上10点醒来，打开手机，点“接单”，接着倒在沙发上，到中午12点，起床洗漱，清点前日消耗的食材。直到下午，手机上的电子女声才会第一次响起——“×× 外卖提醒您，您有新的订单。”

客人点了份“大胃王”。她走到厨房。厨房在冰柜背后，是个狭窄的长条形，桌上摆着一口不锈钢炸锅，盛着黄棕色的油。她拿出冰冻的蔬菜，放进锅里水煮，淋上麻酱，一份大胃王就做好了。接着是份炸鸡叉骨。设好油锅温度，下入鸡叉骨，锅里吱吱响起来，中途再翻个面，十分钟完成一单，再把面条或鸡叉骨打包，放在门口。不一会儿传来敲门声。外卖员拿走外卖。剩下的时间，她备菜，将胡萝卜、土豆、洋葱切片，不能太薄，否则会被烫卷。包菜炸起来发苦，最好换成芥蓝。每隔两天，她要熬

一桶酱。玉米淀粉倒进不锈钢锅，开小火，熬成透明的糊。房子里弥漫着令人心安的气味。为了进货方便，她又开了个“多多买菜”站点。外卖员给她送货、取货。她几乎不用出门了。

不过大体说来，她在的区域人不多，通常一天只接到四五单，运气好才有十单。一份炸串大约赚八块，她每月也就赚一千到两千元，比原来上班时少，但也够了。

有时美团的区域经理会打来电话：“能不能想办法提升点单量？”

别人都会弄刷单、刷好评、冲量。她听出来经理觉得她有点不争气。

“要是想赚大钱，我就不会在居民楼里开店了。”她说。

她更愿意轻松一些。来鹤岗前她就是这样想的，独立的空间，独立的生活，不受他人控制的工作，全部由自我掌握的时间。没单时，她躺在沙发上打游戏。她爱打《和平精英》——一款竞技类射击游戏。最近一个赛季（一个赛季时长三个月），她用小号打了七百七十六场，大号打了四百场，平均每天二十把，五六个小时。遇到游戏停服，她也一定要打到最后一刻。之前她尝试玩别的，比如《明日之后》，可她觉得那就和上班一样，上线，打卡，每个任务都要做一遍，三小时就过去了。再说，不充钱就打不过别人。

现在，她躺在沙发上，打开手机里的游戏。屏幕显示：

地面上很多物资，枪，子弹。她捡起一把突击枪，一个防弹头盔，一件防弹背心。有人在旁边捡东西，她跑到另一栋房子，继续找。人影出现了，她瞄准那人的头，四倍镜放大，开枪，拿下第一击。接着出现了另一群人。她投掷烟雾弹，密集的枪声响起，四周传来窸窣窸窣的脚步声。瞄准，射击，独自往前跑。一阵飞机的隆隆声，四周开始轰炸。她来到决赛圈。还剩下最后一人，她被击中了。游戏结束。

她的拇指和食指在屏幕上快速滑行，就像踩着冰刀的运动员在冰面划出弧线。她每打六场就能“吃鸡”一场。“吃鸡”，指活到最后，全场第一。上个赛季，她是“超级王牌13星”。游戏晋升规则是：青铜、白银、黄金、铂金、皇冠，最后才是王牌。平时，她招募固定合作的队友。他们等级相似，都是王牌，信奉相同的战术。玩家战略各不相同。她更有耐心，更谨慎，尽一切可能搜索装备，慢慢进圈，从边缘包到中心。她觉得这款游戏很“公平”，目的明确，竞争直接。“我靠自己也能赢。”她说。由于担心认识的人看见她的在线时长，她用QQ而不是微信来登录。

晚上12点，她关掉外卖后台。午夜后这块区域没有

骑手配送。她躺在沙发上，接着打游戏到凌晨三四点，再开始一个新的工作日。

传来一阵敲门声，是快递员，送来了十三个包裹。

她前两天在拼多多上买了这些——十二元六块的火锅底料（“最好吃的是酸汤肥牛口味，和白菜是绝配，再加点金针菇。”）、九毛八的润唇膏、一块钱的对联、十八元六支的护手霜、十元两双的拖鞋、两元的火棘枝、三元六双的筷子、三块九的六个勺子、十元的绒毛三件套、二十五元的黄色毯子、九毛的猫薄荷球、一分钱六个的红包、二十一元的四十袋玉米须茶。

在鹤岗，她每月花五百块。但她还是要消费。她在淘宝、拼多多、抖音里申请免费试用的商品，龙井茶叶、防静电手套、窗帘、胶棒、挂钩。月卡、优惠券、抽奖、摇钱树、免单、秒杀。这些词语构筑着她的生活。小时候买不到东西，长大了就渴望各种东西，她说。

* * *

我是到鹤岗的第二个月时见到她的。她不愿意对外界透露真名，我称呼她为林雯。林雯，二十九岁，独身，在鹤岗有两套房子，两只猫。她有张圆脸，栗黄色头发，扎着凌乱的短马尾，声音有些沙哑。戴厚底圆框眼镜，时常眯着眼睛。她身着淡蓝色条纹衬衫，黄色亚麻裙，有时穿

深蓝色套头家居裙。林雯说，来鹤岗前，她的生活并不特别。“普通”“平凡”，她喜欢用这样的词来概括自己。

林雯出生在江苏常州边缘地带的一个小镇，镇子很新，满是拔地而起的相同的安置房。小镇四周环绕医疗器械厂、干燥厂。她的妈妈在镇上工厂干活，爸爸无业。她早早认识到家庭给不了她太多。过去二十八年，她一点点失去了对未来的信心：她在村小念书，学费是借的。一个夏天，学校组织去看电影，走在路上，她察觉鞋底掉了，剩下一层皮，只能勉力维持。她很早开始考虑赚钱的事，以批发价买来零食再卖给同学。十二岁那年，村子因修建工厂被填平，她和父母搬到镇上安置房。拆迁只是让他们从平房住到楼房。读中专，出于不挨饿的动机，她选了厨师专业。那时她一周生活费一百元。家在市里最北，学校在市里最南，从镇上到学校，需要来回换两趟车，每趟车一个小时，车费五元，食堂里一份蛋炒饭卖六元，只能找到一点鸡蛋碎。卫生巾，班级里的桶装水，洗澡，都是要钱的事。冬天她舍不得用热水洗澡。她最喜欢上专业课，悄悄把多余的食材囤下来。学鱼香肉丝就能分到木耳、胡萝卜、猪肉，学红烧鱼就能分到鱼，还有麻糕、灌汤包。

成年后，她做过厨师、淘宝的刷单主持、婚庆司仪副手，还在常州和无锡干过两三年的连锁酒店前台，给顾客准备茶点，洗免费水果，卖会员卡。

她很早就意识到，像她的起点——她一直记得，家里

因为拆迁搬到镇上后，没有装修房子的钱，成年以前，她的房间一直是空的，只有一张老床、一台老空调、一个衣柜——这种空空荡荡的画面正像她人生起点的写照。上升太难，她想力所能及过好点。等她开始工作，二十岁，慢慢攒钱买了张灰色弹簧床垫。随后几年，她一点点为自己的房间——那个十五平方米的房间添置新东西，五十元的灯，五十元的二手遮光窗帘，储物柜，《龙猫》漫画墙纸。后来她还给家里买了台冰箱。她一直想，家里要是有台冰箱就好了。不过很长一段时间里，冰箱总是空的。

不提了，她说，提那些过去干吗呢？她躺下来，继续打游戏。

你对未来怎么看？

她几乎没有犹豫——“消磨时间到死。”

“你有长远一些的打算吗？”

“没有。”

“你打算在鹤岗待多久？”

“一直待着不走了。”

“你原来的生活，那些关系，舍掉这一切，你会不会觉得有些可惜？”

“有什么可惜的？”

她好像什么都不在乎，过去和未来，要不要工作，和他人的关系。最好一个人过。她语气坚决，表现出与旧生活分隔的决心。她宁可让《和平精英》、抖音、拼多

多霸占她的生活。

提到刚来鹤岗时，她语气变得轻松起来，暗含她最初对新生活的期许。她趁父母不在家时打包行李，坐上火车，从常州到哈尔滨的硬座，二十二个小时，从哈尔滨到佳木斯，七个小时，从佳木斯到鹤岗，又过了一个半小时。她在座位上待了很久，却不觉得难以忍受。火车窗外是山川，河流，荒芜的平原。她在路上搜鹤岗，在实景地图里看房，在网上买下第一间房子。到鹤岗，她第一次看见那么大的雪。来到新家，雪几乎淹没了阳台。后来三个月她很少出门。气温零下二十度，路滑，四周都是雪。她在家打游戏，每天十几个小时，自己做饭，把火腿肠、丸子放在阳台，过一天再拿出来，用饭铲在雪堆里敲打，寻找那些冻得严严实实的食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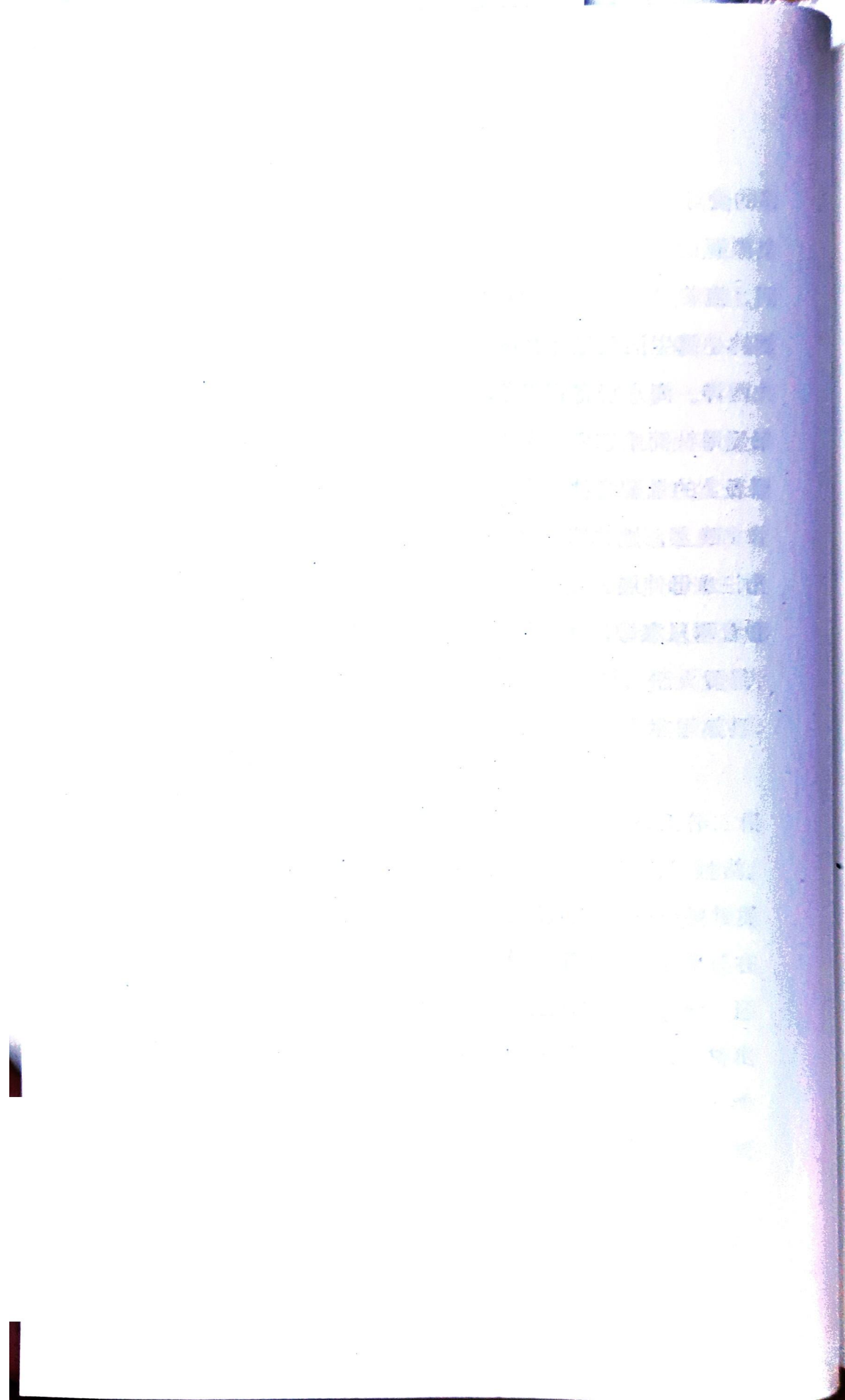
她似乎第一次有了自由的感觉。“终于没有工作、相亲、工作、相亲，还有围绕在身边的那些声音了。”她说。

有天，窗外还在下雪，她在床上躺着，一条短视频提到用矿石颜料画的丙乙烯立体画。她来了兴趣。如果还在镇上，她不可能这样画画，爸妈会问她为什么要画画，还有，为什么要浪费钱？带着快意，她立起一块画板，挤出颜料，加入钛白色石英砂，铺在画板上，再用刀刮出海浪。海是浅灰色，沙滩是深灰色，远处的山是黑色。她画了好几幅海，粉红色的沙滩，蓝色的海浪。她喜欢海。

后来她还买来一个“月光水母缸”。她觉得这是个奢

侈的爱好，很多年前，她在网上看见过一种水母。水母有个漂亮的名字，大西洋海刺，简称大西洋，身体接近透明，拖着一道长长的波浪裙带。水母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她的小镇生活又是什么样子？几乎两个世界。她买来两只大西洋。海水袋寄到黑龙江。大西洋放进月光水母缸，她每天用针筒给它们喂丰年虾卵，每隔三四天换一次水，按照表上的量配海盐，小心翼翼照料。

晚上，她关掉房间里的灯。黑暗中，水缸照着暖色的光，水母伸展又收缩着柔软的身体，像在月光下浮游。她看着两只水母，就像看着新的生活和新的自己。



不同的房子

遇到林雯之前，我在鹤岗还见到了许多人。网上的喧嚣过去后，来鹤岗定居的人开始冒出，有男有女，年龄从二十七岁到三十五岁不等，此前曾是淘宝美工，公司职员，运动用品店前台，酒店服务员，火锅店老板，汽车厂销售。现在，他和她待在鹤岗。有人做游戏代练，开设漫画账号，炒股，挖比特币，开炸串店，做网络音乐，也有人只是待在家里，打游戏，健身，以此消磨时间。在鹤岗见到的人越多，我越难归纳他们社会身份的共同之处。当我和这些人相处越久，越发现他们更像是延续着此前的生活。

我第一个见到的人是 A。她二十七岁，来鹤岗买房生活两年了，和我正好住在同一条街的两端。她身穿长款黑色羽绒服，白色 New Balance 运动鞋，背佳能单反相机。她有许多爱好：汉服，游戏，猫。目前 A 靠打游戏挣钱，主要玩 CS（一款射击游戏），代练，也卖高端游戏装备。作息时间不固定。之前，她一天能打十七八个小时的游戏，一个月可以挣上两三万元。但现在，她不

想再过那样疲惫的生活了。

新开的汉服馆由一间住宅改装而成。老板是个中年女人，正带着女儿一块递小蛋糕，请客人在抽奖箱中拿出纸条。A拿着相机，咔嚓咔嚓，给汉服馆剪彩、拍照。不大的屋子里随处可见年轻人。有人戴银色假发，扮成动漫角色。她们多是本地人，学生，还有几位护士。A和其他人谈论最近流行的汉服款式，也换上一套“小僵尸”造型，在一尊石膏北极熊塑像前拍了些照片。随后她带我来到一家叫作“渔跃”的日料店，点了三文鱼、炙烤牛排、鹅肝炒饭、海鲜炒饭，结账时共计四百六十元。她平常总来这里吃日料，在家懒于做饭，还习惯叫跑腿。休息时间，她在鹤岗寻找娱乐，分别在跑跑卡丁车店、射击馆、水上大世界、水疗按摩中心办了会员卡。来鹤岗后，她学会开摩托车，从网上买来“春风狍狍”，一辆小体形的亮黄色摩托车。后来她还在鹤岗打了水光针。

装扮、说话、生活方式，还有她的房子——从各个方面来看，A依然遵循当下流行的审美。她花四万买下一套房，花三万装修。房子在七层顶楼，白色地砖，浅绿色墙漆，客厅空旷，放了一张白色皮质懒人沙发，花瓶里插着一枝仿真马醉木。靠墙放着小米洗衣机、烘干机。地上有个四千元的石头牌扫地机器人。厕所里有智能马桶，还有浴缸。她在雪景旁泡澡，喝伏特加。卧室桌上是价值三万的水冷散热式电脑主机，还有七只橡皮小黄鸭。每当在游

戏里感到压力时，她就会通过捏这些鸭子来解压。

她捏了一下鸭子。“扑哧。”刺耳的声音把爬到桌上的猫吓跑了。她养了只英短蓝白。窗外视野空旷，远处是连绵的矮楼。月亮正在缓缓上升。

坐在电脑前，她决定搜一部当下流行的电影。她刚看完最近上线的《子弹列车》《新神榜：杨戬》。最后选定了网飞出品的动漫《赛博朋克》。一边播放，一边打开电脑旁的日落灯，墙上出现橙色的柔和光圈。看完一集动漫，她打开另一盏灯，天花板出现一个清晰的月球。这两盏灯陪伴她度过了失眠的夜晚。

长时间盯着电脑屏幕，她眼睛干涩，时常要滴眼药水。每隔三四天下楼丢一次垃圾，两周正式出门一次。她没有固定的工作伙伴，平时依据心情决定打游戏的时长。我看过她打那款射击游戏。她的操作相当流畅，很快夺得冠军。不打游戏时，她看网络小说，刷抖音。后来她在微信群聊里联系上南京女孩的“晚间保姆”。群里称这是“共享保姆”。保姆为她丢垃圾、做饭和收拾家务。

我问她，来鹤岗后，还有没有和此前的朋友联系。

“我之前没有朋友。”她说。

“怎么了呢？”

“打游戏赚钱之后，我就不出门了。”

“那之前呢，比如你曾经的同事？”

“那都是同事，而且，我经常换工作，也没有把他们

当作朋友去相处。”

A 不愿讲太多过去——这是多数从外地来鹤岗的人们的共同点。A 说，她之前做过文员，当过运动专卖店的销售员，然后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创业，欠下一些钱。她被迫开始用擅长的游戏来挣钱。她利用大量时间打游戏，从此开始不太出门，似乎也失去了对人的信任。

“我不想提太多过去的事。”A 说，“我的生活你也看到了，只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此后我仍然经常与 A 一起相约吃饭，逛街，去剧本杀店。但我尊重 A 的想法，不再问及更多她的过去。

我接着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叫花花的女孩。她二十五岁，和妹妹一起来到鹤岗。我们约在时代广场的火锅店。12 月，气温零下十八度。火锅店里暖气充足，这对姐妹坐在我的面前。姐姐化了妆，看起来还是有点疲惫。妹妹十岁，瘦小，黝黑，戴着白色针织毛线帽子。帽子上有个洞。姐姐习惯把那个洞往旁边拉过去，想将它藏起来。

花花从头讲起：她们出生在江西赣州一个村子，父亲一直没能结婚，是当地人称呼的“老光棍”，后来娶了有智力残障的妈妈。妈妈比爸爸小十二岁。奶奶说留个后就好了。姐姐先出生，村里因为家里没有儿子而瞧不起他们。过了十五年，妈妈再次怀孕，又生下妹妹。两年前，爸爸意外去世，妈妈也被送进了镇上的养老院。

妹妹正在夹肉，此时抬头说：“姐姐，你给她讲讲我

们被锁在厨房里的。”

姐姐继续说，父亲去世后，伯伯来家中砸门，拿着铁锹，邻居把她们推到厨房，上了锁，把钥匙从窗户丢到她手上。伯伯在窗外，拿着石头。伯伯、伯母、叔叔，姐姐说，他们想拿走房子，土地，和妈妈的低保补助。

“你是个女的，迟早要嫁出去，他们老这么说。”她说。

那时，姐姐在赣州一间服装厂工作，做助理管机器，每月工资六千。后来厂里裁员了。她从网上看到鹤岗的新闻，觉得房价便宜，能做落脚之地。夏天，她和妹妹一起坐火车到了鹤岗，先安排妹妹读书。妹妹现在四年级，一共转过四次学。

“没办法，因为她必须跟着我。”姐姐用一副母亲的口吻说。

到鹤岗后，姐姐先摆摊卖冰粉，又卖了几个月的山东煎饼。冬天街上人少。下雪后，她察觉，用来做煎饼的鸡蛋、生菜轻易会被冻住。鸡蛋冻得和石头一样，敲不开，用热水淋也不行。现在她停掉了煎饼生意，转去做自媒体，希望能借此获得些收入。

“有时候我也会怨恨，这一辈子是不是就被她耽误了。”姐姐说。

“姐姐。”妹妹说。

“怎么了？”姐姐说。

“我要吃那个。”妹妹说。

“姐姐。”妹妹每说一句话都要先喊姐姐。

妹妹流口水。姐姐拿纸巾给她擦，抱歉地笑了笑。

在鹤岗，我认识了几个与花花有着相似过去的女生：她们出生在农村，自小被家人告知一个女人没有位置，存在的目的是要为他人服务，职责是烧饭、扫地、洗碗、生孩子。她们带着摆脱过去的想法来到了鹤岗。

我也跟几个来这里的男人去时代广场吃了海鲜自助。海鲜实惠，但不太新鲜，盘子里放着扇贝、石头蟹、基围虾，上锅蒸时散发出腥气，他们避开，用手扇风。一个宁夏人首先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他在来鹤岗定居的人里相当活跃，像一个社交枢纽。他二十九岁，身材微胖，寸头，左手戴一款卡西欧手表。他每天都在参加饭局、酒局，唱卡拉OK，有时是和鹤岗本地人，有时是和外地人，开着一辆宝骏保姆车在鹤岗晃荡，闲时在群里问有没有人要帮忙，比如运折扣店的临期星巴克咖啡。

他曾经在银行工作。他这样形容——那时，他在银行做柜员，每天都要开着车走同一条路线。有天他在等红灯，他想，难道要在这里等一辈子的红绿灯？在他的讲述中，那场在红绿灯前的等待就像是某种指引、某种征兆。“我不知道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但眼下这样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他说。他后来开过火锅店，现在投资了一家建筑公司。简单说来，他不缺钱。但他总是觉得，生活里缺乏什么。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来鹤岗的契机，那是

在2021年，宁夏经历一轮新冠，他在家待了二十一天。他抢不到菜，住在城郊的一套房子。邻居有一个果园。此前，他让邻居帮他种了几棵树，有李子、杏、核桃、枣，还种了豆角、黄瓜，地里还有几只鸡。他靠着果园度过了那二十一天。

“当时我就觉得，挣再多的钱又能干什么？”他说，“我又不打算结婚生孩子，那么拼命挣钱干啥？”

他在价格高点期间卖掉了宁夏的房子，通过短视频得知了鹤岗。到鹤岗后，他先租房生活了半年，其间慢慢找房。等房子买好，装修完，他按照严格的时间表生活：早上7点起床，起来看股市大盘，下午3点后开始健身。房子里打造了一个健身房。地板上铺着深灰色泡沫垫，房间中心摆着一套售价四千的大型黑色健身设备，装备齐全，座椅、拉力杆、蝴蝶机、臀力垫、仰卧板。他每天都要做一定数量的力量训练。卧室很小，床头摆放着《乌合之众》《博弈论》《人性的弱点》。他爱好喝酒，喝醉后就在群里唱歌。他的昵称是“抑郁症患者”。

饭局上，另外两个人内敛许多。他俩都三十三岁。其中一个来鹤岗两年，留着飞机头。他来鹤岗后习惯在家打《英雄联盟》，频繁地点击鼠标令他胳膊酸疼，按摩也无法缓解，就去办了健身卡，现在一周去健身房跑几次步。他打算一直在鹤岗生活下去。之前他在深圳打工接近十年，从流水线工人到美工，靠挖比特币存下一笔钱后，就来鹤

岗买房了。房子花了十万，在新街基，鹤岗城中心地带。客厅里摆着布艺沙发，一台七十英寸小米电视机。电视上正在播放《第11号站》。来鹤岗后，他还买了辆全新的别克白色轿车。他觉得现在生活算是舒适。

最后一个人也是三十三岁，娃娃脸，穿淡蓝色衬衫，戴方框眼镜。第一次见面时，他很少说话。后来我和他单独见面，他才慢慢讲到过去的事情。他曾是惠州比亚迪工厂的技术工人，来鹤岗买房生活两年，不过房子现在还是毛坯。他住在松鹤B，那也是个大中型回迁小区，楼房多为六层。他用两万买下一套房子，两室一厅，呈阁楼型，挑高约四米，客厅狭小，贴着蓝天白云墙纸，边缘显露出水泥缝隙。客厅有一台茶几、电视柜、沙发，卧室放着电脑桌、一张床、一个简易编织衣柜。他说这些东西一共不超过一千元。

“哪有什么装修呀。”他笑了笑。

他在比亚迪汽车厂待了一年半，直到和领导的一次争吵。新冠发生后，2020年11月，他在百度上看到鹤岗的新闻。他很惊讶，房价那么低，就辞职来到鹤岗。临行前，他带上一盒老照片，有他幼时的照片，父亲生前和母亲的照片，一些家庭合照。现在，那盒照片放在客厅一张收纳式椅子里，他不会轻易示人，像是在捍卫什么。

决定去鹤岗后，他带走所有的照片，所有的记忆。他第一次坐飞机，从湖南衡阳到北京，中转到佳木斯，再到

鹤岗。他回忆那种感觉，不是紧张，也不是兴奋，像是背水一战，一种不安的感觉。

“如果鹤岗都留不下我，那我还能去哪？”他说。

他很难形容来鹤岗前后两种生活的差别。他认为，此前，有关生活的决定虽然都是由他做出来的，在中山、惠州的各种流水线上，在电器市场做维修马达、电机，做什么，去哪座城市，到哪家工厂，和谁谈恋爱，身上没钱，就去打工，打工赚钱，又花光，继续打工。可能这些选择只是出于惯性。去鹤岗，也不能说他就此自由了，要看怎么定义“自由”——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他停了下——自由是不想干什么就不干什么。但他又换了一个说法，也可能人生都这样，还能烂到哪里去？不是对生活失望，只是有时人不得不很早接触一些事情，比如，他现在都不清楚父亲的死因。

买完房子，他把剩下的两三万存款拿去股市。到2022年，钱在股市中消失。他找“借呗”贷了两三万。现在，他每天8点醒来，10点起床，看一眼股票，打两个小时《英雄联盟》，再打四个小时《地下城与勇士》，做饭，睡觉。他一周出门买一次菜。一个月的生活支出在三百元左右。现在没钱，他就吃炖白菜、炒白菜、腌白菜，另一些时候吃炖黄瓜、炒黄瓜、腌黄瓜。鹤岗的暖气费一年两三千元。他停掉了暖气，楼道里的管道被暖气公司堵上一团抹布。

房子里有些冷。我们坐在沙发两端，蜷缩身体，搓着手。

卧室的电脑发出嗡嗡声。下午4点，到了打《地下城与勇士》的时间。

他来到卧室，坐在桌前，熟练地操作着键盘，用一分钟打完一次副本，收获二十万金币，等同于三毛人民币。那是款2008年的网页2D游戏，现在还有大约二三十万玩家。游戏里，他的身后跟着一只宠物，叫“落寞的小跟班”。一下午，四个小时，打七百万金币，能换五十元。

这时，他说到周星驰的电影《大话西游》。“我觉得我活得也好像一条狗。”

没有朋友、伴侣、家庭、工作，几乎切断了所有社交关系。“出意外怎么办？”

“那我早就想到了。”他在网上搜索遗体捐赠，报名后填写身份资料，收到一张卡。网页上写道，遗体捐赠后，志愿者的身体将被送去研究，利用剩余价值，最后火化，葬入公共墓地。这样就够了，他说。

我想到此前见过的那些房子。A家里的全套浴缸、马桶、扫地机器人、窗外的雪景、伏特加，当拒绝与外界过多来往后，家似乎成为她最后的领地，最后的堡垒。她对房子的装扮无处不在透露这样一个信息：一切为“我”所有，一切为“我”而存在。我还见过一个男人在客厅沙发上放着硅胶娃娃，这两年来“她”坐在同一个位置，没

有挪动，他靠着“她”一起看电视，打发漫长时间。宁夏男人家里繁杂的健身器械——来鹤岗之前你过着什么生活，到鹤岗后，你大概率还是过着那样的生活——他对我说。而现在，我坐在这个人家里，一间切断暖气的毛坯房。“我在放弃多余的一切。”他这样说。即便都选择来到鹤岗，人们的生活依旧如此不同。我很难说清其中的某些残酷性。

* * *

在比亚迪工作的男生向我介绍了林雯。他曾帮她修过柜子，两人见过几次。我忽然意识到，林雯曾在网上推荐我买手电筒来应对鹤岗的黑夜。最开始，我问她是否愿意出来一起吃饭，她说自己是“死宅”，不想出门。这次，通过男生的介绍，我们约好去林雯的炸串店吃火锅。也许听说我已经在鹤岗生活了一段时间，林雯才同意与我见面。

第一场大雪过后不久，我坐上出租离开市区，车往前开，经过高大的牌坊，一座煤矿，来到鹤岗南部。一旁的河流像是冰冻的缎带。林雯的住处离市中心大约二十分钟车程。小区楼下，我看到“炸串小吃店”的招牌，进入单元楼，一层，不锈钢门开着一小道缝。我敲了敲门。

林雯走出来，穿着薄薄的黑色长袖，卡通睡裤，微

胖，圆脸，刚刚染过的栗黄色头发扎成了一束马尾，文过眉毛，涂着口红。

“你快进来。”她说。

她比我想象中要热情许多，接着拿来柿子、脆苹果、瓜子。男生更早一些到，正躺在沙发上。

“我平常就躺在这里。”林雯指着那张宽敞的沙发，“够躺三个人了。”

她把沙发上的电热毯和被子掀开，让我赶紧坐上去。她还在忙活火锅的食材，豆腐、鱼丸、猪血（人造鸭血）、菠菜。“你别看东西多，其实都是些豆腐啊、猪血啊。”林雯说，“我这里没有肉吃。”她又去炸了一点鸡叉骨，厨房传来油锅的吱吱声，很快是一阵鸡肉的香味。

我环顾四周。这间炸串店很干净，浅色装潢，储物架上的瓶瓶罐罐，切好的胡萝卜片和芥蓝，那盘像风干炸鸡的曲奇，都给人一种充盈、安心的感觉。墙上是她刚来鹤岗时画的那幅绿色大海。阳台和客厅用一张塑料布隔开。屋外正起风，风声呜咽。屋内保暖不好，她让我和男生盖上被子，开了电热毯，从音乐软件上调出“咖啡馆歌单”。在钢琴曲中，沙发背后，环形灯散发出暖洋洋的光，我很快忘记了窗外的寒冷。

聊天就从这间小店开始。当我亲眼看到这间店，我还是很难想象林雯是怎么独自搞定这一切的：一个人跑到陌生的地方，跑营业执照，跟工商消防处理关系，夏天她把

手续跑完，一点点置办店里的东西。装修房子，为了进货方便，她在网上搜索开店教程，研究开美团外卖和“多多”站点，接着学菜谱，比如怎么做麻辣拌。

“自己的房子，没有房租，一天水电费几块钱，就算没有生意，我也不焦虑。”她说。

她端来鸡叉骨和火锅食材。我们耐心等待火锅冒泡。

“有间店，仿佛有事干一样，我也说不上来。”她接着说，“感觉自己好像在干正事。”

男生在一旁，默不作声。菜熟了，他专注着吃喝。

“毕竟蹭吃蹭喝的日子不是天天有啊！”他提到自己就要破产了。

“哎，我只想要一笔意外横财，有存款，然后靠利息过日子就好了。”林雯说。

“你想要多少存款？”

“二十万就够了，每天能有二十块利息呢，够我花了。”林雯说。

男生在一旁点头。“对我来说也够了。”

林雯说，昨天游戏停服，她还是打到了最后一刻。“我两个号切着玩。”这就是她鹤岗生活多数时候的样子：炸串、打游戏、刷短视频。

下午2点后，陆续有订单出现。每次做麻辣拌，她都多炸一点，当中饭和晚饭。那天外卖后台只响应了四次。外卖员过来拿菜，林雯有时和他们打声招呼，也有时不说话。

没单时，林雯、男生、我三人在沙发上待着。男生裹着大衣和被子，戴着毡帽。他还是很少说话。两人掏出手机开始看短视频，纷杂的声音传出：冬日被炉茶桌、儿童房改造、离婚律师、伊朗女性电影。

我们在沙发上躺着。林雯边刷着手机，边说：“在这里，夏天，我把阳台一拉，打开电风扇，打开投影仪，喝点碳酸水，这样的生活很不错啦。”

“你都看什么电影呢？”

“美国动作片，打架的，不喜欢那种情爱的。”

接着她像是想起了什么。

“你知道他年后要走了吗？”林雯问我，随后看向男生。

我点头。

“又有人要走了。”她的语气里有些惋惜。男生就要回到秩序正常运转的世界里了。

我说到在鹤岗度过漫漫长夜的感受。“晚上睡不着，有时一觉醒来，又快要天黑了，一个人，那种感觉——”

“那可太快乐了。”她说，“一个人多快乐啊。”

晚上，男生先回家，只留下我和林雯继续待着。后来我经常到林雯的炸串店避寒。多数时候，房子里很安静，习惯一同组队的游戏玩家仍未上线。没单的时候，她一个人，关掉灯，拉上窗帘，准备睡觉。那张沙发很长，睡起来很柔软，垫了电热毯、被子、羊毛坐垫。房子寂静无

声，她睡着了。窗外隐约透进一点光来。黑夜准时来临。

接连下了几场雪，天越来越冷。

就在这间炸串店里，我们断断续续聊到她的过去。

1. 姓名

2. 性别

3. 年龄

4. 职业

5. 学历

6. 籍贯

7. 民族

8. 宗教信仰

9. 婚姻状况

10. 子女情况

11. 健康状况

12. 兴趣爱好

13. 特长

14. 自我评价

15. 其他

16. 备注

17. 签名

18. 日期

19. 地点

20. 其他

倒计时

来鹤岗前，林雯最后一份工作是手机回收公司的客服。公司在江苏常州，离镇上不远。工作的时间表清晰、明确：8点起床，8点20分出发，开车去公司。她那时有一辆六万块买来的二手别克。镇上到公司要经过一条两车道的柏油马路，车不多，两侧是草莓采摘园，成片大棚，灰色薄膜连绵不绝。再经过一片荒地，一家塑胶厂，看到一座哥特式教堂时就到公司了。

公司在一个新的工业园区。园区里还有实验室、检测公司，二十来栋高楼，中间是草地和樟树。凸起的纵向白砖将高楼的墙面分割成狭窄的长方形，一些小窗斜着对外打开。8点50分，她到公司楼下停车。一楼是检测回收设备的地方，一般不让进。卷帘门里，快递员进进出出，地上堆着成团的泡沫和纸盒。密密麻麻的手机像军队一样列在里面的金属架上。凉意从卷帘门里渗出来。

从电梯坐到四楼，穿过一条幽暗的走廊，来到大堂。大堂左边是微波炉、旋转零食柜。门口——从她入职到离职的那一年里——一直放着块醒目的牌子“面试请往这

里走”。公司里大多数人来了又走。她在 58 同城上找到这份工作，和她一起面试的有二十人，培训完剩五人，半年后就只有她和另一个男生还在这儿了。

她走到工区，录入指纹，打卡。工区地板是深灰色的塑胶，脚踩上去会发出轻微刺耳的摩擦声。走廊两侧落地的透明玻璃墙前摆着散尾葵和天堂鸟。工区里少有人说话，人们手指不断敲击键盘。她坐在“在线客服部”一个小小的格子。上班时间从上午 9 点到晚上 9 点。她通常会先泡一杯魔芋粉当早餐，再泡一杯咖啡或者红茶。一颗熟普洱能泡三大杯水——想到要在电脑前坐十二个小时，她总是很容易感到口渴。

打开电脑，登录公司后台。人们在这款回收软件卖要抛弃和淘汰的苹果、华为、三星、小米手机，平板、投影仪、联想笔记本、相机，拍卖比价。林雯首先要处理前夜离线时的留言，一般有六七十条。

“亲，哪里有离您最近的门店，我们帮您预约下单。”

“亲，您觉得价格不合理的话，我们会给您退回一些优惠券。”

（有些手机被锁屏，像是偷来的。）“亲，不好意思，这台手机我们回收不了。”

很快，新的问题涌进来。每当一个客户的对话框弹出来，林雯面前的屏幕上就会同时出现一个变动的小方框——

“计时：00s, 01s, 02s, 03s, 04s, 05s, 06s, 07s, 08s, 09s, 10s……”

十秒内回复每个问题。

十秒内找到合适的用语，敲下键盘，发送并回答。

她不能走神。

平均回复时间要在十秒内——极限的时候，有个月是八秒。这些数字在她脑海中留下了鲜明的记忆。一天大约要回复三百个问题，咨询量大时，这个数字是四百。时间就这样被切割成无数个十秒或八秒。有时候“进线量”少，她反而觉得“不舒服”——这会不会影响这个月的绩效呢？

她觉得那是款“流氓软件”，客户中途不想卖，无法取消，客户只能看到拍卖结果，看不到流程，客户对价格不满意，面对这些问题客服做不了什么。一天里有大约一半的时间，林雯和同事只是坐在电脑前看着客户发脾气。她设置了上百个回复的快捷键，稍等——“sd”，抱歉——“bq”。

有关抱歉的快捷键，她设置了快十个。

“抱歉。”

“非常抱歉。”

“抱歉，我们十分理解您的心情。”

“抱歉，我们马上帮您催促处理。”

“就和那些互联网公司一样，”说这话时她还是习惯用“我们公司”，“我们公司也是个上市公司，好像是在美国上市的。”这的确是家大公司，至少使用的是互联网公司常见的等级管理制度。她入职是 P0，离职时是 P2-2。组长是 P3。最高是 P8——那是董事长。她见过最高等级的人也就是组长了。每次想把 P 后面的数字升级时都要面谈：你对公司做出了哪些贡献？

客服统一由钉钉软件管理。每周都会更新一份统计客服成绩的表格，显示人们的职级、数据、分数、指标，比如咨询量、回复率、好评率、解决问题率、投诉量、平均回复秒数、QA 情况（即质检部门的抽检）。她最讨厌“QA”——质检员会抽查数据库里已回答过的问题。类似工厂里的质检员。在工厂，质检员抽查产品，而这里抽查的是人。

是否前言不搭后语？

是否回答错误？

让客人“稍等”后，再回复时是否漏掉了“不好意思”？

情绪激动的客人，是不是没有用“非常抱歉”来安抚他？

其实有时客服自己也不清楚是不是在犯错。每次收到表格，她充满忧虑地想，质检员今天抽到我了么？就像监控一样，她说。

她在这家公司待了一年，连拿七个月的“绩效A”。

一组六人，只有一人能拿A。

一个A，两个B，三个C。

拿A的人才能拿到全部工资，每月六千元；B和C都要打折扣，每月三千或四千元。

要成为那个A，下个月就要更努力。

“他们都卷不过我。”林雯说。

她还拿过两次S。那两个月是“重大贡献”：平均回复秒数为八秒，回复量比平常多三分之一，每天五百个问题——每小时和四十一个人对话。S级可以多拿六百块。她缺钱，因此要争第一。别的组说，这个组真轻松啊，还能有人连续拿第一。别的组竞争起来更残酷。

不过，她觉得这份工作还算是轻松的。如果拿到绩效A，一个月赚六千，有五险一金，做两天休两天。不上班的十五天，她在家待着打游戏，也不用当面跟人打太多

交道。心情好时，她带上在家做的健康便当，杏鲍菇炒大虾，咖喱土豆鸡肉配糙米，配上切好的蜜瓜。

这时，她继续讲曾经做过的工作。上中专时有两个选择，计算机或者学厨。她选了后者。上学时，一半人在混日子。毕业后，学校安排的第一份工作是餐饮后厨，在常州横山桥的一家饭店做冷菜。冷库里有大冰柜，全封闭，没有窗户，空调一直开，很冷。尤其是有婚宴的时候，菜多，冰柜放不下，只能提前切好摆在桌上，“空调要打到像冰箱一样的温度”。她说冻得人直哆嗦。冷菜里有几样怎么都躲不开，比如口水鸡，鸡得自己剁。一锅鸡煮下去，再捞起来，拿着大刀，剁不断的骨头得用刀背抠出来，很花力气，手心手背都很疼。还有做葱油蚕豆，她负责熬蚕豆，就这样和一锅锅鸡、一锅锅蚕豆度过了第一份工作。

“但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她说，“不是色狼，不进厨房。”这是一句行话。冷库里除了她多是男性。

过了一两年，她觉得餐饮太多力气活，她没什么优势，转去做连锁酒店的前台。她和朋友一起去无锡的酒店工作。宿舍条件一般，有咬人的蚂蚁。晚上睡不着，她和朋友一起去蹦迪，音乐轰鸣作响。她还做过婚礼司仪，新娘上台前帮忙整理裙摆，在新娘新郎喝交杯酒时递上杯子，新人父母上台，指导他们：“脚踩在那里！”还有刷单主持，在网上找人给淘宝商家刷单，其实刷单挣得挺

多，只是妈妈看她成天躺在房子里，说她活得没个样子，又让她出门上班了。

有次她在常州中华恐龙园附近一家主题酒店做服务员。酒店一个房间一晚上卖七八百，通常都是游客来住。中华恐龙园是常州地标。她顺带办了张恐龙园的年卡。休息时，她一个人到恐龙园玩那些刺激项目，过山车、大摆锤、呕吐机。恐龙园有辆露天的倒挂式过山车。她总是坐最后一排，过山车开到顶端往下冲，整张座椅都在发抖。她不叫，只是忍着。那样的刺激能给她“活着的感觉”。不是开心，她说，算不上开心，只是发泄。

因此现在——她倒也不是那种对生活中所有事情充满抱怨的人——现在她坐在写字楼里，公司有空调，风吹不到雨淋不到，也有微波炉跟冰箱。走廊尽头，光照进来。窗外是晴朗或被灰尘笼罩的常州。公司挨着另一片工业园区，从上往下看是块绿地。远处的楼房连绵成一片灰色的影子。

工作一年后，领导问她想不想升组长。

她摇头。组长最开始也就挣三四千，她说，要一点点往上升，管全组的数据。如果有人“掉下去”，达不到数据量，挨骂的还是组长。

但要是让她回忆这份工作，她总结说：还是没什么价值感，还是活得浑浑噩噩。

离职前，她连续上了八天班。那轮加班令她身心俱

疲。问题太多了。同事们坐在电脑前叹气，但手指不能停。她酸胀的手指在键盘上“啪啪”地不停敲打出词语和句子，抱歉，非常抱歉，我们真的非常理解您的心情——敲打键盘时她戴着耳机听歌，放大音量——她爱听“Changin’ My Life”，一支已解散的日本乐队，还有重金属摇滚，其中一首叫《旋转吧！雪月花》，在那样欢快激烈的鼓点和歌声中，她等待着前往鹤岗的旅途——

時代は常に千変万化

（时代总是千变万化）

人の心は複雑怪奇

（人心也是复杂怪奇）

「でも本気でそんなこと言ってんの？」

（但你说的可是真心话？）

もうどうにも満身創痍

（无论如何都是满身疮痍）

嗚呼、巡り巡って夜の町

（啊，在夜色下的街道流连徘徊）

キミは合図出し踊り出す

（你发出信号随即舞动）

回レ回レ回レ回レ回レ回レ回レ回レ回レ！

（旋转吧旋转吧旋转吧旋转吧旋转吧！）

華麗に花卉散らすように

(华丽如花瓣散落)

回レ回レ回レ回レ回レ回レ回レ回レ回レ！

(旋转吧旋转吧旋转吧旋转吧旋转吧！)

髪も振り乱して

(头发也随之散乱)

生活实验

我也跟林雯去了她在鹤岗买的第一套房子。屋里维持着原有的老式装修，塑料板吊顶，更多是猫的痕迹。门口三个大瓷碗，装着满量的猫粮。客厅放着两个猫砂盆，纸壳猫抓板。储物室里放着一摞摞床单、小苏打、燕麦麸皮、膨润土猫砂，网上买的物品最后归宿都在这儿。卧室不大，有张双人床，墙上贴着一张海报——红色帆船正在远航。窗前放着两盆吊兰，叶子边缘呈锯齿状，是猫的齿痕。窗外结了霜，雾蒙蒙一片。

她有两只猫。一只六岁的狸花母猫，是从常州带来的。还有一只英短金渐层，来鹤岗后买的。最初来鹤岗时，她不知道能在这里待多久，先把狸花留在了江苏家里。三个月后，春节，她回了趟家，把狸花运到鹤岗。运猫的旅途花了两千三百元。除了她，车上还有三四只猫、泰迪、阿拉斯加、鸭啊鱼啊，后备厢还有些蜥蜴虫子。猫到鹤岗的那天，一路上都有火红的晚霞。她抱着猫坐了一路。

狸花叫“大王”。养大王时她在酒店前台做服务员。那会儿她二十岁出头，有天她得知宠物医院有窝被遗弃的

狸花猫，还剩下一只活着。她对照片里那只弱小绵绵的动物动了感情。猫身子弱，打了一周吊针。医院离她家二十公里，她每天来回跑，捧着吊盐水的猫。只要不捧，猫立马醒过来，看着她——就像她选中了猫，猫也选中了她。她和父母之间谈不上亲密。大王陪她在小镇度过漫长的无聊时光。当她决定开炸串店后，大王单独待在第一套房子。一个月后，她觉得大王太孤单，就在鹤岗早市上从层层叠叠的笼子里选中那只英短金渐层。两只猫相处得很顺利。它们都爱吃酸奶棒冰，有时她就买来一根，让两只猫一起舔舔。

三天一小休，每周一大休。林雯这样设定在鹤岗的休息时间，休息时她都在陪猫。通常是周三晚，她从炸串店回来，增添猫粮，更换猫砂。周一，她睡到中午 12 点，打扫屋子，更换床上用品，拖地，清扫猫砂，洗衣服，一整天陪猫待在屋子里。

屋子停了暖。在鹤岗，暖气费是笔不小的开支。地上有个装着水的塑料盆，里面还有一支电热棒。她觉得冬天水冷，猫喝了拉肚子。普通的加热棒可能漏电。她挑选了很久，才选到这款乌龟用的恒温加热棒，既能让水保持在二十四度，也不会漏电。床上放着定时加热和关闭的电热毯，她不在时猫也能钻进被子里睡觉。屋外有个小阳台。她打算等天气暖和一些，装上网，让猫在阳台晒太阳。

她用一种温柔的语气说：“每天晚上，我抱着大王睡

觉，侧躺着，盖着被子，它就这样在我怀里。点点呢，就趴在被子外面。”

在鹤岗，大多数时候，林雯都独自生活在房门这一侧，很少时候去到门外的世界。比如每月有那么一回，她会去楼下的澡堂搓澡。她是个南方人，但很爱东北澡堂。林雯约我一起去。晚上，我站在楼下等她。冬天，她穿着一双人字拖从家里走出来。路面结冰，沟壑纵横，她的脚趾冻得发红。澡堂离家不远，走几分钟就到了。洗浴十六元一次，包含搓背。我们存了手机，走向澡堂。

负责搓背的是个热情的中年女人。“你们从哪里来？”女人问。

“江苏。自己来的，开了个炸串店。”林雯说。

女人问林雯：“为什么一个人来到鹤岗？”

“鹤岗挺好的。”林雯笑笑。

“那阿姨给你介绍个对象。”女人又说。

林雯说：“为什么一定要介绍对象呢，阿姨，一个人过才舒服，你说对吗？”女人也笑了笑。

澡堂热腾腾，水汽让人的脸涨得通红。搓完澡，我们去吃附近的“八八铁锅炖”。这是她自认奢侈的小爱好。我们拎着铁锅炖鸡回到家里。在楼道，她遇到邻居，一个脾气温和的老头。老头并不在这里常住。她和老头互相问好，后来流感到来，她将几个柠檬借给他，举手之劳，但也仅止于此。

后来我们常一块待着。我还得知她有个“拼饭群”。群里有四个女人，年纪都比林雯大，其中一个结过婚，有孩子，另一个和丈夫一起来鹤岗，还有个年轻的女孩，是短视频博主。她在网上认识了她们。一个月里这四人会相聚吃一次饭。不过林雯受不了更高的见面频率。

她说，不想和人建立更深的交往。在鹤岗认识的人，林雯不和他们聊过去，也不谈论未来。她只聊现在。我几次问她能不能带我一起去见其他人。她有些为难，说还是我俩单独见吧。

这天，她从“拼饭群”里听说，时代广场负一层的超市晚上7点后打折，她又带我一起去“时代广场”。从家里出发，她推着一辆装商品的小推车，坐上17路公交。来鹤岗一年，这还是她第三次到时代广场。她不爱来市中心。

我们开始逛超市。她只看那些标着黄色特价标签的商品，目光扫过蔬果堆的角落：两元的花菜、西葫芦、金针菇（各来五份，做炸串食材）；二十元十二瓶的娃哈哈饮料、五元的波罗蜜、三元的鸭脖、十元一包的火腿肠（买给大王）。购物车很快满了。

逛完，我们去负一楼吃炒酸奶。坐在座位上，林雯说：“既然选择这样生活，就必须丢掉一些东西。”

每隔两三天她和母亲打一次视频电话，聊普通的母女话题：最近在鹤岗做什么，伙食，降温之后要穿的衣服。

她不太和父亲联系。

平常待在炸串店，一个男生有时坐在门口。他住在楼上，是个大学生，刚放寒假回来，这几天经常点林雯的外卖，偶尔还会在她的“多多买菜”站点买饮料。林雯边做菜边与男生闲聊。她让大学生给店里写几个好评。

“他吃得可多了。”林雯说。

“谁吃得多？你不也胖吗。”男生说。

“那我们家基因就是这样，我妈妈每天出去散步两小时，还是一百五十斤。”她说。

说两句玩笑话后，男生拿到麻辣拌，一箱桃汁饮料，走了。

这几乎是林雯在鹤岗所有的社交关系，就像一些零散的线条，而不是重叠在一起的圆。

另一天，林雯、我，还有介绍我俩认识的男生相约去吃“海波烧烤”。晚餐定在5点。天黑了，林雯穿上黑色羽绒服，羽绒裤，雪地靴，戴上防静电的灰色毛毡手套，毛线帽。我们来到路边等待17路公交车。车上坐了一半乘客，多是老年人。等到终点站，下车，来到烧烤店。

男生还没来。他给林雯发消息，说已经下了公交车。这时，林雯打开微信，开启位置共享。我们继续等待，吃着店家免费赠送的花生米和炒芝麻粒。

快到了，男生说。林雯掏出手机，关掉共享。

五分钟后，男生发来消息。

“不吃了。”他说。

林雯疑惑地看着我。“为什么？”她问。

我给男生打电话，男生说他已坐上回程的公交。“为什么？”我再次问他，可他什么也没说。电话对面传来公交车报站的声音。

“对不起，我脾气怪。”后来男生才说，他找不到店的位置，索性不吃了。

我和林雯误以为对方给男生发过了店址。林雯关掉位置共享，男生不知道怎么走，就回家了。为什么他不问一句呢？林雯说，但她不愿多想，说琢磨他人心思太累。我们继续吃烧烤，但索然无味。后来林雯将两盘烤肉打包，说第二天男生要来帮她修东西，再把烧烤带给他吧。

吃完饭，我们走在街上。我的脸冻得僵硬，逐渐发红，疼痛。她推着小车，车轱辘在地面上划过，车里面装着原本给我和男生的柿子地瓜。鹤岗的人们说这是个暖冬，可还是有零下二十度。下水道口飘出一阵阵白色的水雾。我们戴着口罩，呼出的空气很快在睫毛和刘海上结冰了。风真冷，冻得腿疼。不过林雯说她已经适应这样的寒冷。

只是这里空气不好，她说，有煤灰，走在路上，脸容易沾很多灰。

我们继续往前走。

“但你一个人会不会……”

她马上摇头。“不会。”

“你知道我想问什么？”

“孤独？”她又摇头，“不会。”

“和人交往有什么用。”她继续说，“喝奶茶会让我开心，靠垫能让我靠着舒适，猫能为我做它们所有能做的事情，但人不能。”我们一起回到房子，穿过黑暗的小区。林雯躺到床上，两只猫很快就跟上来，钻进被子，熟练找到林雯的臂弯。关掉灯。一个人，两只猫。她很快睡着了。

* * *

这些天，我和林雯谈论她在鹤岗的生活，也谈论此前的生活。我希望理解她为何做出这样的选择。

现在，如果让我来谈谈林雯，还有这些在鹤岗生活的人们的共性，也许更重要的并不在于他们的身份、社会位置，而是精神上的那部分东西。也许这些人正试图拒绝那种单调、聒噪的声音——某种单一主流的价值观，或是可以称得上老旧的、散发着幽幽陈腐气息的那种生活——工作，赚钱，成功，买房子，买大房子，结婚，生孩子，养孩子，然后自己也垂垂老去。

我想起很多声音，比如——

“浑浑噩噩地过了这么多年，”林雯说，“来到鹤岗后，那样的感觉终于减淡一些。就好像我终于轻松了一点，也

好像更清醒了一点。”

电话中那个做插画的女生说，她还记得来到鹤岗的心情。新生活就这样仓促地开始了。“走进去的那一刻，我想我终于有自己的房子了，好像以后的生活就终于自由了。”

“不想奋斗，奋斗给谁看？”一个人说，“我一个人，这点钱够花，为什么还要去工作呢？如果哪天游戏打腻了，就在鹤岗随便找个工作。”

“如果我放弃家庭，放弃亲情。反正一切都放弃掉。一个单身男人，开销不是很大的情况下，我发现人生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在比亚迪汽车厂工作过的男生说，“不想要的东西就不要了。”也许更重要的是后面一句：“我可以选择不。”

我与学者袁长庚交流，他谈到对生活哲学的看法：

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一个副产品。那就是不管你身处什么社会阶层，不管你是什么生存背景，在很大程度上都共享着一整套生活逻辑。富人也好，穷人也好，城市人也好，农村人也好，虽然你對自己未来的期待不一样，但你总是有所期待：一个人就应该好好劳动，为子孙后代留下一定积蓄，或让你的后代实现阶层跃升。这是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发展给我们在心理层面上留下的最大公约数。我们几乎是全

民无条件接受了这套生活逻辑。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从生活逻辑和生活哲学的多样性上来说，这比较单一。这就造成一个问题，如果你恰好生在这个时代，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所受到的影响，你见到的很多东西，这一切会让你产生一种感觉——好像只有过上这样的生活才正常，这是世上唯一正常的出路。当你没有见过有人停下来，你会以为停下来是种让人恐惧的事情，可能会失去生计。但真正有人在你身边这样生活，你发现好像暂时这样一下也没有太大问题……我觉得这背后跟我们经济和社会发展逐渐放缓有关系。当身边有些人开始过非常规生活，我们开始思考，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生活观念是不是可以更多样化？

同时，在针对工作，针对年轻人的这些情绪里，父母一辈与子女一辈出现了严重的冲突。因为他们各自忠诚于自己的感受和历史经验。这也许说明，代际差异并非来自价值观，而是认识和体验上难以调和，是生活经验的不可通约，不可交流，不可共助。

在鹤岗，我见到的这些人似乎生长出某个新的自我，它决定脱离我们大多数人身处的那个社会——要求房子、教育、工作、自我都要增值，利用每分每秒产生价值，好

像时刻在填写一张绩效考核表的社会。遍布生活的焦虑感，弥散的不安，人们不敢停歇，自我鞭策，自我厌倦，有时还会服用阿普唑仑片。这些选择来到鹤岗的人停了下来，像是进入一种生活实验，实验品则是他们自己。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有点危险，但也许，这首先是她（他）自由的选择。

另一天我见到了李海——那名最早被报道的海员。他也许不是第一个来鹤岗的人，却是第一个被广泛报道来鹤岗买房的人。他来鹤岗生活快三年了，也是我认识的所有人里在这儿生活最久的人。我希望听听他对此的理解和看法。

“像我们这样生活，没有学历，赚不了很多钱，相对好一点的可能做点技术工种，或者在大城市做保安、送外卖之类。买房都是贫民户嘛，有钱的当然想在自己的城市，没钱的就想想办法，便宜房子也买得到。我们觉得自己到处漂泊的生活状态就像流浪一样……我就觉得，不管好坏，还是得买套房。人人都想有个安稳地方可以住，向往有个属于自己的家。”（《流浪到鹤岗，我五万块买了套房》，正午故事，2019年11月4日）

我在光字小区外面的街道等待李海。想见他一面不容

易。最初，我在网上问他是否愿意聊聊，他说有空可以一起吃顿饭。但我犯了个错误——当我前往鹤岗时，电话中那名女生刚被大量报道过。记者们找不到她，只好从头寻找和这个地方有关的人，其中就包括李海。后来我得知还有不少综艺节目在找他，比如安徽电视台一档综艺，说也想采访在鹤岗生活的人。

“给钱吗？”他问对方。

“只报销路费。”

“那我不去。”他说。

李海已经不想再搅和那些和生活无关的事了。来鹤岗的人都想见李海。但其实他并不喜欢和人打交道，最初他会和其他人一起吃饭，建了个微信群，叫“四海为家”，把人都拉进来，里头有人叫“海哥大迷弟”。后来他习惯躲起来了。人人都听说过他，知道他过去的故事，但都不知道他现在的生活。有人听说他靠老家的低保，也有人说他曾经在微信群里发过账单，一个月花一千块，每天不超过三十，能买什么，不买什么，都要控制清楚。

快到约定见面的时间了，李海一直没回复我，接下来一个月还是没有回音。第二个月我再次约李海出来喝酒。他发来一个“微笑”的表情。寒暄几句，他说见面就算了。又过几天，我正好要去光宇小区附近见另一个人，问他要不要一起吃饭。这次他同意了。

现在，我看见新闻中的人从街道另一头走来。他

三十五岁，有些瘦弱，穿黑色羽绒服，软塌塌的发型，戴着印有“SMART”猫胡须的卡通口罩。他走近后摘下口罩，显露出人群中一张寻常的面孔。他有些局促，很少说话，抬头看我一眼，很快转移了目光。他边走路，边用手机打《宠物小精灵》，一款消消乐游戏。

光宇C区是一个更老的回迁房小区。淡黄色的楼房屋层层叠叠，没有边界。路边的雪融化成黑水。这里是鹤岗的煤矿塌陷区，时常停水。总有传言说那是深处的水管塌陷了，停水时李海就需要出去吃饭。墙壁上贴着“房屋出售，光宇A区，七楼，五十七平方米，位置好，两万五”，房子价格比李海刚买时还降了一点。

我们走在街上，风还是很大。李海已经习惯了。2019年底在鹤岗买房后他再也没有离开过。他本来打算维持原有的生活，出去跑船半年，再回鹤岗生活半年。但在鹤岗买房半年后，同为海员的父亲在海上遇难——父亲看他跑船，也跟着去跑船，最后在一次台风中丧生。

“现在船老板不管台风的。”他说，“反正人死了有保险。”总有船公司的中介打电话给他。他回复他们，说再也不跑船了。

“那你现在在鹤岗做些什么？”

他把手机收起来。“帮有钱人家的小孩练级。”

我们穿过街道，柳树伸展着枯枝，在空中摇晃。火锅店没开，李海带我走向另一家烧烤店。不远处有片雪地，

半米来高的松树苗斜着列成棋盘状，牌子上写“让城市拥抱森林”。李海看了会儿松树，又往前走。路上他聊到怎么打游戏挣钱——去年《魔兽世界》还没关，每天晚上他都在打装备，一个月能挣一两千元，但打得无聊，太单调，接着打《王者荣耀》《天龙八部》，其实不需要技术多好，只要肯花时间。他的顾客是一些有钱的小孩。最近他还帮不在鹤岗的人报停暖气，跑腿，挣了几千元。有些时候他也会在鹤岗日结群里找零工，修水管，修电器。他生活成本不高，偶尔买点肉，趁超市打折时买梭子蟹。作为舟山人他还是保留了吃海味的习惯。父亲在海上出事的赔偿款，他没拿，给了家里人。

新闻最火的那阵子，他想过去当中介卖鹤岗的房子。毕竟总有“粉丝”来鹤岗找他。他在百度“隐居吧”“流浪吧”里卖，开了短视频账号。但卖得不好。别的博主一个月卖二三十套，他一年才卖了七套。他就不干了。他不清楚怎么将那些关注变成真正属于他的东西，那也许不是他擅长的事。

“钱花完了怎么办呢？”

“花完啦，再去打工。”他说，“赚多少，就花多少。”去年他总共赚了一万，也花了一万。

在鹤岗，李海平淡地生活了三年。他独自逛公园，走在鹤岗的街道上，有时天很阴沉，人们留下背影，路面积了薄冰。有时天很晴朗，他拍下膨胀的云。游乐场里，一

个人拍打辛勤的骆驼。他来到萝北的界江，江对面就是俄罗斯。公交车上，人们戴着口罩。他是来鹤岗生活的人里少数养狗的人。去年他从狗市上买来两只狗，不论天气如何，每天遛狗两次。

我跟随李海回到他家。他打开门。客厅里最醒目的是那个硕大的不锈钢狗笼，狗就待在那儿。靠墙放着一个立方体鱼缸，没有鱼，水绿油油的。茶几上放了很多杂物，胶带、打火机、电池、狗绳链，还有一个小型摄像头。两只狗接连叫起来。一只奶牛狗，一只长毛黑狗。客厅里是狗的味道。李海靠近狗笼子，打开门。狗冲出来，立马尿了一泡。李海佯装要打它，可两只狗翘着尾巴，围着人转来转去。哎呀，这狗。他笑了笑，只好去拿拖把，将地板拖干净。狗守在门前。

走！李海说。

他打开家门，狗冲出去，才几秒就消失了。我和李海走下楼，那两只狗在雪地里滚了滚，从小区一头跑向另一头，身上毛发湿答答往下滴水。两只狗有时赛跑，有时又分开。

李海站在雪堆附近，空旷的小区里。我们聊到他曾经做海员的生活，那是一种长久以来毫无希望的漂泊感。他时常无法确认自己的位置，在社会上的，在家庭中的。他已经不太有对生活的野心，现在平平淡淡在鹤岗过着，带着狗，偶尔和在鹤岗认识的人一起逛超市、买海鲜，或只

是自己出门走，走在大街上，走在那些有着高大桦树林的公园里。似乎这样就够了。

“找个地方清静。”他说。

“从来不想回去吗？”

“回去太吵了，什么时候找对象，什么时候买房，什么时候生孩子，这些问题不可能停下来。”他接着说，“我差不多二十多年没回去过。”

一只来自临街店铺的灰色长毛狗跑来。三只狗滚作一团，热闹的叫声此起彼伏。天气越来越冷，在雪地里站了四十分钟，我感到身体冻僵了。小区里，一些老人慢慢走过去。

“这边没人管你。对，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最后说。

两只狗跑向远处，毛茸茸的影子越来越小，变成小黑点，直至消失不见。吵闹的叫声也不见了。四周重归寂静，只有风声。不过李海并不担心。他相信狗一会儿就会回来，回到他的身边。

* * *

关于来鹤岗的意义，关于人的追寻，人们还有其他的观点。一个饭局上，我见到了一男一女。女生三十岁，曾在深圳工作。男人年龄大些，四十岁，脖子上挂着灰色穿戴式耳机，他提起在厦门和北京做青年社群的经历。他是

那种组织者——或者说布道者的性格。他认为鹤岗将有形成文化部落的空间。他们买下房子，想要定期举办读书会、观影会、“自我探索会”、红酒品鉴会、精酿啤酒品鉴会、TED 演讲观看会。

我问他们，在这些活动上，他们一般都聊些什么。

“比如人生设计课，”女生说，“我现在正在寻找人生目标，人生方向，我会用人生设计这一套方法论，然后我去实践。”

“人生怎么设计呢？”我问她。我对此持怀疑态度——人生真的能够设计吗？

“你是不是把人生计划、人生规划跟人生设计搞混了？”男人说。他开始讲这三者的区别，《斯坦福大学人生设计课》，“奥德赛计划”。

“总而言之，就是我们如何才能使自己更积极地掌握人生。”男人补充说。

女生说，他们在鹤岗的群聊里发布活动通告，但总会被大量的其他对话冲走。

“来鹤岗的只有两种人。愿意交流和学习的是，一种，不愿意交流和学习的是另一种。”男人接着说，“现在看来，从外地来鹤岗买房的人里，很少有愿意‘交流和学习’的。”

他说生活是具有“价值”的，人们要努力去发现“价值”所在。有时我会觉得他说的话很像城市里流行的“身

心灵”，或是成功学的另一种形式（“发现生活价值”的商业理念？）。女生还在禅修和辟谷。

最早来鹤岗的那些人，也不完全都在避世。相反，他们在鹤岗抓住了机会。比如二十九岁的郑前。他在短视频平台上有四十万的关注者，有些视频播放量达到千万级别。很多人都是看到他的视频才来到鹤岗买房。

后来我与郑前相约见面。他留着一头齐刘海的黄色爆炸头，只穿一件黑色卫衣，带我钻进街边一家房产门店。店里不大，桌上有三台电脑，一旁放着茶台和紫砂杯。员工都在外跑房子。他一年能卖一百套鹤岗的房子。

最火的时候，他接受了快二十家媒体的采访。“说过的事情懒得再说。”他说，“我后来直接把那篇最详细的发给记者，再问他们有什么想补充的。”

他坐在电脑桌前，右手玩着脖子上的金属项链。他等着去染头发，想换个颜色，应付年底一家媒体直播。那场直播会请来一些短视频博主，郑前打算向人展示自己的鹤岗生活。平时，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规划视频、拍视频、剪辑，兼职卖房销售。他每天中午起来，下午开始拍短视频，回复大量咨询买房的微信。他有四个手机，六个微信号，每个微信都加满了五千人。

“我几乎没有个人的生活。”他笑了笑，“其实我最开始是‘躺’的。”

2019年冬天，他看到海员李海的新闻。之前，他在

广州做了三年汽车销售，在番禺、崇化，跑汽车厂，推销火花塞、雨刮、刹车片，卖车上的配件。他住在白云龙归地铁站附近的城中村，月租八百。他每月挣四千元。到了第三年，他开始感到无所事事。看不到未来，看不到任何希望，工作日复一日，那时的生活并不会让他有任何幻想。他决心到鹤岗买房，然后做《王者荣耀》的主播。房子装修花了两个月。存款见底后，他坐在电脑前开始游戏直播，播了一周多，没有人气，就开始研究短视频。他不知道拍什么，以“广州人到东北”为主题拍摄了各种各样的雪景，还有鹤岗便宜的房子。粉丝很快涨起来。让他意外的是，不停有人问他怎么买房。他开始做起生意来，过了一年，他和鹤岗当地人合伙成立一家房产中介公司。

“我掌握了一些流量的秘诀。”他说。

我问他具体指什么。

他很犹豫。“说了就会被别人抄。”

如今在他的社交账号上，多数是这样一些内容：

北京粉丝在鹤岗买了套房子，六十八平方米全款四万，装修四万八，共八万八千，人已入住鹤岗。

山西粉丝来鹤岗买房啦，四万一套房，你羡慕吗？

江西粉丝三万九鹤岗安家，究竟为何这样千里迢迢到鹤岗？

“鹤岗有显而易见的好处，我能够掌握这里，城市有几条街道，几个小区，能去哪里，我都很清楚。”他接着说，“在广州，我只会觉得自已很渺小。”

有些女孩向他示好，他拒绝了。他知道自己正处于难得的机遇中，担心错过就不再有，不想把精力花在其他地方。“现在就是我的人生最高峰。”聊了四十分钟，他开始看时间。我知道接受采访多的人会有这种习惯。离开时我们坐上他的车。我问他，这辆车是不是刚买的，看起来很新。他说，他不敢买贵的车，想换辆好点的都不行，这在大城市十分正常，但在小城市就容易招来非议。

他说，要是在街上被别人拍下来，那可就麻烦了。

* * *

我已在鹤岗见到这些人，听见一些声音，写下他和他的故事、经验、记忆。人们来到鹤岗，就像是追寻着那些旧话题：到某地去，到远方去，在路上，“真正的生活总是在别处”。在这里生活越久，我仍然不清楚，鹤岗，这座城市是否真的能让人们摆脱生活的重复、苦闷、倦怠、绝望感——进而来到精神上的自由？我想到人们交谈时的犹疑、沉默，面对经济压力时的回避，谈到未来时的顾左右而言他，也想到了另一句话——“当对时间的感知仅

限于期待一个无法控制的未来时，勇气就会消失。”（西蒙娜·薇依）

另一顿晚餐，我见到一对来鹤岗的年轻情侣。他们做留学中介，正在尝试“数字游民”的生活，有时在海南，有时在西安，现在来到鹤岗。我们聊到对来鹤岗生活的看法。男生说，他能察觉出这里的人们在反对什么，但是，他并不知道，人们究竟在支持什么，提倡什么。

一天，我又来到林雯的炸串店。我坐在沙发上，盯着屋子里的食物，又将目光投向那堆着杂物的阳台，忽然想到林雯曾经提过的水母。

“水母去哪了？”我问林雯。

她那时正在切柠檬片，柠檬的酸苦味道很快传过来。

“两只大西洋不吃饭，饿死了。”她抬起头说。

那是搬到鹤岗的半年后。半年来，水母的身体越来越小，她没找到办法。有天换水，可能没有配对盐的比例，水母当晚没吃东西，第二天死了。又过了一下午，水母身体溶化在水里，没了踪影。这样也好，没有负罪感，她说。但生活还是要继续过。

炸串店生意不好，有时一个下午只开张两单。只要够水电费就行，她总是这样说，但还是会想办法提升销量。外卖商家通常会赠送小礼物。她买来一整箱青皮柠檬，准备做免费的柠檬水。炸串店的外卖评分降到4分，她自我安慰，说如果评分太差，就换个店名重新开，但后来她还

是让熟悉的客人写上好评。

做完柠檬水，她开始打游戏，队友不在线，她随机匹配了一把。她的手指在屏幕上快速移动。在这个游戏里她似乎能获得现实无法给予的东西。

“不打了，等晚上队友上线。”她说。

随后我们开始聊天，吃橙子，她忽然说：“我之前好像在日剧里看到，人生所有的不如意，都是没有能力导致的。”

“怎么突然说起这个？”

“只是突然想起。”

“不过感觉你对现在的生活还算满意？”

“我也有很多想做的。”

“比如呢？”

“比如我也想赚钱，我也想减肥，我也想变美，我也想出去旅游，我也想学画画，我也想学会电脑，然后去做互联网的工作，比如像群里那些人。”她提过几次，她没有电脑，也不太会电脑，要是会门互联网技术就好了。

“然后呢？”

“没有然后了。”她又笑了下。

圣诞节过后的一天，我，林雯，“比亚迪男生”再次相约吃火锅。林雯穿着白色毛衣，灰色百褶裙，一身相对郑重的打扮。她提前买来三个琵琶鸡腿。鸡腿正躺在烤箱里，肉香飘过来。

聊到新年愿望，男生说：“希望未来能找个老婆。”

那你呢？我问林雯，你还想谈恋爱吗？

“我谈过一段。”她说。之前，她谈到感情时总是显得很淡漠。“我不追星，也不追偶像，不喜欢看爱情片，做司仪看到别人的婚礼，也没什么特别的。”她的话里没有期待，对亲情、爱情、友情。当我来到鹤岗后，在那短暂的时间里，我成为她交往最频繁的人。我也是第一个在她家过夜的人。

“但这是女生之间的话，还是等他走了再说吧。”她说。她看了一眼男生，吃完饭，她就催男生离开。

男生走了。她说：“他可能没办法理解我要说的吧。”

她接着说那段感情，说那段感情结束得很仓促。但她希望我不要写到这段经历。

“这段就略过吧。”她说。

林雯沉默了一会儿。她看着我。沙发背后那张暖灯照着她的脸。和人打交道很累，疲惫，也挺麻烦的，她最后说。

聊完，林雯开始刷短视频。我们每次见面，林雯大约都要刷几个小时的短视频，“鱼头豆腐汤的做法”，三分钟看完的电影，有关奥密克戎的笑话。我在一边听她刷短视频的声音，想到它呈现了一个浩渺无边的世界，但它也支离破碎，我不清楚什么样的情感、记忆或经验能从这些碎片里留下来。

如同水母那样漂着。她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吗？以后还有更好的选择吗？

她曾经有过一次快乐的旅行。那是在新冠发生前，她按部就班打工四五年了，2019 年秋天，她一个人去了海南三亚，住在海棠湾的青年旅舍，楼下是海，有沙滩椅。她在深夜带着钳子和头灯抓螃蟹，早上做海鲜粥。傍晚的天空总是粉红色的，许多人在海上冲浪。她尽可能控制花费，花了三千元歇了一个月。她长久注视着那片海。



第三部分



一间公寓

12月，鹤岗进入严冬，气温达到零下二三十度。冷带来一种萧瑟的触觉。河流凝滞不动，大多数树木都是枯黑色的，楼下，马路两侧摆着冻鱼。这和我此前在许多地方见到的景象都不一样。比如我熟悉的南方城市，那里街头植物茂密，汗水流下又蒸发，车水马龙，事物每天都在变化，人能轻易察觉出时间的流动。但在这里，一切似乎都在停滞，城市，风景，建筑，还有人们选择的生活。寒冷更是增强了这一感受。

尤其是下雪那些日子，人们独自待在房子里，就像林雯，A，宁夏人。我也一样。窗外别无景致，只有层层叠叠写着“保温”的白色塑胶阳台。我的房间，长条形，大约三十平方米，屏风隔开了卧室（一张床）和客厅（一张沙发）。四层，采光不佳，光线只在阳台短暂停留。黑夜漫长，我买来冻梨打发时间。梨子冻得黧黑，结实，表皮有一层白霜。我把冻梨放在暖气片上，等着白霜逐渐消失。大约一两个小时后，梨的身体变软。我从群里学来方法，咬开一个口子，使劲捏出梨的汁水。那是口味极佳的

天然饮品。中午，我用房主留下的电磁炉、煮锅做饭。小煮锅咕噜咕噜响。晚上又来了一场大雪。雪像沙一样飘在风里，暴脾气的风哐哐砸向窗户，这时少有人愿意出门。不过线上群聊从没停过，人们抱怨寒冷的天气，停水，重复发一些网络流行话。

房子安静，我听见水管流动的声音，还有热水器的吱吱声。墙壁很薄，楼道里外卖员步履匆匆，还有软件上催促送单的播报。隔壁住着一对夫妻。早上6点，男人总要咳嗽几声，走下床，传来一阵拖鞋趿拉的声音。后来我习惯从手机里找出一档讲电影的播客节目。我打开外放，听着声音做饭，洗碗，扫地。我没有注意节目具体在说些什么，有人说话会让一切显得好受些。

这还让我想起曾经的一段日子。那是在2020年初，因为一些变动，我辞掉杂志社的工作，在家里待了一段时间。我对与人打交道感到疲惫，想尽力切断与外界的联系。辞职后，我没想好做些什么。然后，新冠出现了，城市开始封闭管理。有天晚上我去买储备物资，大米，蔬菜，香肠。当时北京也下着大雪，街道很空旷，零星几个行人，手里同样提着三四个购物袋。回家时我坐上出租车，广播传来高昂的女声：“樱花时期我们再相见，武汉，加油！”

随后很长一段时间，由于隔离，我整天待在家里，打一档叫作《动物森友会》的游戏。在游戏中我有一座岛，

我在虚拟的海里抓金枪鱼，收集奇形怪状的恐龙化石。但在游戏之外的现实，我不想与人交往，不回复他人的消息，看着天一点点变暗又亮起来。新冠有所缓解后，我终于走出家门，化好妆，去咖啡馆里假装工作，实际上我无所事事。精神不错时，我和朋友说到曾经看过的一条新闻，讲一个男人厌倦上班，就躲在家里。没有想到妻子中途回家，他更决绝地将门反锁，躲进了衣柜里。

我持续关注着豆瓣上诸如“家里蹲自救同盟”“裸辞群众小型交流组织”这类小组。那些小组中女生居多，她们年龄与我相仿，二十来岁，同样在北京、上海或是广州这类大城市生活，也许正面临失业，也许只是待在家里，或者是租住在一个公寓里。总之她们闭门不出，同样试图封闭自我。

她们在帖子中写道：

“二十八岁在深圳出租屋蹲了一年半，感觉对生活越来越没有掌控感，之前还会偶尔出去走走，现在只会宅着，连出门倒垃圾都不想了。”

“没法在家里蹲，又没法出去，为了逃避天天往公园里钻。只有公园是免费的。”

“没有社交，没有朋友，没有网络，困守单间的出租屋，不上班，不出门，靠外卖。我过了半年这样的生活。”

“社会上是否只有一种期望，希望我们努力工作？唯有努力工作的人才能被称作一个有价值的人吗？”

在鹤岗的房子，重新想起这些话，我仍然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这些帖子和我自身的感受。我们这些人，明明处在——用更年长的一些人的说法——人生中最好的阶段。但为什么我们感受到的是如此强烈的疲惫，以至于我们试图逃避，逃离，或者干脆躲起来？

但将自己真正封在家里的日子并不好过。我的作息开始紊乱。到第四个月，我开始易怒、烦躁，在网络上四处搜索：我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那年年底，我已无法忍受这种生活。当屏蔽一切外在的事物，我像是失去航标的船，不知道去哪里，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重新开始找工作，重新适应按部就班的生活。别去想其他的，最好什么都别想。（当然，我重新找工作的另一个原因是存款花光了。）

回到生活的常态令我心安。我继续上路，见到形形色色的人。

有天，我来到湖南长沙，走过一家购物商场的地铁站。一个年轻女孩站在街旁，面前是一个三脚架，一部手机，旁边放了两盏柔光灯。她在直播唱歌，很多人围着，道路堵塞。这座城市的人们似乎不知疲惫，也从不因黑夜的到来停下脚步。隔天，我去一家短视频公司采访。办公室坐了一百来个年轻人，电脑前是一些修图的脸。墙上有两块电子屏幕，实时滚动着公司短视频账号的粉丝数量。后来，我又来到北京一家卖饮料的新消费公司。我看见一

个专门用来给员工加班睡觉的房间，推开门，里面是十张上下铺，就像一个高中宿舍，但没有人在里面睡觉。

另一些时候，我在事故或灾难的现场。比如，在益阳，一家养老院暴雷，有老人跳江自杀，另一个精神失常的老人在江边敲鼓，被人们解读为给逝者的挽歌。我见到敲鼓的老人，他睡在一间 KTV 里的隔间，两平方米不到，堆满了鼓。KTV 主人是他的妹妹，五十六岁。那间 KTV 也很老了，生意冷清。怎么能放哥哥去养老院等死，女人说，她坐在店门口，嗑着瓜子，一直笑。她的丈夫死了，她也独自一人。接着，白银的一场越野赛，二十一人遇难。深夜，我和同行到了当地，决定直接去殡仪馆碰运气。高速上没有其他车，我们往前开，没有月亮。我们在殡仪馆对面的马路停车等待。一个女孩匆匆跑来，披着一件军大衣。她说起白天去酒店收拾遗物，从父亲的背包中翻出一袋新鲜的李子。我长久记住了那袋李子。

生与死，反与正，热闹与孤寂。每当见到新的人，我总会忍不住提问：你想过上什么生活？常见的答案是钱（或地位）。但更多时候，人们说：我也不清楚。我的困惑并未得到解答，反而有加深的趋势。

这时，也就是在重新回到正常秩序的两年后，我认识了另一个人。最初，我觉得他的生活相当怪异。当我此刻坐在鹤岗的这间房子，无人与我说话。黑夜早早降临，窗外风声呼号，还有干燥的雪。我再次想起他的故事，他的

房子，还有我们最终见面的情形。

* * *

申牧，三十四岁，失业接近五年，负债，远离亲人、朋友，待在河北燕郊一间租来的公寓，不与任何人见面或交谈。

公寓在十九层，他在窗户上贴了一层磨砂，这层磨砂令他无法透过窗户看见外面的风景，天空、鸟、对面正在修建的楼房。

长期一人生活，他开始收集房子里为数不多的声音。电饭煲里沸腾的米饭，冬奥会花滑运动员的冰刀划过冰面，纪录频道中藤蔓生长，用筷子将食物送入口中后的咀嚼。他将它们录下来，在电脑里存放。他细心分辨门外快递员和外卖员走路脚步声。每次点外卖，他都会在订单里备注：“不要敲门！不要打电话！放在门口！”像个警告。外卖员仍然咚咚地敲门。后来他就不点外卖了。

每隔几个月，他的睡眠开启一次循环。第一天晚上11点睡，次日早上6点醒。第二天凌晨1点睡，次日早上8点醒。第三天凌晨3点睡，次日早上10点起。有时是下午2点睡，晚上10点起。黑夜和白天没有分明界限。

有时他出门买菜。一次，他在超市里买来一袋馒头，有个像被老鼠啃了一口。他还是将馒头一直放在冰箱。他

不扔东西。按照他的解释，他尽可能保存生活中的所有痕迹，就好像那些物品已经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因此，申牧家里放着各种各样的物品。首先是曾经真实属于他的：穿过的衣服，鞋子，恋人送的 MP3，明信片。更多是独居后的生活痕迹。冰箱旁放着十六个大纸箱，纸箱半人高，装过牛肉面、宫保鸡丁的铝制薄膜和纸质的方形外卖盒，清洗干净，叠在一起。一个纸箱里装着各个餐厅赠送的纸巾。另一个箱子装着纸质咖啡杯，星巴克的，肯德基的。杯子上有不同活动的印花，春天是樱花，圣诞节是帽子。还有个箱子放着必胜客的比萨小三脚架。

随咖啡赠送的黄糖，随薯条赠送的番茄酱，薯片桶，洗洁精桶，护手霜，柠檬水中的柠檬，滤过的茶叶，剥去米粒的玉米芯，橘皮，鸡蛋壳，鸡的骨头（他将肉剔干净，骨头留下来），还有他的头发，剃须刀刮下的胡须，从耳朵里掏出来的碎屑。这些物品像待在一个现代生活博物馆，各有各的位置。他不会轻易移动它们。

如果单从数量来说，申牧拥有最多的物品也许还是电影。他收集了一整箱电影票，有些票据已经褪色、字迹模糊。他有十一个硬盘，分别装着美国、欧洲、拉美、韩国和中国的电影，已有几千部。锡兰、费里尼、侯麦，这些导演和影片中的人都住在了他的硬盘里。有一个硬盘像铁盒一样，12T 容量。他专门用来存放日本电影。

最初半年，申牧和我在网上断断续续聊到他的生活，

还有他的过去。

他出生在中国甘肃的一个村庄，那是一片干旱荒凉的土地，当地农民主要靠种植花牛苹果为生。申牧家里也有一个苹果园。他的家境在当地人看来不算好，但也不算坏。少年时期去另一个镇子读书，每周走二十公里泥路，有时太累，中午睡在树林里，走得太久，布鞋磨破了，就用绑带绑住鞋子。他考上一所大专，遵循父亲建议选择飞机维修专业。毕业那年，他的同学们大多数去了航空公司。他选择更稳定的维修基地，来到北京。

维修基地在首都机场附近。经过两年培训，申牧正式上岗，签订一份须工作满六年的合同。每天，他换上深蓝色工服，手持虎钳或是测量标尺，来到车间，维修各式各样的被拆解过后的飞机发动机，检查发动机叶片是否存在划痕或变形：几厘米，多深，方向，位置，是否烧蚀，是否腐蚀，然后在叶片打上“超标”或者“未超”的标识。他有时会用专门的孔探仪，更多时候靠眼睛。他的眼睛总是很酸涩。

他不常加班，除了春运或国庆前后工作会变多。下班后他回到公司安排的宿舍，各种各样的酒店标间。他生活的范围不超过那个园区。他和同事们说不上话，也不爱参加要喝酒的聚会。他逐渐感觉自己逃不出这个硕大的车间。

工作两年后，他开始去电影院看电影。起初是看一些商业片，回到宿舍也看，《7号房的礼物》《教父》《肖申

克的救赎》。后来开始看杨德昌的《一一》，是枝裕和的《海街日记》。在电影中，他几乎可以在视觉上抵达任何一个国家，看到人们的生活，那里的街道，风景，树木和海洋。然后是法国新浪潮，再然后，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基耶斯洛夫斯基。有一天下班，他一口气看完了《灿烂人生》，一部时长六小时的意大利电影。看电影时，他似乎把自己都忘了。

申牧很难说清楚自己发生了什么改变。但他认为，眼前的生活绝不是自己想要的。他花了两千元在网上报了一个学习班，开始在上班间隙学法语。在一张“发动机零部件附件交接单”上，他抄下许多单词：

Monalisa 蒙娜丽莎

Louvre 卢浮宫

Marguerite Duras 玛格丽特·杜拉斯

Tomber amoureux de quelqu'un 爱上某人

他看到一部叫《小森林》的日本电影。电影中，桥本爱饰演的女主角无法融入大城市的生活，回到一个叫小森的村子，森林围绕，她一个人住，秋天收获水稻，夏天喝自酿的冰镇甜酒，早晨吃自制面包和磨碎的果酱，一日三餐，周而复始——我能否离开北京，回自己的家乡过这样的生活？

他在一个论坛上发帖：“二十八岁工科男，目前在一家国企做技术员。除了电影没别的爱好，想明年转行，成为一位真正的电影从业者。”

许多人劝他不要冲动，但也有人鼓励他。他说，想到一辈子都要在流水线度过就后背发凉。

有一个自称是纪录片导演的人联系上他。他们签署了一份协议。两人商定，由申牧出钱购买一台 RED ONE 摄影机，另一人进行拍摄，拍摄完纪录片后，器材归那人，但电影版权归申牧。他们起初决定拍一部返乡题材的纪录片：以申牧辞职离开飞机维修工厂，返乡和父亲一起种植苹果作为故事线。剧本里，他们设定电影叫《爸爸的苹果树》。但合作很快失败了。那人迟迟不随他返乡，另有自己的拍摄计划。相处十来天后，两人散伙。申牧花钱买的机器仍然留在男人手上。

春节，申牧回家，父亲认为他受骗了，也不同意他转行的想法。父亲说，你既然喜欢电影，最开始怎么不去学电影？既然现在已经学了飞机，就好好干飞机。申牧还是带了一台相机回家。冬天，父母需要给苹果树修剪树枝，他拿着相机在一旁拍摄。但父亲看他不干活，嫌烦，把他的相机摔到地上。相机摔坏了。

申牧回到工厂。又过了两年，他再次提出离职，此时离合同期结束还剩一年，须赔偿大约六万块。离职后他先在北京通州租了一间隔断房。六十平方米的房子分成五个

房间。他和一对夫妻、一个写代码的大学生、一个女生、一个高中生住在一起。半年后，他决定在同等预算下租一个完整的空间。位于河北的燕郊是不错的选择，来往北京市区有通勤大巴车，半个小时就能抵达国贸，而且房租很便宜。

他决定去燕郊。此后五年，他离那个过往熟悉的世界越来越远。

* * *

鹤岗的房东提醒我，近期情况不明，建议我备好食物，减少出门频次。不过我已习惯了，无论在鹤岗还是北京，都一样。因为新冠，那年生活总是时时变化。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谈论未来了。我打开外卖软件，下单几瓶矿泉水，西红柿，鸡蛋，鸡胸肉，面条。一小时后，敲门声传来。我和戴着口罩、全副武装的外卖员打了声招呼，再将那一大袋东西拿进屋，逐一分类，摆在冰箱。

我坐在桌前，重新翻出申牧发给我的照片。有些是他囤积的东西。比如一盒外卖，已分辨不清原来的食物样子，绿色黄色的霉菌入侵了塑料盒，第一张，第二张，第三张，随着时间逝去，霉菌张开了身体，菌丝复杂，如同迷宫，也像火山的熔岩。还有碎的卤鸡蛋壳，装苹果的塑料盒，剪下的指甲。他将这些东西铺在一块黑色的布上。

在黑布的衬托下，碎指甲就像遥远的星星。

他在日记里写道——

发霉的土豆
像火山喷发一样
泄露了大量的岩浆

晚上，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我翻来覆去，失眠了。半夜3点，我干脆起来到洗手间洗了把脸。我从门口走到阳台，又从阳台走向门口。最后，我回到桌前。我翻开了《纽约兄弟》，一本小说。我曾被这个故事打动，现在，我决定再读一遍。

在这个世界上，做人就是要面对恶劣环境里的艰难真实的生活，要知道只有生、死以及各种人类的痛苦才能模糊掉上帝这样的形象。

一位朋友推荐了这本书，他觉得申牧就像是书中的主角。后来，我发现这本小说改自一个真实故事，写的是20世纪初的一对纽约兄弟。他们原来身处一个体面的中产家庭，哥哥意外失去视力后，为了照顾哥哥，弟弟也辞去了工作。两人渐渐退出社会，在家里囤积大量物品。

被问及为什么选择与世隔绝，弟弟回答说：“我们不

想被打扰。”

1947年3月，警方接到匿名电话，发现两兄弟死在家里。由于家里有太多物品，警察无法打开门，只能打破窗户后进入。他们取出约一百二十吨“垃圾”，包括十四架钢琴，两万五千本书，保龄球，腌制的人体器官，旧款T型底盘，马车折叠顶部，数百码未使用的丝绸和面料，一匹马的下颚骨，生锈的自行车，照相机，婴儿车，无数的报纸和杂志，等等。每天都有两千多人站在屋外观看清理工作。

美国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曾将这对兄弟评价为现代的第欧根尼。据说古希腊人第欧根尼住在一个木桶中，他拥有的所有财产只包括这个木桶、一件斗篷、一根棍子、一个面包袋。亚历山大大帝去拜访并询问有什么能帮到他。他说：请你不要遮住我的阳光。

“请你不要遮住我的阳光。”就像那天，当我最初去到申牧的那间房子，我首先感受到的就是同样的情形。

那是个阴天。在网上聊了半年后，申牧最终同意和我见面了。我从北京国贸出发，坐上815路快车来到燕郊。街边有一些叫作夏威夷、纳威堡的小区，楼房密集得令人心生恐惧。正午时分，我在小区门口等待，有些焦虑。一个男人朝我招手。他有些微胖，戴着一顶褐色GT Hawkins的棒球帽，穿一件很薄的蓝色棉布大衣，牛仔裤，马丁靴，是容易隐藏在人群之中的人。他很沉默，我

看不到他口罩背后的表情，也不知道他正想些什么。

我们吃了一顿仓促的饭。在必胜客。他说长久不见人，实在紧张，一直胃疼。

吃完饭，我提出去他家看看。他有些犹豫，但最后还是同意了。

我们踩着雪小心翼翼往回走，路面湿滑，空气寒冷。他走向一栋公寓楼，周边没有配套设施，只是一栋公寓楼，一个让人睡觉而非生活的地方。

公寓不大。大约三十多平方米，有一张床，一张沙发，一个衣柜。他曾经说的那些外卖盒塑料瓶都整齐地放在门口。窗台摆着胡萝卜皮、洋葱皮、橘皮。窗户贴着磨砂，模糊地感知着光的存在。

回到家里，申牧像回到领地一样，放松许多。我提出想仔细看看这些物品。他从桌上拿起一副灰色的工业手套，将纸箱搬到地上，用刀划开封闭的胶条。那些平日被人们看作垃圾的物品存放其中，尚未分解，没有腐烂。电影票上的字容易褪色。他提前扫描了它们。

电影。是啊，这五年来，脱离现实后，他几乎是彻底沉浸在电影的梦境中。

他有两台笔记本电脑，一台显示器。他在 Excel 表格中将看过的电影分门别类，硬盘越攒越多。他从来不删任何一部看过的电影，哪怕那是部倒人胃口的烂片。半夜醒来，或是下午 2 点醒来，他打开屏幕，随后进入另一个完

全不同的世界。还有电影院。就像猎人狩猎会遵循季节的变化，每当各个地方举行电影节时，申牧就会离开家，直到电影节结束，他才回到家里，然后像冬眠一样很久不再出门。

他写道：

《记忆》：记忆、幻觉、梦境这些都不重要，亦无须去解读它们。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观影体验，我该如何去描述呢？引用片中的一句诗：我灵魂的每一处细微空间，如微生物的分子一般，产生了无器官的联结。这不是一句褒奖，也不是一种比喻。看阿彼察邦的电影，会忘记现实的时间，会忘了此刻真实的自己。那些废弃建筑下的鸟儿，那些雷鸣和雨声，那些被挖掘被清点的骨骼，那些山坡上的树木，那些台阶上小憩的人，那些河流两旁肆意丛生的植物，那些飞舞的蝴蝶。那个萦绕心头的砰的声音，也许是来自宇宙深处的靡靡之音，来自记忆洞穴里的信号。这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沉浸感，也是只能从这类非叙事非线性的电影里才能获得的体验。

再比如：

《安娜的旅程》：凌晨3点25分，我醒来了。我

烤了两片吐司、倒了一杯牛奶、切了一个西红柿、撒了点白糖、打开电脑开始看这部电影。导演的另一部影片《让娜·迪尔曼》是我最爱的电影。看完这部电影时，天刚蒙蒙亮，城市的天际泛起一层渐变的橙色，与青蓝的天空接壤，想起那一年在阿塞拜疆的早晨。她穿梭于欧洲各个城市，去往布鲁塞尔的旅途上，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每个人都有着各自的困顿和哀愁。喜欢安娜的外套，喜欢她的裙子，喜欢她的后背，喜欢她的高跟鞋，喜欢她的裸体，喜欢她在床上反复听电话留言的姿态，我学着她把窗户开了一道小缝，冬日寒袭，世间最美妙的时刻莫过于此。

他情不自禁地想模仿电影中的生活。刚从飞机工厂辞职时，他还有一笔积蓄，决定先抛开眼前的一切去远方。他的第一站是法国。落地巴黎，走在塞纳河畔新桥，买来正宗法棍。他遇到一个打算去瑞士的女生，决定一同前行，两人坐上火车的情侣车厢。那天是狂欢节，车厢里所有人开始接吻。他们对视了一下，也开始接吻。他们一起转去布拉格，吃奶酪火锅，看午夜档《海边的曼彻斯特》。女生来自西安。她方向感真好，他说，欧洲的火车真麻烦，他经常坐错，可她总是能够分清楚。到布拉格，他和女生分别，此后再没有联系。

他继续自己的旅途。在瑞士，他在日内瓦湖边发呆。

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他漫步一整天，不知疲倦。下一站是土耳其。土耳其是导演锡兰的故乡。他去了费特希耶海港，那里青山环绕，停泊着带长桅杆的白色游艇，街边是红顶的房屋。每天他都在海边醒来，看着高大的椰子树和椰枣树，露天餐厅，在沙滩上洗衣服的女人，听着钟楼的钟声。在大阪，他从惠美须町一路逛到日本桥，搜寻演员绫濑遥的写真集。他住在青旅，收集从自动贩售机里买来的饮料罐。半夜睡不着，他就去街上的便利店觅食。

现在，我想起见面那天，他坐在那堆纸箱里——从纸箱倒出来一大堆小票。他戴着手套，一张一张小票往回捡，一边讲起这些旅途。那似乎是他最放松的时刻，像是在讲述终于实现长久以来的梦。

有个网友找到他，说希望拷贝他的电影硬盘资源。他没有回复。后来他在一部纪录片的影评中记录了他拒绝的理由。电影叫《冰山的阴影》，拍的是一个船舶机械师用一台 8mm 的胶片摄影机拍下世界各地的风景。在他死后，这些影像资料被人放到芬兰的跳蚤市场拍卖，买主借此还原了这个人的一生。

他在世界各地流浪，到过埃及、长城、曼哈顿、冰川、丛林、雪山、高原，甚至是已经消失的印加古城，都被他记录了下来。但没有人认识他，葬礼上也没有亲人，他连个朋友都没有。

前天有人找我拷贝资源，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这部电影。

我大概有十一个硬盘，欧洲电影两块，美国的两块，日本一个最大 12TB，还有拉美等其他地区的。这里的每一部电影都记载了我过去这些年迷影的点滴，虽然这段时间在我的人生长河中不值一提，但也是我从青年步入中年重要的阶段，以及我人生的一个缩影。当那些积攒多年的资源突然有了市场价，那种感觉就好像进坟墓。这些资源不单纯是电影。我靠着它们度过了一段体验世界的旅行以及一段坎坷不平的时期。我在想，等我死了，我不会把它放到跳蚤市场上卖掉，我会销毁，也不会留给后代。

重新想起这些事情时已是另一个夜晚。我站在阳台，玻璃窗遍布水珠，映照着模糊的光影。屋里屋外，两个世界，而现实的冷正从窗外那侧逐渐逼近。遥远的汽笛声传来，似有似无，如同夜晚的低语。我回到床边。墙上有一台投影仪。我打开投影仪，一面白色的幕布缓缓降下。我将屏幕调至最亮，从冰箱里掏出一瓶苏打水，再找到一部老电影，杨德昌《海滩的一天》，胶片影影绰绰的斑点浮在墙上。伴随着昏沉的声音，我进入了另一个梦境。

* * *

大约一周后，天晴，我决定不能再这样待在鹤岗的房子里了。趁着雪停，我下了楼。天空很蓝，阳光切开楼房的身体，上面是白色，下面是橙色，掉漆之处如补丁。花坛的雪变薄了，堆着一叠冻烂的白菜。路上，行人搓着手，有些忙着将雪铲到花坛里。

我拦下一辆出租车，决定去北山公园走走。那是鹤岗一座出名的公园，在城市北部，由鹤岗矿务局修建。曾经它周边有许多冒烟、扬尘的白灰窑、采石场、白灰厂。但现在那些厂已经不见了。公园没有边界，一条长长的阶梯通向山顶。雪像被子一样盖在荒草身上，两侧是树林，大多是极高的白桦。

最初，在听说申牧的故事，还有见到他那天，以及后来我反复想到他时，我实则想弄清楚一些问题。比如说，他为什么选择过这样的生活？换言之，这个问题——后来我向来鹤岗生活的人们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实则是，这种逃离，如果我们能称其为逃离的话，究竟能不能通向自由？所谓自由，是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吗？就像人站在一个广场，或是一条漆黑的甬道，此刻，面前出现一些不同的分岔，像手指离开手掌那样延伸开去。分岔尽头会是什么？亮光？一片朦胧不清的雾？又或是黑暗？

我戴着帽子和毛毡手套，迈着重重的步伐往山上爬，扬起的雪粒灌到靴子里面。我想到申牧曾经对我说，刚搬到燕郊时，他住在城中村，走在灰尘扬起的公路——也是

那样迈着重重的步伐。他去面包坊买法棍，听见巷子里摩托车刺耳的鸣笛。他无所事事，下午到必胜客或是肯德基点一杯苦涩的美式黑咖啡，戴上耳机，听音乐广播节目。有天他回家，发现赶上由北京延展开的群租房清退。他搬到一个楼房小区，过了一阵，房东通知说要卖房。他再搬到汉庭酒店，住了一整月，每天待在房间看球赛，行李寄存在酒店仓库。接着，他搬到现在这套公寓，然后在窗户贴上那层磨砂。

他想过重新找工作。比如，当身上积蓄不到五万时，他开始在民航业一个专门的招聘网站上投简历，各种各样的岗位，投了很多份。有一次他正在泰国旅行，对方打电话给他说要视频面试。

视频接通。对方问他，为什么这么久没找工作？

此时距离他辞职已经一两年。他没回答上来。

对方说，你没工作还在泰国玩？

那家公司在广州，也是一家民航业的维修企业。面试没过。他又投了一些写影评的自媒体公号，岗位薪资和原来在航空基地时相近，每月工资六千，地点在上海。但公司认为他年龄还是偏大。他刚过三十岁。可能人一旦过了三十岁，就像成为要过期的商品吧，他说。几次应聘失败，他放弃了，开始对家人隐瞒真实处境。

去欧洲时，他发了一条带定位的朋友圈。同村的亲戚看到了。家人由此发现他在国外。父亲害怕他去国外。他

接着说，以前在工厂，有去德国大众公司交换的机会，学费二十万。如果此后留在大众，学费可以退还。他问家里能不能先借他一些钱，但父亲不同意。申牧说，在人生的几次重大选择上，他永远无法和父亲保持一致。现在，父亲一个月要打两次微信视频给他，担心他会再次私自跑到国外。

申牧的父母认为一定要有个儿子。因此，他有三个姐姐。父母还认为，这个儿子必须回家，结婚，再有个孩子。他的微信上有许多来自父亲的未接来电记录。如果接通，父亲会说些什么呢？催婚，催他赶紧回家。父亲总说，待在北京没有出路。至于姐姐们，其实他和姐姐原来关系不错。不过现在，姐姐都已有事业，成家，过着稳定的生活。

后来，有部名叫《四个春天》的电影上映。申牧买票去看。在电影院，他看到一半，离场了。那部电影同样讲述了一个年轻人返乡拍摄自己家庭的故事。他有些失落，想起曾经写过的剧本，被父亲摔在地上的相机。他第一次看电影中途离开。

我继续在公园里想着申牧的故事。走神后，我才意识到已离最初的入口很远。我不知道该继续往哪个方向走，就决定沿着道路爬到山顶。山上树林更矮，空气冰冷彻骨。我大口喘气，冰冷的气息就像在肺里凝结。太阳快落了，远处出现一片淡淡的橙色。我打开手机搜索导航，手

机立刻被冻得关机，我只好站在观景台注视着山下的一切。远处，高层住宅、低矮的平房、田野、城市、道路，整座城市覆盖在白雪之下。有一对老年游客经过，他们在山顶停留，接着继续向前走。我想到人的来处、故乡、家庭，也想到人的去处，想到申牧说起家乡的村子，他摘完苹果，翻过整个山头，找狼毒草，满天星，摘来一束，放进茶杯，送给姐姐。还有在冬天出现的鸟，背部是黑色，腹部是白色，如同宝石蓝的羽毛。鸟在雪上跳跃。他那天说，如果能够回到故乡，一个人过，自由自在地生活就好了。但现实是，当他待在公寓，从第三年开始，他逐渐远离人群。飞机工厂的师傅发微信，问他在做什么。他没回复。姐姐问他，为什么不回家过年，感觉你与我们隔绝了。他也没回答。积蓄花光，他开始借网络贷款，日息万分之三。有三四个月的时间，申牧陷入黑暗。他一个人去便利店吃便当，也会提前在手机下单，避免和店员说话。更多时间，他待在公寓。唯一的动静来自窗外——偶尔飞来鸽子落在窗沿，为了宣誓主权，他赶走它们。此外，一个网上相识的女孩每周给他打一次电话，只为确定他没死在公寓。

他打开手机拍下视频：一个人吃饭，桌上电脑正在播放日剧，时间一分一秒流逝。视频中他渐渐发胖。一天他剃光头发，搬来台子，站在家里演讲，讲过往经历和失业天数。他希望能通过这样的方式逼着自己说一些话。下一

个视频——房东来检查租房状况，他终于起身，打扫三四个未清理过的屋子，扔掉所有发霉的外卖。再这样下去也许会自杀，他想。他鼓起勇气去看医生。

医生开了药，一片片混着水喝下去。说不清是药的作用，还是新冠来了，总之，当新冠流行，限行开始，他变得平静许多。他很惊讶。闭门不出不再是件怪事了。

我们见面那会儿，说不清是由于惯性，还是他未能找到返回现实世界的路径，总之，他还是按着原有的节奏继续生活。他坐在地上拆开纸箱，随后将它们放回原来的位置。对物体的迷恋和封闭自我几乎是同一时刻发生的。在工厂工作和拍纪录片失败的经历，让他认识到，人的行动随机且深不可测：下一秒去哪，午饭吃什么，晚上听哪首歌，明天见到谁，信任，依赖，或是欺骗，背叛，隐瞒，它们随时会打乱生活的步调。而太阳照射世界的角度，天空蓝色的密度，宇宙射线抵达地表的时间，动物迁徙的规律，这些节律永恒不变。因此他宁愿和物品生活在一起。

随后几天，我们一起翻看 he 电脑里的相册。有故乡的苹果，看似无法走出的大山和荒凉的村庄，苍老的父母（皱纹深深刻在脸上），谈过的恋爱，女孩脸上的笑容，庞大明亮的工厂，还有在欧洲的旅途。不过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他的生活从某个时刻开始错位和偏移，而这五年就像一个真空地带。他不知该如何离开，也不知道该去向哪里。

“这样的生活还会持续多久？”

“我也不知道。”他说。

现在，停留在脑海中，我们分别时的情形——我们不知道该再说些什么，陷入长久的沉默。过了很久，太阳渐渐落下，申牧没有开灯，房间变得昏暗。屋里恢复到它本来的样子，寂静无声。我想起申牧曾在几篇日记中记下同一部电影。电影中，一名老人每天坚持写日记，直到六十岁，有天，他把所有的日记都拿出来在庭院里烧掉，然后，第二天，他又拿出一本新的日记本，一切重新开始。申牧为什么钟爱这个故事？我们就这样坐着，似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我决定离开。他送我到楼下，在我坐上返程的车后，我回头看，他已经消失在黑暗中。

我想着他的身影，那个消失在黑暗中的影子，继续走向松树林。我无法再忍受这样的寒冷，决定下山，松绵的雪一步步塌陷。我走上一条小道，循着路灯走。天越来越暗了，现出一片密度均匀的深蓝，远处那道橙红色晚霞愈加绵延，如同河流向远方。万物轮廓清晰，山峦、树林、昏黄的路灯。我走向城市，回到温暖的屋子。明天，我继续在鹤岗的生活。也许，我还是应该离开这间屋子，走出门，去见人，交谈。我见到另一些人，比如王荔。我后来经常到她的家里。

第四部分



“把坑填满”

来鹤岗开始新生活。王荔这么想，对其他人也这么说。那年她二十七岁。

她从广州来到鹤岗，开始房子买得匆忙，还带着房东的老装修，蒙尘的电视布艺花罩，红木门，一张老沙发。她买来一桶淡蓝色的油漆，站在梯子上刷墙。梯子买矮了，她又是小个子，刷到天花板时，油漆滴在脑袋上，就放弃了，现在边上参差不齐的。房间安上蓝色窗帘，上面有镂空的星星形状。房子敞亮，每当天亮，太阳照进来，晃动的星星落在床榻。阳台有盆栀子。栀子越长越密，一年开两次花，花开时香气溢满整间屋子。

后来她还有了只猫。猫原来是被另一个来鹤岗的男生遗弃的。英短蓝白，正八脸，鼻子有颗痣。她给猫取名叫胖太，希望猫能长胖一些。猫刚来她家时瘦乎乎的，但很快就肥起来。她时常通宵工作，白天睡觉。猫一直在她的身旁。

新的城市。新的房子。新的朋友。新的微信。新的身份。

来鹤岗的人大多不爱谈过去。她也是。如果在一些场合要谈起，诸如家庭，过去的工作，她还是会回答。但后来人们才得知，面对不同的人，她说的也是不同的答案。爸妈早就离婚了；爸妈在老家做生意呢；爸爸在浙江开厂子。她没提过妈妈早已去世的事。在她的叙述中，那是一位常见的母亲，辛苦，多年不休息。妈妈，妈妈真是辛苦啊，为了那个家，工作得那么辛苦。

其他人眼里，她热情，爱出门走动。这不算寻常。来鹤岗的年轻人大多生活在自己的房子，但她喜欢在群里吆喝，有人今天一起去打剧本杀吗？有人一起逛早市吗？有人想去北山公园吗？后来她也放弃了，多数时间还是只有她一个人。夏天，她去北山公园，看那里的森林、湖泊，还有游走的水鸭。有次她追着两只水鸭跑。唉，你看，她后来说，那鸭子都不理我。她爬到山顶去看落日。可能因为纬度高，鹤岗的落日真是漂亮。经常到下午三四点，太阳快落了，天深得像海，随后，远处出现一大片流动的火焰，那火焰会将整座城市包裹起来，只要见过一次就忘不了。

你们真该去看看北山的落日，她说，太美了。

不过，她说不清，就像她始终觉得生活有部分没法填满。有天，她在墙上贴了四张提醒自己的便利贴。其中一张写着，把坑填满。在“坑”字旁边，她又补充：“（一自己）”。想要填满的究竟是什么呢？

鹤岗冬季萧瑟。大风卷着雪，袭过楼房，行人，路旁黑色的松树。窗外总是白茫茫。她想到那个从楼上跳下来的男人。她下楼，看见一群人围着，走过去，看到一床卷起来的席子。

生活的目标就是挣钱，挣了钱，就有能力养老。她总是这么说。她爱讨论养老的事情，还想过未来离开寒冷的鹤岗，去云南买一个带阳台的小院。

睡不着的夜晚，她躺在床上，抱着龙猫抱枕，打开短视频软件，听一个男生唱歌。她有时会给他刷嘉年华，让他唱陈奕迅的《好久不见》。她爱旅游，去过西边的大理，东边的平潭，看海里的蓝眼泪，在一座山上擦破脚踝。后来，她还飞到更远的地方，巴厘岛，走在悬崖边看海，买猫屎咖啡做纪念礼。回来路上，她在飞机上遇见几个华裔，还说，未来要一起在印度尼西亚投资奶茶店。她可能是希望用这些来填满什么吧。

* * *

我和王荔一起在九州松鹤小区里踩雪。夜里12点，她在雪地里跳跃，留下一串脚印。一间阳台挂着成串彩灯，有些昏沉。街道空荡，寂静，只有风声。寒意从鞋底渗上来。我们沿着九州松鹤的外沿走。看到天气预报，她在群聊里问有没有人一起下楼看雪。见面后，我们走到主

干道。雪经过车辆碾压结成天然滑梯，她一步一步滑下来。走完一圈，有男的跟在我们身后，她悄悄提醒我快走。她说，在这里遇见过自言自语的疯子。白天，一些老人在垃圾箱前拾荒，面庞遮掩在厚厚的帽子和口罩背后。有人在楼房的角落里撒尿，将雪染黄了。

“住在这里，你要小心。”她说，“鹤岗本地有点钱的人都不住这儿。”

第一次见面，王荔站在街头，及肩髻发，裹在一身黑色羽绒服里。我们约着一块儿吃云南米粉。风中，她端着一碗油泼辣子，说这是用绞肉机打碎，再用油炒的。这儿真没什么好吃的，她说，不吃点辣椒，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了。

她住在我背后那栋楼。就这样，我们约着一起去她家看猫，一起喝鸡汤，越来越熟悉。每次进门，王荔总是习惯将门反锁两圈。她说邻居是个中年男人，总来敲门，有时还在楼下等她。她报过警。警察只说让她进门反锁，同时给她留下一瓶辣椒喷雾。但如果要搬家，她又觉得麻烦，打算先忍耐再说。

过去的事，她最初提及不多。前几回，我打量着这间房子，沙发上的熊玩偶，深浅不均的蓝色墙漆，门口的鸵鸟蛋。她习惯穿一身毛茸茸的睡衣，坐在电脑前。我在床上坐着，看着她的背影。她从哪儿来？她为什么来到这里？

有天她喊我来喝酒，到时，桌前已放着一打青岛啤酒，一袋花生米，还有几袋薯片。她拧开啤酒，递给我，自己也开了罐。不一会儿啤酒瓶空了。猫走过来，在沙发找到角落躺下。我们碰杯。这时，王荔讲起过去的事：

你知道，年轻的时候都想往外跑的。我老家是四川泸州的，毕业后，我第一站就去了北京，那时候北京还有好多工厂，我表姐在那儿，昌平一个服装厂。我也去了，厂里什么衣服都有，我就弄牛仔褲的扣子。但干了两月就走了。然后我就到广州，学了设计，到一家淘宝店铺做美工，做了三四年，每个月七八千工资吧，但是真的是太累了，早上9点就得去，到晚上9点才能回来。

广东热，你有没有经历过广东发霉的回南天？墙都是水，湿答答的，摸上去手一层水。当时我住在番禺郊区那种小公寓，你看过日本动漫没有，一长条，一户一户的。房租每个月三千多。那时候有新冠，我心情也不好。楼梯灯坏了，房东让我们给他摊钱，平常抠门就不说了，连这个灯都要抠，凑的钱都够给他买豪华大吊灯了，我和他大吵一架。我受不了，在网上搜房价便宜的地方，就来鹤岗了，我也只买得起这里的房子。

她讲到来鹤岗的那天，住了家简陋的酒店，认识中介后，没过几天就买房了。第一次有房子，那感觉就像是有了退路。

我不知道会在这里住多久，可能住一两年就回家了。在家的时候，我妈每天骂我，我怀疑她更年期到了。我和爸爸关系也还行，骂是骂，但还是一家人。现在爸妈在老家做点小生意，还不能退休，我有个弟弟，真的，马上要结婚，用钱的地方多了。他自己赚的钱不够花，还娶妻生子，我说你还有勇气娶老婆生孩子？他也就是公务员，工资几千块钱，老婆也是公务员。

我特别排斥婚姻，就是因为我妈太辛苦了。我从小看着妈妈辛苦到大，她没有一天是休息的，在我的印象中，她早上天不亮就出去了，家里那时候还有几亩地，除了打工，还得回家种地。为了孩子，为了孙子，把一切都牺牲了。我妈想要我走那条老路，我坚决不走。

她还讲到老家，说到泸州的山，山上的雾，山下的小镇，大片油菜花地，还有同学，其他人早早结婚生孩子，她们就像身处两个世界了。

能离开原有的生活，还有最直接的原因：金钱。

“我算是幸运的。”她继续说，她爱看漫画，《海贼王》《灌篮高手》，也看很多没人知道的。总之，她意识到那些漫画能赚钱。辞去美工工作后，她开了自媒体账号，从其他国家的网站搬来漫画，比如韩漫和日漫，推荐新番，再招聘翻译和嵌字。搬运的漫画多讲爱情，“能让人心扑通扑通的类型”，她也最爱看这种：

“昨天，我满脑子都是你。（猛抓，紧紧握住手）是因为喜欢你，才会这样的，因为爱你……”（《海边之夜》）

“仔细想来，哪有家人会十年都不联系一次呢。是我想得太好了，我还以为他们有什么隐情，只有我还紧紧抓着代表家人的那根绳子，我走了十年，终于走到绳子的末端——那里却没有任何人……太好了。”（《四周恋人》）

搬运漫画的公众号和微博很快有了三四十万粉丝，她的收入也是原来的两三倍。汉化组越来越大，她是负责人。不过对于她的现实生活，那个世界里的人了解不多。她和汉化组成员只通过网络联系。

“工作上说的都是工作的事，没人关心你的生活，一点儿也不关心，只是无聊的时候吹两句。”她说。

之前，她要写“校园情感”类的漫画脚本，就在网上

搜有关爱情的“格言”，发到鹤岗定居者的群聊里。

1. 我们期待爱是永恒的，但是爱是流动的。

.....

10. 爱你是我唯一重要的事，莱斯特小姐。有人认为爱是性，是婚姻，是清晨6点的吻，是一对孩子，也许真的是这样的。莱斯特小姐，但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我觉得爱是想要触碰却又收回的手。

“还谈啥爱不爱的。”群里人多是对爱情充满怀疑的独身主义者。

“我还想遇见真爱啊。”她回。

在广州，我家常备啤酒。那时候分手，有点嗜酒，喝了一罐还想喝一罐，只要有啤酒，全部喝光。等来鹤岗的时候，我才算走出来，真正想要重新开始了，但是，我发现没有人能让我重新开始了。

我们举起杯子，又碰了一杯。在鹤岗，我认识的人里，少有人像王荔这样愿意讲对爱情的渴望。其他人爱拿她开玩笑，叫她“恋爱脑”——这是个庸俗的流行词，但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这个时代人们对爱情的看法——什么样的人在当今还信仰爱？也许是过于天真，如同现在的

人们看待“理想主义”一样。她又讲到来鹤岗后对一个男生动心的经历，沉浸其中的快乐，好像陷入爱情能让她忘掉自己。

酒快喝光了。我们还没醉。王荔打开美团，搜到一家便利店，又下单了四罐果啤。

“我一个人喝酒的时候，就喜欢看《灌篮高手》。”她说。

“你最喜欢里面的谁？”

“我喜欢樱木，不喜欢流川枫。这酒不好喝。”

“你为什么喜欢樱木呢？”

“你去看就知道了，流川枫是天才，但樱木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然后他一步一步努力，就像我们一样。”

原来在广州，她经常和同事一起去喝酒，唱歌，玩狼人杀，城市生活丰富多彩。到鹤岗后她就一个人活着了。尤其下雪那阵子，路上湿滑，她出门很少，有次还在路上摔了一跤。白天短暂，黑夜漫长。第一年冬天，她觉得难以忍受，想离开鹤岗。后来她加进鹤岗的群聊，认识了其他来这里生活的年轻人，才决定又留下来。她很活跃，总在群里说话。

“出去见见人，你得跟人说话，不跟人接触，不跟人说话，真的会生病。”听说我睡不着，还找共同认识的人开了些助眠药，王荔以一个过来人的姿态说。

“你像群里那些人，我真搞不懂了，他们怎么能那么

久不出门？那么久不和人说话？”

“可能因为这样，大家才都养猫。”我说。

她点点头。“有只猫会好一点。”

“你的生活目前有什么目标吗？”我又问王荔。

“赚钱。”她说。

“赚钱是为了什么呢？”

“赚到钱，才有能力养老。”

“我老听你提养老，你怎么这么在意这事？”

“你不害怕吗？我老想，来鹤岗之后，这辈子可能会孤独终老，每次在街上看到那些捡垃圾的老太太，我心里真害怕，你知道吗？我特别害怕。”

“就像我这种人，可能在这死了一星期都没人知道。”她继续说。

“那不会的。”我说。

“在这里，一个人在外地，跟邻居也不熟。比如说，我跟你还有 A 算熟的，如果我一个星期不在群里说话，你们会来找我吗？”

“肯定。”

“你们可能会发现我的尸体。”她笑着说。

当时，我以为这是她的玩笑话。来鹤岗的年轻人都爱这样说。群里，人们说如果谁好一阵子没说话，就互相上门看看。我参加另一次饭局时，一个女生说她从夜里 3 点睡到第二天晚上 9 点，醒来都不知道几点了。桌上一人吓

唬她，说别死在家里变臭了都不知道。女生揍了他一拳，说她在家能出什么事？

酒喝完，我们醉了，并肩躺在床上。隔壁一个女人正在吼叫。王荔耸肩，她说已经习惯邻居的争吵。我听不清女人具体在吼什么。摔东西的声音，墙壁这头只听见一些喑哑的闷响。接着是一阵火车汽笛声。那天依然有夕阳，此前远处的马路笼罩在一片红色里，还有那些房子。不过现在，天黑了，窗外景象很空旷。猫跳上床，她摸了摸猫。我想着她一个人生活的情形，从窗外看来会是什么样子？亮着的白炽灯，她站着，或是坐在桌前，她往窗外看去，她在想些什么？



剧本杀、饭局与猫

到现在，我也无法确定，在鹤岗的人多大程度上愿意袒露自己真实的内心。我也不确定，即便有人愿意谈论，其他人又是否真正在意或好奇。大部分时候，人也许更关心自己。人面对自我本就是个困难的事，又来到了这样一个不知会待多久的地方，处在临时的状态里。即便大家坐在一起，言笑晏晏，内心也早已划下了界线。我很快接受了这里的规则：控制自己的好奇心，别多问，别深究真与假。大家彼此称呼网名，不打听真实名字，不对他人的过去刨根问底。如果有信任，有友情，也接受它随时结束的可能。

有一天，王荔在群里说，她想去玩剧本杀。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决定去看看。王荔给商家打了电话，约上我和此前见到的女生 A。碰头后，我们钻进一辆出租车，来到有酒吧、剧本杀店、桌游馆的二道街。路上我们有些兴奋，也有些紧张。王荔说，她爱玩这些，觉得这是认识新朋友的好机会。但鹤岗年轻人少，想组局得碰运气。A 和我都是第一次玩。

商家约来三个年轻男生——商家通常会安排同等数量的异性玩家。他们身形很宽，正在大堂里坐着等待。我们走进一个密闭的房间，坐在桌前。桌上放着角色名片，还有薯片、碳酸饮料。男生坐一排，女生坐一排。我们将厚厚的棉服脱下，挂在墙上。桌上放着六份剧本，名字叫《告别诗》。“这个本在全国都很流行。”工作人员说。

剧本很厚一沓，有关六个少年少女。每人领到不同角色。王荔的角色叫林星落，哥哥患白血病，她出生只为给哥哥提供脐带血，此后寄人篱下，直到父母离世才搬去和哥哥一起生活。我的角色叫楚云歌，遭受校园霸凌。A扮演苏澄，家里遭遇纺织厂大火，父亲患有尿毒症。我们同住在橙花街，同读一所学校，男生是我们的哥哥、同学或爱慕的人。中间，男生女生搭着彼此的肩膀。工作人员想着办法令我们发出笑声。有个环节是男女两两成对，分别拿着一个纸杯，中间用红色绳子连着，互相说“我喜欢你”。我们照做了。但我始终无法进入这样的氛围，感觉像在受罚。

那天，王荔在刘海上夹了个粉红色夹子。她捧着剧本，很是投入，按照剧本一字一句读——

林星落的任务：

向大家炫耀一下你和陆泽远的迪士尼暑假！

打听一下这个暑假大家都在做什么，一定比不上

你和陆泽远的烟花暑假！

隐瞒给顾言准备的惊喜。

当剧情推动到结尾时——高三那年，有一半人死于一场地铁灾祸——我们扮演的实则是一些幽灵。十年后再相聚，我们——角色们来到墓园，向过去的感情告别。

音乐响起，在场的人哭了起来。我对面的男生在哭，A 和王荔也在哭。

“你怎么不哭？”对面的男生问我。

男生女生们用纸巾擦完眼泪。演出结束了，我们从剧本中回到现实。剧本收走，进入交谈环节。男生们二十岁出头。两个男生说，他们去年刚刚毕业。一人说，鹤岗的年轻人都往外跑呢，留在这儿找不到工作。后来我得知，他们一个人留在这家剧本杀店做店员，另一个去了养鸡场。最后一个男生——我此前提到的鹤岗“富二代”。他说刚从外地回到鹤岗，准备去做公务员。

“省编的，而不是市编的。”他强调。

“你们鹤岗本地人是不是人均三四套房？”王荔问。

男生没有犹豫。“我有四套，一套高层，一套复式，一套多层，一套别墅。”其他人没说话，他接着说，“马上明天还要过户一套。”

“鹤岗的一套别墅多少钱？”

“一百来万吧。”他说，“但鹤岗房子，不值钱。”

注意力来到女生身上。“你们不像是本地人。”一个男生说。

“我们都是外地的。”王荔说。

“来鹤岗干什么？不会是来买房的吧？”另一个男生说。

“对啊，我们都在鹤岗买了房。”A说。

“还真买了房啊？”他们有些惊讶。

不过，对话就到此为止了。活动结束后，我们建了一个群。“富二代”在群里分享日常生活：车坏了，正打算修，也可能换一辆更贵的车，这两天只能骑着台荣摩托去街边买蛋堡。他问我们要不要去骑马。另外两个男生后来不说话了。

“男的一炫富，八成想泡妞。”回九州松鹤的路上，王荔说。

接下来一周，每到晚上，王荔结束漫画工作，A结束游戏工作，我们又去剧本杀馆玩恐怖故事、推理故事。有天，我们坐在装潢成血红色的房间，谈论凶杀、鬼怪、诅咒、探案，在有工作人员扮演的幽灵房间尖叫。三次体验后，我们很快失去兴趣。A恢复两周出门一次的频率。王荔时常在群里说，好无聊啊。

但人毕竟是社会动物，还是想和人一起待着。哪怕只是一起演一场剧本杀，能坐在桌前，扮演一个角色，念台词，假装有感情，戏散了随时离场，也好过总是一个人。

在鹤岗也是这样。人们相约在干净明亮的餐馆，吃着冒着油的五花肉片，喝有浮沫的啤酒，来一局卡拉 OK，牌桌上的方块或梅花。群里人称呼这种关系为“饭搭子”。

那天，宁夏人组局，王荔、A，还有个男生，我们第一次相约吃饭。宁夏人开着宝骏保姆车接上所有人，来到一家音乐餐厅。餐厅很吵，一对中年男女在台上唱歌。人员到齐后，人们围坐在一起，但似乎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等菜时，人们还是在手机上打字，在微信群里聊天。台上的歌声盖住了我们的沉默。吃完饭，宁夏人提议一起去唱卡拉 OK。我们继续坐上他的车，车子晃晃荡荡，音响里放着花儿乐队的《静止》。到卡拉 OK，点上一打雪花啤酒，宁夏人是个麦霸，唱《纤夫的爱》。其他人不太唱歌，拿来扑克，一直打牌。最后，来到“鹤岗小串”烧烤店，人们开始谈论群里的玩笑话，比如王荔以前的恋爱经历。

“你个恋爱脑。”宁夏人说。

“恋爱脑怎么了？我想遇见真爱，这有什么不对吗？”王荔又说。

“但在鹤岗想谈恋爱，就像在垃圾箱中捡金子。”A 说。这是句玩笑话，但另一面也讲到现实之处。鹤岗年轻人少，能让王荔动心的“理想男生”就更少了。

“我已经和父母说了，我给你们养老送终，但别想让我结婚生孩子。”宁夏人又说。

A 和他碰杯。“英雄所见略同。”王荔也碰杯。

不过，没人谈论过去，共同的兴趣和话题也不多。一打啤酒下肚，只有宁夏人还在说话。他说自己之前在银行工作，辞职后去河南平顶山一所乡村小学支教。那个村子太穷，穷到没有自来水，只能接雨水喝，我当时还想过给村子修路，你知道得要多少钱吗？个人的力量太小，真的，他一直说，现在他有些后悔，还不如一直在银行里待着。

桌上只有我在听宁夏人的讲述。王荔和 A 垂下头，刷手机。她们没太多兴趣。王荔只想回家，此时快夜里 12 点了。从我们上次打剧本杀见面起，A 快十天没出门，今天提了四袋垃圾下楼。我想和 A 聊聊，她往后退缩。她总是以玩笑话来掩饰与他人之间的距离。

一周后，宁夏人又请我们去他家吃饭。他热爱张罗一切，我们几乎什么都不用操心，他备餐，洗蔬菜，切肉，切蘑菇。他有一个双开门大冰箱，里面有很多料理包——卤肉饭、日式咖喱土豆饭、腊鱼、榴梿雪糕。我们拿走冰箱里的食物，他也只是笑笑。但正因为是在鹤岗生活的人们不轻易谈论过去，人们也不知道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有人提到一个女人的恋爱故事。另一人说，可是这有证据吗？

“说不定哪天有一个人说，我其实离异，带着两个孩子，谁又知道真与假？”女生说。

“那你在鹤岗做什么？”王荔问她。

“在网上卖卖游戏装备。”女生说。她继续刷手机。

饭吃完，人们又不知该聊什么了，就到宁夏人的健身房中去看猫。一只长毛狸花，不过巴掌大小，是宁夏人前阵子从装修店里捡回来的。猫躲在健身器械的角落。“天哪，这也太可爱了。”王荔说话总是很昂扬。她给它捏了鸡蛋黄吃，又掏出手机拍照。宁夏人给猫添粮添水。每个人都上前摸了一把猫。

气氛轻松起来。在鹤岗，猫总是最好开启的话题——谈谈猫吧。这只猫是如何来到你的身边？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它亲人，还是恼人？它爱玩逗猫棒，还是硬纸箱？它喜欢弓起身子满屋跑，还是一直躺在窝里懒得动弹？它会趴在你的胸口睡觉吗？谈谈猫吧，到此为止，安全，绝无可能造成冒犯。人们知道该问什么，该回答什么。来鹤岗的人里，几乎人人都有猫。

讲到猫，不得不提到在场的女孩C。C将宁夏人的狸花猫抱在怀里。猫用爪子抓着她卫衣。C二十九岁，扎着马尾，掉发有些厉害，戴副眼镜，像只疲惫的熊。她开网游工作室，卖游戏里的虚拟物品。半年前，她带着六只猫来到鹤岗。前阵子过生日，宁夏人送了她一只小泰迪。现在她的家里有六只猫，一只狗。

这桌人里，C只和宁夏人相熟。面对其他人，她总是一副警惕的神情。后来我才知道原因。最初我加她好友，

我的微信没有注明性别。她的微信头像是个露着肚脐的苗条女人。之前群里有陌生男人加她。“他问我，我总是不出门，花钱还大手大脚，是不是被包养了？我说你有病，关你屁事。”此类烦心事发生过不少次。“我的生活，你别来指手画脚。”

我第一次见到C是在一场烧烤聚会，那次宁夏人也在。烤盘里有生牛肉、里脊、香肠吱吱响。直筒油烟机将烤盘产生的油烟抽走，发出沉闷的轰鸣声，肉的香气。桌上摆着鹤岗本地饮料“小香槟”，绿色玻璃瓶里冰淇淋味汽水泛着气泡。C拿来打火机，点娇子烟，烟头亮起橙色的火光，随后又熄灭。

C在聊她的猫，讲在鹤岗如何给猫洗澡的事。我听说她一个月才出门一回。

后来我到了C家里。她住在鹤岗很偏远的角落，离开城区，穿过低矮的村庄，还有一些灰色薄膜搭建的蔬菜大棚才能到她家。大棚搭在路边，像发光的虫茧。顺着主路，来到没有边界的楼群。她家处在边缘中的边缘，背后雪原深不见底，整齐干枯的松树像哨兵列成一排，粉色的晚霞就在不远处，一小点月亮升起来。这里听不见鹤岗城里常常能听见的火车汽笛声。

六只英短蓝猫藏在家里。猫长得一样，深灰色的皮毛，威士忌颜色的眼珠子。其中两只折耳、一只矮脚。她钟爱英短蓝猫。我在屋子里寻找那些漆黑的影子，床底

下，窗帘背后，最后那只躲在卫生间洗手池下面。泰迪很吵，身上剃了毛后小得可怜。每当我们去摸猫时，泰迪嫉妒得去打猫。过了一会儿，猫习惯生人的到来，深蓝色的影子从一个角落蹿到另一个角落。

在宁夏人的介绍下，我和C单独见过两次。但想和她聊更多还是很困难。她下午3点才起来，没吃中饭，刚洗完澡，头发湿漉漉的。她走到厨房，做土豆烧腊排骨，蛤蜊汤，豆干炒五花肉。做完饭，她回到电脑前。

“你睡觉时猫在哪里？”

“看它们心情。”

“你今天做了些什么？”

“什么都没干，刚睡醒。”

“昨天什么时间睡的？”

“打《超击突破》，玩了一晚上。”

“自己玩还是和谁一起呢？”

“别人陪着我玩，我给人钱，人家陪我娱乐，这不是很好吗？”她沉默了一会儿，继续抽烟。“很乏味，没有工作让人乏味，我感觉找不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就很难受。”她的目光转向电脑，右手嗒嗒地敲着鼠标。

电脑屏幕里显示着游戏、YY频道。虚拟房间不断弹出消息。她看了很久——老板约陪玩见面的桃色新闻，陪玩之间的钩心斗角，诸如此类。她爱点游戏陪玩。最近打一款射击游戏，她每晚固定点三个陪玩：两个男生，一个

女生。四个人组成一支队伍。陪玩价格一人一小时五十元。她一晚上能花掉七八百元。刚来鹤岗那阵子，她几乎每天都找陪玩打游戏。她在一个男生身上花了两三万。后来，那个男生说要来鹤岗找她。

她笑了笑。“我说，那你用什么身份来找我。如果不是我给你钱，你会跟我说话吗？”

打通电话后，她和陪玩分享彼此的生活，游戏战术，也聊一些琐事。金钱建立的关系在某些时刻是稳固的，也能够换来话语权。她随时喜新厌旧，腻了就换一个人。她并不知道陪玩的长相，彼此了解仅限于声音，游戏，金钱上的来往。她对现在固定组队的三人很满意，“反正，情人节，三个人都给我发红包，我过生日，个个都送我礼物。”

此前的一场饭局，她讲到过去。她说，她出生在重庆的一个村子，父母在养殖场工作——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你要是个儿子，就没有你弟弟什么事情，可是男是女我能选择吗？爸妈之前外出打工，四岁我才见到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我记得那么清楚，妈妈回来，给我买了一条裙子，还有头上的扎花，我好开心，可回来的时候头花被摘掉了，妈妈看到花没了，反手就是一巴掌。她像是第一次意识到有个女儿可以打。十三岁，

弟弟去河里游泳，妈觉得是我的错，是我没看住，放了一池子水，把我的脸往里面按，不是亲戚拦住，我应该已经淹死了。

“要一份醋泡海带。”说到这里时她停下来，叫来了服务员，继续剥虾。她说话的声调忽高忽低，有时语调欢快，像是在讲述一些和她毫无关系的趣事，可有时她像是沉浸在那些遥远的回忆里，像在思考些什么。

我和宁夏人坐在对面，戴着一次性手套，上面沾满红油，只是静静地听。后来宁夏人告诉我，他们认识半年了，这也是他第一次听C说这些。

成年后，我第一份工作在印刷厂，印刷纸壳。纸壳很锋利，很容易将手刮出血。然后我回重庆，找各种各样的工作，开始做游戏里的“打手”，在一款网页游戏上帮人练级，抽装备。那时候，我一天能打十六七个小时的游戏，通宵熬。我年轻，也过够没钱的日子了。后来店里几乎所有事都是我干，找打手，组团，上架，弄网页。2017年在里面学，一八年我就决定自己出来干，一九年当老板……你问我这么多年怎么过来的，我也不是一步就跨到现在这个阶段。后来我自己待着，在市中心租房，平常也不出门，最长有半年时间都没离开过出租屋。

然后她买来猫，第一只，第二只，第三只。其中两只猫一起生了五个孩子。她送走两只，还剩下三只。但是那天，当门打开，别人正准备来接走它们，三只猫忽然一起往她的身后跑。

“那一瞬间，你知道吗？原来我也会被需要。”她说，“我不送了。”她决定和六只猫一起生活。后来她看到一个鹤岗短视频博主的视频，远程买房，远程装修，然后来到鹤岗。

“这里不会和我的过去纠缠。”她说。

宁夏人说：“但你在鹤岗也认识了一些新的人。”

“可是我并没有与他们深交。”她说。

“也是。”宁夏人想了一会儿说，“来鹤岗，没有人会关注你的过去。”

那天晚上，我在微信上问C，能不能改天见面再继续聊聊过去的事。她说算了吧，来鹤岗的人大多不想提起过去。当我坐在她的家里，和她肩并肩坐在卧室的电脑前。我环顾四周，看见床尾放了一对熊娃娃。两只熊大约有一米六那么高。如今，我已记不清楚熊娃娃更具体的样子，只记得它们的眼睛是圆形黑色纽扣，白色的毛上有一层灰。其中一只写着“LOVE”，另一只上是“YOU”。“这是你从重庆带来的？”女生点头。我猜它们一定是曾经对她很重要的人送给她的，比如分手许久的恋人，或是远在

南边的朋友。我想着她将两只熊塞进缠着胶带的箱子，带着回忆，过去的情感，打包成行李运到鹤岗。我准备继续问下去，又想起她此前那句话，不要再谈论过去了。我决定不再问更多。

不过，在宁夏人家里的那场饭局，没人谈及这些，没人会提起来鹤岗前的事，王荔不会去问C为什么要养六只猫，C也不知道王荔在鹤岗做些什么。人们忙着夹菜，或是摸猫。因而这场饭局只是以对邻居的讨论收尾。

“我楼下有一个卖螃蟹的商铺，吵得轰轰响，投诉也没有用。”一个男生说。

“我楼下的像死了，听不到声音。”C说。

“我隔壁的邻居总是吵架。”王荔说。

吃完饭，我们去宠物店接女孩C的狗。C让店员给泰迪洗澡、剃胎毛、做体内外驱虫，因为皮肤上有些疙瘩，还泡了药浴，重新穿上一件粉红色的衣服。将狗接出来，C直接将泰迪裹在自己的羽绒服里。狗冷得哆嗦。我们送C回家，穿过那些白色大棚，然后到楼房，爬到六层，我们下来。C打开门，一只蓝猫远远看我们一眼，立即逃走了。

回去路上，我和王荔坐上一辆出租车。窗外还是熟悉的景致，黑色的松树，牢固的雪。我和王荔坐在后座。王荔忽然说，昨天夜里2点，似乎有人转外面的门把手。她躺在床上，不敢动弹，心想再转一次就报警，可等着等着

也没听到声响，她就睡着了。

我问她，怎么不在群里说一声？

王荔耸耸肩。她似乎已习惯一个人面对一切。也许，在鹤岗，人们已习惯一个人面对一切了。

离开鹤岗

我在鹤岗的生活逐渐接近尾声。天气晴朗时，我跟着中介去看房子。兴安台，九州松鹤，时代广场，售价三万元的，四万元的，毛坯房，老式装修的房子。太阳穿过玻璃窗，照在厚重的布艺窗帘上。

“买一套也不吃亏。”中介说。

“可能明天我就在鹤岗买房了。”我回答。这句是真心的想法。习惯鹤岗的寒冷后，我认为，买套房子，在此停留更长一段时间也不错。但还有后面的一句：“让我再想想。”

最终，我还是没能下定买房的决心。除了现实的忧虑，比如，在鹤岗，我该以什么方式谋生？做短视频？——通常，在鹤岗做短视频博主，往往会转型做房产中介来挣钱。剩下的就是一些寻常选项，餐馆服务员，装修工人，或是考公务员。但除了这些，更重要的是，在鹤岗待到第二个月，我开始有些怀念在北京的生活。我想起地铁十号线，在拥挤的人流里看着车窗外的倒影；我和朋友去喝酒，骑共享单车在夜晚的北京游荡。有时要忍受沙尘暴，也为在

公园的漫步心满意足。有人走，同时也有新的人来。北京是个大城市，也许鹤岗只是一个更小的北京。我越来越清楚，我还是会离开鹤岗。

“你快点走吧，”宁夏人总是这样对我说，“在鹤岗，你做不成事的。”

“什么事？”

“任何事。”他说。他随时都可能离开鹤岗——来年春天，他的确离开鹤岗，去越南做生意了。

另一天，我来到王荔家。她又与我相约喝酒。我看见她在卧室墙壁新贴上四张便利贴：

把坑（→自己）填满

小红书画画

悲喜自渡

找到爱好

她说，工作出了点问题，有些烦。我们开始喝酒，她喝得很快，讲她的工作，感情，对未来生活的想象，对年龄和婚恋的担忧，想摆脱的事情，无法摆脱的事情。她那时说，过年回家，家里又要给她安排相亲。她也不清楚这份自由职业能持续多久。我们喝得醉醺醺的，然后睡着了。天亮得很早，她的猫从房子的一端悄悄走到另一端。

奥密克戎正在逐步接近。很快，宁夏人开始发烧。他

在一次 KTV 聚会被感染。人们开始准备物资。我和王荔一起去超市买橙子、电解质饮料、排骨、西红柿。街上戴口罩的人越来越多。我在网上提醒林雯，但她不在意，说有五六包布洛芬颗粒，还有三四十颗柠檬。人们说柠檬对病毒有奇效，鹤岗的柠檬很快断货了。再说，她那儿食物管够。

另有一天，王荔一个人跑去时代广场的咖啡店喝下午茶。店里只有她一人。她点了份草莓塔，草莓碳酸汽水。傍晚，她敲门，来我这儿待了一会儿。她坐在沙发另一端，小小的身体像陷进去，还是用那样昂扬的语气，说在路上看见一只流浪猫，很想去救它。又说到感冒的事：“我绝不会发烧。”第二天她就发来一张试纸两道杠的图片。就这样，我和身边的人都开始经历高温的袭击，肌肉的酸疼，还有嗓子被火烧一样的灼痛感。

我躺在床上，一时清醒，一时眩晕，拿来湿毛巾放在额头，偶尔看看群里其他人的反应。我想起这些天，我和这些来鹤岗的年轻人，林雯，王荔，我们一起经历了一些共同的场景——它们提供的是那样一种日常熟悉的感觉——剧本杀店里昏暗的灯光；人们家里沙发上的猫毛；扑克牌局，骰子，1664 牌啤酒；宝骏牌保姆车行驶时播放的音乐；林雯炸串店油锅里的吱吱声和柠檬的气味；兴安台露天的市集，老人簇拥着走，摊贩卖的冻鱼、冻鱿鱼、冻梨、冻柿子、活着的林蛙、剖开的羊蝎子、热腾腾

的灌肠；“鹤岗小串”里酒杯相碰的声音；一间爵士舞蹈工作室的镜子里，女孩伸长脖子；大世界商场楼顶的落日；扎在楼梯扶手上的红色双喜气球；因寒冷越发稀薄的空气；火锅桌上谈论的绯闻、流言、偶然生出的爱意。人们有时亲密，有时疏离。

我那时想，无论到哪，生活始终是生活，无法绕开。
无论多想躲起来，人毕竟是人，人还是需要人。

大约在一周后，或是更久之后，生活再度归于平静。我决定走。

临行前，我最后一次在鹤岗漫步。天蓝得深邃，路边松树被雪压弯了枝头。我来到一座用于运输煤矿的塔楼，那座塔楼高大，陈旧，土黄色的砖墙透露着威严的气息。围墙前是一句标语。一个老人裹在黑色的棉服里挪着步子。然后，我又来到矿山公园，雪、裸露的矿层、白桦树林、电线杆，依次从车窗前晃过，如同一席流动的画。晚上，回到住处，我看见楼道扶手上扎满红色的双喜气球，直至我所在的楼层结束。原来是隔壁邻居要结婚，这些天发生在走廊上的喧闹来自于此。

第二天，我打包好行李。临行前，我最后看了一眼这个临时的住所，光从窗户照进来，既不特别明亮，也不特别昏暗，我看着那张椅子，床，沙发，总是发出嗡嗡声的洗衣机。下楼后，我又看见那辆熟悉的宝骏车。宁夏人和王荔坐在车上——他们说要送我离开。车辆启动，我们一

路开向南方。下午3点，太阳已垂向天空边缘，底部地带被染成金色。离开城市，窗外变成白色的雪原，一望无际。太阳越来越小，天越来越暗，那片炫目的金色似乎正涌向我们。我们像总也看不够这样美丽的落日，因此一次次地惊呼。

快看天空，王荔说。她坐在我身边，一头棕黑色鬈发，年轻的侧脸。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她的脸。

一小时后，我们到了佳木斯，听不见大河磅礴的喧哗声，相反，整条黑龙江笼罩在寂静中，白雪覆盖，江边散落着冰块。跨江的桥如此之长，看不到尽头。我看向远方，白色的黑龙江，低矮的楼群，天空边缘美丽的金色，想着车上的人，还有留在鹤岗的人。到达机场，我们分别了。车辆掉头，继续向鹤岗开去。

* * *

回到北京，我回到此前的生活秩序，搬家，上班，坐地铁十号线。每一个冬天都将以春天作结。新冠结束了，人们换上春天的衣服。我时常到世贸天阶，那里种着一排梨树，先长出新芽，叶片日渐饱满，后来开出白色的梨花，一阵阵风，明亮，炎热，不可阻挡。梨花落去，结出青色的果子。再后来，果实不见踪影。我从来不知道它们是被人摘去，还是被勤劳的工人一大早扫走了。我和朋友

来到 CBD 中央公园——就像曾经在鹤岗的北山公园那样行走。下过雨，空气中有新草气味，踩在石头路上，每一步都伴随着石子清脆的响声。

我在网上继续和鹤岗的人们聊天，也在朋友圈看到他们分享的新生活。离开鹤岗后，我恢复到旁观者的身份。林雯还在开炸串店，偶尔分享她的猫。女生们去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爬山，到伊春和鹤岗交界的森林地带寻找梅花鹿。有人离开鹤岗，回家，旅游。宁夏人去了越南。

王荔对我说，开春之后，她也要出去走走了。她先是网购来一些春笋，和以往一样，做了盘春笋炒腊肉，将炒好的菜发在我们的微信小群。有天她说，再也不恋爱了，此后要去与青灯古佛做伴。我问她具体怎么回事，可她没有多说，只说之后想去西藏或云南的山里徒步。4月，她先去了福建平潭，发来烈日下的海，还说有天爬山把脚踝擦破了。我最后一次与她联系时，她说正在深圳，马上要去巴厘岛待一周，还说想回家看看。

因此，当王荔失踪的消息传来，我总觉得是个什么误会。

她失踪的消息最早是在6月传开的。当时，鹤岗的微信群聊里出现了一些语焉不详的猜测。有人说，王荔4月底去巴厘岛前把钥匙托付给她，请她有空时去给家里的栀子花浇水。5月初，王荔回到鹤岗，匆匆取走钥匙，却说此后再也不回来了。另一人说，王荔出门前把猫寄存在他

家，希望他能照顾一阵，可眼下联系不上，不知该拿猫怎么办。又过了一阵，他把猫送给了一个鹤岗的本地人。

人们一点点往前回溯，发现从5月10号那天开始她就消失了。我在微信上与她说话，也没得到回复。

我向共同的朋友打听消息。女孩A说，6月，她去派出所报警。但警察说，不是直系亲属，没法立案。她只好作罢。也许是离开鹤岗回老家了，也可能想切断和鹤岗的联系，人们猜。毕竟，在鹤岗，离开不是什么稀奇事。又过去两月，人们快忘了她。直到8月初，我偶然想起王荔的漫画公众号，查到最后一次更新时间：5月10号。我又找到她的微博。微博有三十万关注者，网上的人们早已察觉异常：

还好吗？以前从来没这样。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汉化”好几天没声了，发生什么事了？

希望你在三次元一切都好。

失踪三个月了，我跟着看了四年了。这样一下子毫无征兆地消失，就像是一位不告而别的好友……

我联系上此前和她关系较近的几个人，决定重新一起找她。但是，她的手机已是空号，个人社交账号也设成私密。我们找不到任何一个鹤岗以外认识她的人，找不到她

的亲人，找不到她此前的朋友，也不知道她此前所说的线上工作室是否存在。我们想到那些不好的事情。也许她被騙去緬北詐騙（她4月底正在東南亞旅遊，還與朋友講起要去印尼投資），或是被拐賣，凶殺？

可能她真的只是想與這一切斷絕聯繫。走在地壇公園，我對朋友講起王荔失蹤的事，同時講到尋找她的困難之處。我想到作家袁哲生寫過，人天生就喜歡躲藏，渴望消失，這是一點都不奇怪的事。也許，她真的只是想躲起來。

“可她已经躲到了鹤岗。”我说，“再说，她怎么会丢掉猫呢？还有空号，一个人遭遇什么才会这样决绝地躲起来，一点痕迹也不留？”

当时已是夏末，夜晚，凉意阵阵。我和朋友绕着地坛的大道走，经过古红色的墙，高大的银杏，还有一些静静跳舞的人。我谈到那阵子密集报道的缅甸诈骗事件。如果她是被骗了呢？

一起找她的一名男生还说，这天气，就算家里死了条狗，邻居都得报警吧。他们去了她家门前，录了视频，不曾闻到什么气味，邻居也说很久没见她了。

但是，走在路上，谈起王荔失踪的事情，我仍然思绪不安。我想到另一个男生。两年前，我采访隐居吧时加入了河南鹤壁的群聊。群里不断有人加入，也有人离开。新来的人常常为买房的讯息而来，很快就会离开，只留下一

些老面孔。有天，群里说，一个在鹤壁鹤电小区居住的男生死掉了。他曾在群里分享来买房的经历。有人曾拍下他的照片——照片里，他穿着一身黑衣，很瘦，很年轻。他拒绝与我见面，但在网上，他与我说希望能隐居休息几年。买房的第一天，男生说，这是两年来睡的头一个踏实觉。我问他接下来准备怎么过，他说：“打《地下城与勇士》和《梦幻西游》。”

在群里，他说自己已经受了长期的家暴，腿上还有跪搓衣板留下的伤疤，现在身体不好，走一会儿就累，喘气，神经衰弱，每天只能睡两小时。

有人劝他乐观点，过去都是阴影。

有人说，为什么要听你在这里抱怨？你二十七岁了，还怪别人。

他继续说。群里其他人在讨论晚饭吃什么。

后来他死了，悄无声息。另一个人告诉我，男生心脏不好，此前住过院，靠邻居帮忙照看。周三，他打电话给邻居，说想去医院看看。邻居在上班，打了120，医生没查出什么。但过了一天，凌晨，男生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听说他的尸体已经火化，我随后联系上男生的母亲。“谢谢你的关心，我们家经历了很多事。”她说。她拒绝与我聊更多。

我那时只是远远想着男生的死亡。我并未见过他，没有与他真正见面交谈。死亡带来的震动很快散去，我很快

将他的事情忘在脑后。但当王荔失踪的消息传来，我不得不重新开始理解看到和听到的一切，那些天的相处。如果说这群人，来鹤岗的人，试图逃走的人，每个人都是一台能接收微弱信号的收音机，我们是否能真正接收、明白、理解另一个人所发出的讯号？还是说，那些讯号终将会被忽视，误解，或最终将会消散？就像后来我们得知王荔的户籍在山西大同——而非此前对所有人说的四川泸州，就像我们从她爸爸那里得知她的妈妈早已离去——而她在聚会上讲起妈妈催婚的事。她为什么要说谎呢？一个人问我。

说回来，决心一起寻找王荔后，我向通信公司的朋友打听能否通过手机号查出些信息，得到否定答案。接着，我找到她的买房中介，通过房管局的信息，我们就这样一步步联系上她的家人。

但，她爸爸说，多年没见她，不知道去哪了。

她弟弟说，上一次联系她是半年前。有没有一种可能，她只是不想跟你们联系呢？——最初联系王荔弟弟的是女生 A。A 说，你们不报警，让我们这些外人来催，这不是一件荒唐事么？A 因此不愿再与王荔的家人联系。

不过，后来，在集体催促下——我们五个人一起催促她的家人去报警，并将所有证据列出来：手机空号，丢弃的猫，用来赚钱的公众号也已停更三个月。最后，王荔的爸爸和弟弟还是决定来鹤岗报警。无论如何，等他们来到

鹤岗，就能立案。星期一，他们即将上门，进入她的房子。现在，我在群里等待消息，迟迟没有回音。

第五部分



无人知晓

锁匠撬开房子。他们进入客厅，门口鞋柜上的一大包口罩掉下来。茶几上放着时钟、水壶、茶叶，布偶娃娃躺在沙发一角，地上是一辆折叠自行车。水电通着。后来他们还会看到厨房储物架有袋开口的麦片，一桶红枣。冰箱里香蕉快烂了。屋子很安静，没有声音。

“如果没看到人，我们马上就走。”打头的那位是警察，“也别报警了，这么大个人，能丢到哪里去？”

“行。”王荔的弟弟说。他习惯了姐姐的风格。八年前，王荔和他告别，说不喜欢过平凡的生活，想去外面走走，此后姐弟之间联系很少。最开始联系不上，父亲也报过警。后来警察说人没事。王荔再没回过山西老家。这些年，姐弟二人只在春节时打个招呼。

——姐姐你在哪里？

——在广州。

——什么时候回家看看吧？

——知道了。

她只是不想跟家里联系吧，他想。弟弟王强二十二岁，刚工作，穿白色T恤，斜挎一个旧式皮包，还有点不善言辞。他去富士康打过临时工，现在做销售，卖网课，教人剪短视频。他们的爸爸是个老矿工，多年在山西煤矿流转。从大同来黑龙江，这是父子俩出门最远的一次。

环视一圈，警察向左转，走向卧室。从客厅到卧室要穿过两道门。他们想开门，门把手却转不动。这时他们才觉得异常。门好像被动了手脚，或者反锁了。

他们撞开第一道门。有股味儿传出来，越往里味道越浓。

第二道门撞开。王强说他这辈子都忘不掉那个画面。床边有个铁盆，黑黢黢，地板烧出了洞。厚厚的透明胶带缠在门把手、门框和窗户上。门背后挡着一把椅子。

那时我还想，也许这人不是我姐，王强说。刑警和法医来了，判断是烧炭自杀。死亡时间已有两个半月。

警察留下父子二人。担架抬走床上那具好像没了重量的身体。王强大着胆子看了一眼。他认出了姐姐的脸。

那几天我吃不下东西，只能喝水，王强说。运走王荔后，父子俩打开窗户，扔了床垫。他们收拾遗物，发现王荔的手机拔了卡，也没找见身份证和银行卡，柜子里衣服凌乱。王强买来消毒液，喷了满屋。他后来一直想起房子的气味。如果非要形容，那气味就像一口黑暗的井里混

杂着厚厚淤泥、动物皮毛、各种腐殖物的味道，刺鼻难忍，同时又有着强大的附着力，附在衣服、电脑、手机、床垫、墙壁上。消毒液干了，留下盐渍一样的白色粉末，但那味道很快又回来，好像怎么也散不掉。

两天后王荔火化。他们带着骨灰回了山西。二人最初没太花精力打听王荔的死因，也没带王荔的遗物，比如那两台电脑，嫌沉。王强只希望姐姐早点下葬，葬在家里那块地里。他们老家在大同的一个村子，离市区六十公里，恒山山脚下。但父亲不同意，说王荔不仅未婚，还是自杀，按村里习俗是厄运的象征，因而要配阴婚。

坐在大同市一间咖啡馆里，王强压低声音，不安地捏着柠檬水的塑料杯子，发出刺耳的摩擦声。皮包摆在桌上，里面装着王荔的死亡证明、火化证明、房产证、护照。

他继续说。后来，父亲改了主意。阴婚的事情暂时搁置了。他们把骨灰放在了殡仪馆。回到矿井后，父亲好像魔怔了，说王强“泥板子”“读书读到狗肚里了”，要他找人开王荔的手机。“你姐可怜的知道不，你去找，找出真凶。”

* * *

在鹤岗破门那天，王强给我打了电话，我在北京远远听着。之后我们又打了几次电话。他发来房子的视频，也就是王荔最后待着的地方。我看见沙发上的派大星娃娃，

没了床垫的床，地上黑黢黢的大洞，还有阳台那盆枯萎的
栀子，叶子全黄了。我一直想着王荔的脸。找不到她时，
我始终回避着关于死亡的可能。我们当时什么也没察觉。

消息传出去后，鹤岗群里的人讨论了数天。一个男人
说（他并未见过她），谁让她选择走上自杀这条路的？她
说过自己失恋了，是有恶人伤害了她，而她选择伤害自
己，就这么个事。另一个女人说（她们曾在网上聊过天），
我现在全身都在颤抖，她不害怕吗，为什么会那样坦然？

王荔死后，起初，为了弄清楚她的死因，我寻找到她
身边的人，收集了以下叙述。

（1）王强，二十二岁，王荔的弟弟

2007年，我六岁，我姐十四岁，妈妈去世了。
妈妈一直有肺病，身子弱，那时下了场大雨，妈妈去
村子附近的山上捡蘑菇，我记得她从雨里跑回来，发
了场烧，后来一直治不好。妈妈走后，我们的生活完
全变了。爷爷带我们，爸爸是矿工，当时在井下，一
年换一个地方。后来我姐去四川读了初中、高中，二
姨一直供她读书。她就再也没回过大同。

你可能不知道，单亲家庭，尤其是母亲去世
后，就没有家的感觉了。我和姐姐最后一次见面是在
2014年，当时我在内蒙古巴彦淖尔读初中，开始是

寄宿在叔叔家，后来姐姐过来带我生活了一年。我俩租了个房，我上寄宿学校，周末回家。姐姐找了个文员工作，朝九晚五，偶尔给我做饭，做炸火腿肠什么的。我姐那时候总骂我，说我笨，我一般也不还嘴，就听她说。一年后，我姐说，她不太喜欢这种平凡的生活，想自己去外面转转。和我告别后，我们就八年再也没见过。

我不知道姐姐后来为什么不跟我们联系。她把我爸的微信拉黑了，把我的朋友圈也屏蔽了。我后来听我爸说，他俩关系差是因为什么呢，姐姐当时高考没考上，问爸爸能不能花钱，但家里当时没钱。这事告一段落后，我爸找了个阿姨。她很生气，说你宁愿找老婆都不愿意让我读书。从此之后我爸再没找过老婆，但他俩关系变得很差。而且老家可能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吧。姐姐有一次还跟我说，她在城里上学，冬天比较冷，家里只有一条毛毯。我姐想把毛毯拿到学校里，但爸爸就说要留在家里，可能是要留给我。我姐就生气了。可能有很多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且，我爸还喜欢喝点小酒，一喝多就喜欢给她打电话，让她结婚，我姐可能嫌烦。后来我也不敢跟她联系了，有一回，我问她在广州具体哪里，我去找她，给她拜拜年，她也不回。我怕我跟她说多，她也把我拉黑了。

我爸现在快五十五岁了，现在还要每天到矿里去，矿那么深，我很怕他情绪不好，在矿里面出事。他每天都在问我，说我姐到底为什么自杀？是被别人害死的，还是怎么回事？我对我爸说姐姐可能是抑郁自杀的，他不信，怎么也不相信，一定让我去找出个杀人凶手，你说我该去哪里找啊？

这几天，我脑子里会不自觉地幻想，现在晚上不敢一个人出去，得找个人陪着，我们公司那有一条楼道，没有灯，我自己不敢去。我也难过，但是我也要回到自己的生活，是不是？已经阴阳两隔了，活着的人还要继续啊。我爸现在也就剩我了。

(2) 小八，三十岁，在深圳工作，王荔的初中同学（后来我得知，同一时间，只有她也在寻找王荔）

她朋友很少。我们在四川泸州一个小镇上读初中。可能因为家庭，她好像一直都是蛮消极的。那种消极不是对某一件事，而是她对生活的整体看法。她之前一直说父母离异，从来没和我说过妈妈去世的事。

初中时，我们有个小圈子。她谈过一段恋爱，但毕业后大概十年，这段感情都纠缠不清。男方在毕业之后去了天津工作，她也到了天津。这个圈子的朋友

因此疏远了她。我不是说她不好，只是说，可能在感情这件事上，她有些超乎我们想象的偏执。其他朋友问我，为什么还要跟她一起玩，不怕自己变得消极吗？

后来她去了广州工作。我们一年会见一两次面。当时她住在公司宿舍，也是一个人住，我还去她家睡过一晚上。我考上研，她也离开了广州。今年过年，她回到四川，好像已经和亲戚很多年不联系了，就在我家过了年。她当时说要去成都泡温泉，问我要不要一起。我觉得她的状态比原来好，好像能够找到一些想玩的事情。4月1日，她对我说要去旅行，说经过深圳时来找我。后来我问她，她没回，我感觉到可能有点不对劲。但那段时间忙，到8月我才开始找她。我也报了警，根据她之前的描述，还有一些照片，发给警察，他们找到她的住址去敲了门，但是没有任何回应。我也关注她的动漫自媒体，还以为粉丝知道下落，但是没人理我。后来，我联系到我们初中班主任，打听到她弟弟的电话。再得知她的消息就已经是这样。

我也去找了她的前男友，想知道他们还有没有联系。他说早就没有了，后来就不回复我了，可能完全不想谈论她了。

三年前，她告诉我要去鹤岗生活，还说以前的微

信不用了。我觉得大概是那里房价便宜，她喜欢那里的天气，离俄罗斯也近。而且，能离家人远一点，自己买个小房子，逃离过去不好的东西。而且，说实话，可能我和她的关系也属于过去的一部分。也可能是这样，她才不会对我说她现在的很多事情吧。

(3) 小南，“××汉化组”成员

我和她平常不太聊天。只能说她对于整个汉化组的人来说，都是从5月中旬（10号之后）就联系不上了。我看微信群里，组内有人给她隔一段时间就发消息，但她谁也没回复。

我们是负责漫画汉化，就像网上那种电影的字幕组一样。她是这个漫画组的负责人，把搬运来的原漫画发给我们，原漫画台词是韩文，我们就负责汉化和翻译。她在组里挺正常的呀，偶尔会分享她的猫猫，或者说电影，还有说家里停水，但是聊得不多。我们这个组里的人都是她从QQ上招聘来的，我也是喜欢看漫画才进组，大家为爱发电，没有工资，她跟其他人都是很简单的派活和完成任务的关系。从汉化组这边可能很难得到太多消息。

(4) 海哥，鹤岗一间汽修厂的老板（据人们所知，他

应是王荔生前见过的最后一个人，他们去年年底认识，后来成为朋友)

她5月4号从印度尼西亚回来就约我见面呢，连着约了两次，但我这汽修厂子也忙，她说那就不吃饭了，一起喝个茶，我说我忙啊，天天6点才关门，收拾完就7点多了。5月9号那天晚上，我问她吃饭了吗，她说吃过了，我说，那你来我店里坐会儿。我看她吃过饭了，就让她在楼下等会儿，给她沏了茶。等我吃完饭，也就是十分钟吧，我下来和她唠嗑。那阵子，她原来在鹤岗的朋友都离开了，她可能也找不到人说话。

她一开始问我，说我家是不是有地。我说是啊。她说她想种点空心菜，说都从网上买了空心菜籽。我说行，哪天你拿过来种呗。她说行。然后她又说，飞机上认识几个华裔，想一起投资蜜雪冰城。我说妹啊，你也不是做买卖的料，你投个屁。她当时还给我带了巴厘岛的猫屎咖啡。过了一会儿，我们聊完了，她就说回去，我说我送你，她说不用了，叫个车。我看着她叫车，从门口给她送上去。到家后，她还说她到家了，随后就完了，这就过去了。我真没看出她有啥异常。

可是，我后来听你们说起她妈妈早就去世的事

情。我忽然想起，那天晚上，我和她聊天，正说起母亲节的事，说马上5月了，你不回家陪陪你妈？

她说，是啊，要过节了，我马上就要回家，陪我妈妈去过母亲节。

(5) 一位情感咨询师（王荔的线上记录停留在5月11日，那天凌晨，她曾寻找到一位情感咨询师，但最终未能完成此次咨询）

听到这个消息很遗憾。她5月11日凌晨12点在这边交过九十九元咨询分析费，但是没有开启服务。你可以看一下我发给你的截图——

5月11日 00:18

咨询师：现在也不早了，明天把这个表格填写一下，然后帮你深入分析。

(表格：《情感信息收集表》)

王荔：好的。

5月11日 09:51

咨询师：OK了吗，早上好。

5月11日 14:02

咨询师：宝，还没睡醒吗。

5月11日 21:02

咨询师：宝，你都睡了一天了，起来活动下。

我一直在联系她，但是联系不上，她一直没有回应我。我想着她应该在忙。我一直也在关心她呢。是不是抑郁呢？如果抑郁的话家长知不知道呢？有没有关心她去医院积极治疗呢？家人朋友的支持关心都很重要的。

* * *

出租车一直开到大同的边缘地带。成片玉米快熟了，落下褐色的须子。面前这栋建筑庞大、威严，表面是整齐的方格状，四周环绕松木和洋槐。一队人身着西服，领口别着一小朵带有“奠”的礼花。队尾，女人双眼泛红。透过玻璃橱窗，房间放着菊花丛，中心是一口透明棺材。隆重的遗体告别会，某个重要人物的死。再往前走才是她在的地方。永安堂。那里有无数个小小的、金灿灿的盒子。每个盒子前面印着一尊佛像，一串数字编码，储存日期。我们经过那些盒子组成的墙。王强拿来钥匙，挪走一把梯子，蹲下，插入钥匙。他从倒数第二层的一个盒子里取出相框。王荔不曾留下遗书，或是任何只言片语。她离开大同，离开村子，去了北京，去了广州，最后来到鹤岗。她一个人走了很远。

与这些人交谈过后，我仍然没有确切的答案，依然不知道王荔为什么最终选择了死亡，选择躺在床上，脸却朝下。也许没有人知道了。相片中，她还是短发，抿着嘴，浅浅的笑容。我看着相片，想到在鹤岗的那天晚上，下雪了，她问我要不要一起看雪。凌晨，小区空空荡荡，只有我们两人站在雪里，在那些干净的、毫无痕迹的雪地留下脚印。我们绕着小区走。她站在一片朦胧的紫色灯光下，我在不远处看着她。

我还想到她贴在墙上的便利贴：“把坑（→自己）填满。”

破门那天，墙上的便利贴已不见了。

离开的，留下的

从大同回北京，车窗外高山连绵，山坡铺着灰黑色的太阳能板，像移植在身上的一块皮肤。接着是一座空房，角楼形状，露出砖、钢筋、窗户。一块不大的湖泊，有人躺在遮阳伞下。明亮的太阳令这一切都像是假的，还有那些云的阴影。我看着窗外，想到死亡总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事。它发生，成为主角，身影逐渐淡去。我又想着那些活着的人们，想到最后一次见到他们的情形。三年里，我见到这些人，短暂参与他们的生活。如果叙述要有一个终点——可也许生活没有真正的终点，除了死亡——停留在我脑海中的是这样一些片段。

比如那次，我和曾在富士康工作，后来去鹤壁买房生活的王浩坐在郑州巩义一家中医院。楼里住着脑梗的老人，少有人走动，安静，走廊里是常见熟悉的消毒水气味。王浩的父亲躺在一间病房里。他七十四岁，头发花白，插着鼻饲管，双眼茫然，缓慢而沉重地呼吸着。王浩轻轻喊醒父亲。老人睁眼，看着面前的电视机。一则电视广告播放后，他又合上了眼。

两周前，王浩接到家里电话，父亲病倒了，状况不乐观。家人不知道他在鹤壁生活的事，一直以为他在打工。那通电话把他拉回现实。家里没钱请专业护工。大哥先请了几天假，后来二哥接力，然后是他。父亲脾气暴躁，像个孩子。王浩每天给父亲擦身体，洗尿盆，喂药，用破壁机将饭菜打碎，加水搅成糊状，再灌进父亲的鼻饲管。地上铺了一床薄薄的卡通床单。他和二哥睡在父亲床旁的地上。过了一会儿，护士来查房，王浩将床单收起来。

医院里暖气充足。王浩穿着灰色毛衣，黑色家居裤，恐龙棉拖鞋，随后将我拉到病房外。我们聊到富士康和在鹤壁隐居的生活，他声音压得很低。他说无法想象未来的日子，眼下只能熬。

“这些天有去巩义别的地方走走吗？”我问他。

他摇头，现在不可能离开医院了。我们并排坐在不锈钢座椅上。他并拢双腿，驼背，显得身体那么小。他讲起富士康的生活。这两年，每当他需要赚钱，他还是会回富士康做临时工，回到庞大的永远不会关灯工厂。有次他碰到一个待了八年的线长，仍在等待那渺茫的升成组长的机会。他看着线长被组长训话。“当时我想，还好我没留下来，留下来也不会比他更好。”他说。

手里那个小小的金属物品，从 iPhone 4 变成 iPhone 11。变化还有更多。时薪上涨到二十三元，富士康还会给补贴，只要干够三个月，就多给一万元。生产线上大多是

像他这样的临时工。王浩在宿舍里住了两月，人们进进出出，来了又走。他没能认识任何人。“之前我起码知道宿舍里的人叫什么名字，现在，旁边住着的到底是个人还是个鬼，我都不知道。”

十年过去，他曾经做过的岗位——给数控机床放料的位置，现在已是控制装料的机械臂。也许过不了多久，这些工厂里的岗位都会被机械取代。

他又说了一遍：“富士康变化太大了，宿舍里住着谁都不认得。”

“那到鹤壁之后呢？”

“那不一样。”他说。有天他正在家里，听到楼上传来一阵咣当的声音。那是一个刚搬来的年轻男生，两人交流了几句，发现都在鹤壁群聊。后来他们还一起见过一次杨亮。他记得那顿饭吃了一个凉菜，两个热菜。男生和杨亮不喝酒，他就没有点酒。他知道两人都喜欢打游戏，男生打《梦幻西游》，倒卖武器。杨亮也爱打游戏，但不想靠代练赚钱。杨亮总说，不想把自己最后的爱好拿去卖了。

我有种归属感，王浩说。离开鹤壁前，他还在房子里养了红掌、绿萝、长春花、仙人掌——虽然后来都枯萎了。

过了一会儿，护士打断我们的谈话。两包黑色的中草药膏递到王浩手中。又到父亲吃饭的时间了。晚上，父亲开始发烧。忙碌的看护工作让王浩无法思考更多。现在，

他需要暂时搁置在鹤壁隐居的愿望了。

* * *

在鹤壁，我约上杨亮以及群里的另一个男人一起吃饭。两人说去吃“十九元经典菜馆”。他们爱两家馆子，这是之一，另一家叫“二十九元自助餐”。菜馆在奔流街，下午6点30分，正是生意最好的时候。天冷，鹤壁街头的梧桐树叶落光了，枝丫像纤维一样向空中伸展开去。阴天，雾霾厚重。馆子里开暖气，闷热，吵吵嚷嚷，地上摆着空啤酒瓶。男人说这家馆子实惠。他点了一份炒肚片，杨亮要了一份爆炒鸡胗。

杨亮胖了不少，长长的刘海垂到眼睛，贴着额头。他穿着黑色棉袄，牛仔裤，没刮胡子，神情有些疲倦。这里太吵了，他说。他很快失去耐心。但另一人说，他更喜欢热闹的环境，坚持要饭店见面。这人郑重打扮了一番，穿了一件酒红色西服。前不久，他喝醉了，摔了一跤，额头缝针留了疤。

“我的生活？没什么变化。”杨亮说。有料理包后，他省去了出门买菜的步骤。他还是在打游戏。

“可以说是毫无波澜。”那人在旁边补充——他的生活随时变化，那年冬天，他在北京马驹桥的厨师工作很快结束，无所事事了一阵子，又回到鹤壁。

我上次见到杨亮时，他说他还剩下三万块，还能再隐居半年。但以后呢？杨亮说，可能还是要去上海攒些钱。现在，钱快没了，他又必须去打工。有次他在群里分享做网络兼职的经验，说有个下午赚了四十块。他很高兴，但第二天就发现是个骗局，唉。

我问杨亮最近在关注些什么。他喝下一大口可口可乐。“什么都看，贴吧、微博、B站。”他谈论了一会儿最近的新闻，脸上浮现不平的神情。说实在的，这次和他见面前，我一度有些心里打鼓。我有时想他也许会参与网上那些言语激烈的争执。但现实中，他就在我的对面，沉默寡言地吃着饭。

“他是悲伤大于欢乐，我是欢乐大于悲伤。”男人评价杨亮。

杨亮什么也没说。

新年即将到来。男人上一次返乡是十年前。他觉得没成家，混得不好，回去丢面子，决心春节就待在鹤壁。去年春节他和杨亮一起吃了顿年夜饭。他觉得在鹤壁买房是这几年最开心的事。杨亮点头。

有第三人在，杨亮说话更谨慎。找不到话说，他低着头，看手机，刷贴吧。男人离开间隙，我和杨亮继续返乡的话题。杨亮上一次回老家也是五六年前。至于父母，他完全没听说什么消息，也不想去打听。随后他说到父母离婚的事。“对我来说，这是件很突然的事情。但对他们来

说却未必。他们也许早就做出打算了，只是我不知道。”

馆子里闹哄哄，很快，杨亮的眼睛垂下来。

“算了，我不想再提这些。”

男人回到饭桌。我们聊到杨亮的猫。橘猫如今成了肥猫。前阵子，男人建议杨亮给猫减肥，他把猫粮减半。每天夜里，猫闹得人睡不着，扒拉猫粮袋，还把架子上的卤蛋扒破了。“卤蛋本来是给我吃的。”杨亮笑起来。他有点担心猫。如果年后去上海打工，他也没法带走猫，正打算把房子租出去，请租客替他照顾。

“你别想了。”男人说，“说不定那人把你猫照顾死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如果是那样，我也没有办法，我已经尽力了。”

杨亮重新加回保安群，打算去上海找个普通的岗位，冬天再回鹤壁。后年也打算这样。来年春天，杨亮找到新的租户，两人达成协议，用租金提升双方共同的生活环境。杨亮买了台全新双开门大冰箱，在客卧安装空调。租户说帮他照顾猫。很快，杨亮回到上海做保安。上一天班就挣一天的钱，他说，下班，他还是照常打游戏，睡觉。再后来，他将猫送给鹤壁当地一个女孩——室友始终喜欢不来猫，他希望猫能有个更好的归处。又过去半年，他回到鹤壁，继续一个人的生活，电脑机箱嗡嗡作响，屏幕里游戏战争不眠不休。他研究挖掘机、发电机，想象世界末

日的来临。有天他想在楼下的空地种土豆。他挖啊挖，挖得双手都是黑泥，手指疼痛，很快放弃了。

杨亮去鹤壁隐居的帖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他每天都会收到新的提问：兄弟，该怎么去鹤壁隐居？

* * *

另一个夏天热得出奇，人们躁动不安，前往燕郊的路上全是掉落的槐花。申牧站在相同位置向我招手。公寓楼下，临街店铺倒闭又新开。但他看起来没什么变化，头发的长度，肤色，眼神。他穿着阿迪达斯的绿色T恤，牛仔裤，戴着鸭舌帽和口罩。他的家同样没有太多变化。纸箱还放在门的右侧，床上的衣物整齐折叠，只是囤积的物品变得更多了。更多的外卖盒，被清洗干净的垃圾，更多的鸡蛋壳，茶叶，就像是时间刻度往前推进了一格。

他有些厌烦燕郊，说打算新冠结束后离开这里，去一个村庄隐居。他说，到时候他就将手机锁起来，买一个一百元的诺基亚。他想去江西或是贵州，那里有山，有树，气候湿润。但房子到期时，由于新冠还没结束，他仍然无法离开燕郊。他续租了一个月，又续租了一个月。

微信界面有许多表示未读消息的红点，来自交换电影票的群聊，麦当劳优惠券的群聊。他很久没有打开它们。唯一联系的人只剩父母。一个月与父母固定通话两次，固

定的通话内容。

“那你之后的打算是什么？”我问。

“我还是不知道。”他说。一切仍然处在不确定中。

电脑屏幕亮着，他在看电影《远方》的解说。电影里，一个男人离开小镇，想要去到远方。最终他还是回到了小镇。

“我们所有人都想去远方，但远方真的会是我们想象中的远方吗？”申牧说。

随后，北京电影节开始。我们相约一起去看安哲罗普洛斯的三部曲。电影很热门，我们没抢到票。申牧买到一部法国的新电影。再次见到申牧时，他身后跟着一个扛摄像机的年轻男生。申牧说他想开始一些拍摄计划。这些天，他在写剧本，租机器，找摄影师。他想对这几年的蛰居生活做个了结：去天津找原来合作的导演，将素材要回来，看能否剪个片子，再去石家庄拿回寄放在亲人家的行李，看是否能找亲戚借些钱抵债。由于没有工作和社保，他已经无法从网贷借钱了。回家，是否和父母坦白一切，仍然待定。

随后，我们来到北京的后海，游客熙熙攘攘。申牧倚靠在湖边的栏杆：

“我快离开北京了，走之前，我去了中国电影资料馆，想看《永恒和一日》，可惜没有买到票。我很喜欢那部电影，里面那位老人说：‘最近我与世界的唯一联系，是楼

对面的陌生人。’”

胡同里，夏日槐花传来淡淡的香气。他说，以前他去了那么多地方，旅行的每一天都像一个月那样长。当他待在那个公寓，三年却像三个月般短暂。剧本上写，明年4月，这项计划将进入剪辑阶段。他还在写另外一个剧本，如果这两项计划都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他就重新去找工作。车开往电影院，窗外，人们飞速向后倒去，海棠，槐树，拥挤的单车。他看向窗外，摘下口罩。这些天他开始失眠，想到所有事情都要重新开始了。我们抵达小西天，灯光退去，电影即将开场。

围墙中的故乡

搬到鹤岗生活一年半后，林雯第一次回江苏常州，进家门后她首先看到的还是那个躺在沙发上的中年男人。沙发三人座，铺着一条毛织毯子。初夏，男人光着膀子，穿了条短裤，用左手托着脑袋，另一只手垂下来，放在并拢的双腿上。沙发对面的茶几放着塑料支架，一个没有感情、语速很快的新闻联播式男声从支架上的手机里流淌出来。“他”又在说话了。这十来年，爸爸就这样躺在沙发上听着“他”说话——“两人的身体当场被全部撕裂”“显然没想到对方的实力能达到这种程度”“他开始大杀特杀，如入无人之境”。

从这些句子里她觉得爸爸在听一部武侠小说。爸爸只看两种小说，武侠，还有写抗日战争的。“他”声音很大，充满客厅和厕所。如果不关门，“他”就一直飘在她耳朵里。之前她房门坏了，锁不上，夜里两三点还能听见。尤其是快要睡着时，真令人恼火，你知道那个成语吗，“水滴石穿”，她压低声音——“他”就像水滴一样，每当要睡着时就会突然滴到我脑袋上，我真要神经衰弱了。

这个家庭界限分明，彼此都当对方不存在。客厅是爸爸的。林雯在一个房间。妈妈在另一个房间。房间隔音差，她在房间里听见爸爸咳嗽，撒尿，听有声小说。早上，隔着门，播报小说的“他”又响起来。到中午，传来吸溜面条的声音。爸爸不会管她吃什么做什么，不问，不在意，不关心，偶尔听见动静，也只是躺在沙发上抬头看一眼。

下午，门口传来“砰”的一声。爸爸应该离开家了。

这时，林雯走出房间，来到客厅。爸爸在时她尽量不去客厅。现在，爸爸的地盘上只剩下一个手机支架、烟灰缸里三只烟头，一碗没吃完的面条。爸爸一直没工作，偶尔接点零工，做装修那种，“一年里工作个三十天”。他快五十了，额头上深深的皱纹，曾经切过胃。除了听小说，爸爸就是去楼下车库的麻将馆打牌，也有时连续一个月都躺在沙发上。

每次提到爸爸，她的脸上时常浮现绝望的神情，抿着嘴巴，嘴角往下长长垂着，有时还要忍住眼泪。回家后，她待在房间，一直躺在床上。房间不大，一张床几乎填满了。床边有一张小桌，一张懒人躺椅。门曾经被发火的爸爸撞开过——她回忆说，那次她躲在房间里，不敢开门，爸爸砸了门，拖着她的头发，把她拉到门口——后来换了锁，现在才能锁上。她继续说，小时候父亲从没牵过她，没抱过她，这么多年吃饭时爸爸都只拿自己的筷子，从来

不拿她和妈妈的。

林雯回家的第五天，我来到常州与她会合。最开始我和林雯睡在她家里的卧室。接下来两天，由于她父亲一直在客厅躺着，我们很少离开房间。她看向窗外。天气闷热。鸟儿无聊地叫着，有时长，有时短。楼下是玉兰树林，挨着一座叫迎宾桥的石桥，河流一侧很脏，水面浑浊黏稠，漂浮着落叶。另一侧很干净，那边是别墅区，商品房，至于多少钱，她没打听。她在的这一侧是拆迁安置房，粉红色的楼房，四层楼高，楼长得都一样。

“还是想回去。”她接着说。“回去”指的是回鹤岗。

离我们上次在鹤岗见面过去了半年。半年里，我们在网上聊天，她说前阵子鹤岗政府发优惠券，兴致勃勃讲怎么去超市买打折的东西。前两个月炸串店生意不好，关张了一阵，这段时间没收入，就靠积蓄待着。这趟回来，她一是想把剩下的东西打包继续寄到鹤岗，二是妈妈过生日，三是一年多没回，也想见见曾经的一些朋友。

我们会合那天下着雨，此后常州阴雨连绵，几乎每天都有阵雨。我撑着伞在路边等待林雯。夜晚，临街店铺亮着灯，银色的雨水从楼房边缘落下来。一条笔直的高速从南到北穿过小镇。晚上9点，街上一直有人在走，车流从未停息。主街有古茗奶茶、蜜雪冰城、瑞幸咖啡、正新鸡排、肯德基——看到这些名称时你会意识到这里和中国其他地方没什么不同。但另一方面，那些立在街边一模一样

的回迁房，以及家家户户在门口都养着的月季、蓝仙草，又给人一种模棱两可的感觉，街道很新，楼房很新，看不出时间的痕迹。

林雯带着我穿过街道，上楼，来到她家。她爸还在沙发上。我和她父亲打招呼。他抬头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说。

回到房间，林雯就压低声音。这些天她没事儿干。在家里，她一般以一个大大字形躺在床上，有时是正面，有时是反面。这阵子她打游戏的兴致不强，每天做两把任务就算了，有时候刷短视频，有时候看网文，还有囤东西。她每天都在看微信上的秒杀群。第一天她对我说，你上京东看一下。她把我的手机拿过去抢了张券。第二天她对我说，你上淘宝看一下。我跟着她买到如下物品：猫维生素B片，婴儿专用湿巾，红霉素眼膏，酒精消毒湿巾，头绳发圈，清凉油，小台芒果。她说，从小总是听到妈妈说家里穷，要省钱，要少花一点。她不再敢买贵的东西。

接着我们说到这间房子。房子三室两厅，十多年前的装修风格，方方正正的玻璃灯，木质门框，屏风，因为时间久远，玻璃柜蒙上黄黄黏黏的一层雾。厕所是那种传统的木浴桶，淋浴头坏了，开启时管子四处溅水。林雯很不好意思，说她一般去楼下浴室洗澡。但总体说来，房子宽敞，明亮，位置也在镇中心。这是父母的房子，她开玩笑说，他们不死也不是我的啊。

第二天是林雯妈妈的生日。开始我一直没能见到林雯的妈妈，她睡得早，起得早。早晨她给我们煮了两个玉米，两个鸡蛋，放在餐厅桌上。林雯说这是来客才有的待遇。下午，林雯买好菜，随后到厨房清理冰箱，把过期的豆瓣酱、牛奶全部拿出来，扔进了垃圾箱。

妈妈生日，一家人总还是要一起吃顿饭吧。

妈妈是个四川女人。林雯说这么多年家里只有妈妈挣钱，一直没休息过。妈妈的妈妈——林雯的外婆——很早被拐卖到新疆，再没有下落。妈妈十几岁离家，出门打工，从成都到常州，相亲就嫁了。媒婆说这个男人有三个兄弟，一家人好帮衬。十九岁，她生下林雯。今天是妈妈的四十八岁生日。现在妈妈在厂里上班，林雯只知道工厂位置，不知道妈妈具体做些什么。小时候，妈妈在印纸厂，印刷纸壳那种，十几年前算大厂，妈妈看机器，她去找妈妈拿家里钥匙，厂子里热烘烘的，生产跟人一样高的大卷筒，手展开都抱不过来。

下午5点，先回来的是爸爸。爸爸回家后就粘到沙发上。那个“他”又开口说话了。

接着是一串拧钥匙的声音。妈妈回来了。妈妈显年轻，中等身材，扎着头发，穿一身黑色，眉清目秀，像许多中年女人那样戴齐全套金首饰，金手镯、项链、耳环。她嗓门很大。看到林雯在厨房里，她也过来帮忙。厨房里传来砰砰的忙活声。

左边，父亲躺在客厅。右边，林雯在厨房里焯毛豆。林雯做了炒花甲、盐水煮毛豆、炒四季豆，从冰箱里端出昨天买的蒜蓉蒸虾。妈妈买来夫妻肺片。桌上摆着丰盛的菜。

来吃饭，妈妈喊爸爸。

来吃啊，林雯又说。

爸爸还是没动，继续躺在沙发上。

林雯和妈妈坐下，留下一张空椅子。

爸爸最终也没来吃饭。后来他到厨房里去端来一盆面条，坐在沙发上吃了。妈妈和林雯都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也没再去问爸爸，也许习惯了。

你吃，妈妈对林雯说，我减肥，不吃荤的。妈妈坐在素菜那边。她夹了一个四季豆说，好咸啊。林雯不好意思地笑笑，炒菜放多了酱油、蚝油。其实妈妈自己也经常分不清这些，做菜不好吃，让她拿瓶生抽，她买回来老抽，让她买老抽，她就买生抽。

对林雯的生活，妈妈如今采取“不干涉”的态度。对我是什么来头，也不多问。饭桌上，我们聊到鹤岗。此前她没听说过这个城市。

我提到那里现在有许多年轻人。

“去鹤岗躺平，对吧。”林雯妈妈说。

她对那里的印象只是很远，黑龙江，那么远，过去都要三四天。但她不愿多聊，很快转移了话题。她在一家小

厂子上班，待了五六年，说是工厂，其实是手工作坊，厂里一共不到十人。工厂生产发动机部件，比如绝缘橡胶圈。她中午给厂里做饭，既看机器，也要做手工，用锉子摘掉橡胶环上的毛刺，每天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一周休息半天。常州工厂工资就那么多，她一个月赚三千块。休息的时候她就和姐妹去逛公园。

等饭吃完，父亲走过来。两天里我第一次听见他的声音。他是眯眯眼，脸上有许多横肉。他拿着屏幕碎裂的手机。妈妈让林雯帮忙，说微信支付坏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林雯拿过他的手机操作了一阵。她说，你银行卡已经注销了，要换一张卡。父亲拿来另一张卡。她输入号码。人脸认证。“张嘴。”她对父亲说。父亲张嘴。现在可以了。她把手机递过去：“你再试试转一次账。”

你爸爸不知道怎么搞这些，妈妈在旁边说。他们三人第一次同时露出笑容。

后来回到房间，林雯说，你感觉到了吗，他一点用都没有。小时候，她问妈妈为什么不离婚。有次妈妈带着她到四川去待了三天两晚，被娘家劝回来。女人嫁出去就没有家了吧，她说，娘家也顾不上她。林雯那时意识到，妈妈是一个按部就班的女人，那种万事都会忍的人。

妈妈回来后，客厅里的声音多了起来。除掉和丈夫的沟通以外——她和他说话，总得不到回应——她是那种风风火火的女人。阳台上养了多肉、灯笼草、长寿花、绿

萝。她先是拿水壶开始浇花，接着又说在附近学校要来一片荒地，种西瓜、南瓜、生菜、番茄、茄子。最近她在减肥，已经减了一个月，上午出门跑步，坚持不吃晚饭。她要下楼去转呼啦圈了。

后来我下楼，遇见正在转呼啦圈的林雯母亲。她在肚子上绑束身带，然后套上狭窄的呼啦圈，将秤砣甩起来。底下有些年纪更大的老人。她边转呼啦圈，边和老人用常州话聊天。

我和她聊到对林雯去鹤岗生活的看法。

“我什么话都跟她说了，没用的，劝不动她，”林雯母亲继续转着呼啦圈，“随便她好了，我现在就这么想。”

我提到那些让林雯困惑的相亲。“那现在也不给她介绍了，随便她。”她说。

后来林雯和我说，从鹤岗回家前，妈妈又“不小心”给她发了一张男生的照片，说非常难得，三十二岁，可靠，做销售。她说妈，你跟人家讲，我有病，生不了孩子。虽然住在镇上，邻居仍然是原来同村的人，还有远亲。只要听说你没结婚，你就是别人手里的一种资源，她说。每次出门她都要戴口罩，省得被亲戚认出来，“会被呱呱唧唧讲”，过一会儿又要给她介绍相亲了。

“你觉得什么样的男的才是好的？”林雯问我。

“能听人说话的。”

她说：“那你对小地方的男的要求太高了。”

她说，二十多次相亲里，更多是一上来就要谈生孩子的。最后那次相亲，男生送她回家。快到家了，男生一直不停车，绕着主街开了四五圈，说再去别的地方逛逛吧。

她当时说，要是不让我回家，我就跳车了。

回家，妈妈问她男生怎么样，她说不合适。没过几天，妈妈又给她介绍相亲对象。对于结婚这事，妈妈不会退让。妈妈对她的期望就是找个人嫁掉。这点她们永远无法达成一致。

她说，妈，你嫁了个什么样的男人。

妈妈说，那是运气问题，你又不一定碰上你爸这样的。

她说，那我为什么要用我的一生去赌呢？

后来，晚上，妈妈又到房间里来，和她聊天。

妈妈说，你自己想清楚就好，你要对自己的生活负责。

林雯说，我想清楚了，我就打算继续在鹤岗过下去。

妈妈说，你不要后悔。

林雯说，我不会后悔。

她没有告诉妈妈，她已经买了三个五百升那么大的白色编织袋，要把房间里剩下的被子、枕头、床单、娃娃全部打包带到鹤岗。

编织袋已经到了。妈妈将快递盒拿上来，问她买的是什么。

她对我眨眨眼睛，答道：“就是买的东西，几个袋子。”

* * *

林雯开始打包。白天，爸爸还在客厅听小说。她原本打算等爸爸走掉再打包——上次去鹤岗，她就是趁父母都不在时把行李打包好。但爸爸今天打着赤膊，她估计他不会出门了，进而决定忽视他。天气还是闷热。她走出房间，来到储物室。那里有两个衣架，挂着冬天的大衣、羽绒服。书柜放着教材，《冷菜、冷拼与食品雕刻技艺》《中式面点制作》。她翻了翻衣架，摇头，毛领大衣太轻薄了。她把视线转向一个麻袋，翻出来两床旧床垫、旧被子，还有一床电热毯。曾经她在酒店做前台服务员，一个月里上十五天夜班，从晚上10点坐到第二天早上8点，冬天冷，她就买来这床电热毯盖在腿上。

上学时买的星星玻璃灯；以前做西点给蛋糕增色用的红曲粉；房间的吸尘器，拆下头，各自裹两圈保鲜膜；塑料布；一大包纽扣。她走到客厅，打开鞋柜，掉出一叠一次性拖鞋。她捡起来。响声哗啦啦。父亲没抬头，也没说话。她清空衣柜，夏天的裙子，秋冬的毛衣、围巾。滚腿器。拉伸器。她还翻到以前买的猫手术服。编织袋很快装满了。过两天她就叫快递上门，把三个袋子运到鹤岗。

打包完，林雯又躺到床上。我们并肩躺着。我问她是

否还是打算在鹤岗继续待下去。她点头。她想就这样待在鹤岗，继续开炸串店，同时呢，她打算问妈妈能不能赞助一台电脑，如果可以，她一边开店，一边在网上做兼职客服，如果不行，她就再攒攒钱，明年买电脑。

她在常州见了三个朋友。一个是她曾经上班的酒店的经理，已结婚成家。另外两个都是手机回收公司的前同事，男生，还很年轻，互相不认识。其中一个叫小乐。小乐和她同批进公司，是个不善言辞的小伙，比她小两岁，家里给他在常州买了套房，他平常和爸妈一起住。好死赖活过呗，林雯说，小乐对工作没她那么上心，从没拿过绩效第一，拿保底工资就已满足，现在工资还是三千多一个月。

稳如老狗，她说，小乐就是条咸鱼，你拨一下他才动一下。

最初小乐只知道林雯要辞职。后来林雯才告诉他去了鹤岗。

小乐说，大佬，说跑就跑，真牛。

林雯躺在床上给小乐打电话——出来吃饭，有人请客。电话对面是一个懒洋洋的声音。谁啊，男生说。林雯说，就是个朋友。我们约好第二天和小乐一起去吃石锅鱼。但第二天，到约好的时间，小乐说要给家里人做饭，又不来了。林雯说，即使在常州，她也没有朋友圈子，都是一个人和一个人联系。

我原想着让小乐带我们去趟手机回收公司，三年了，他还在那工作。他说，周末公司不打卡也能进。我和林雯坐上车，二十分钟后到被樟树包围的工业园区。我们在层层叠叠的高楼中行走，经过电动玻璃门，电梯门，灰色的闸门，相同的挡板、办公桌、惠普电脑和键盘。我们在玻璃门外张望。她指着那个她曾坐了一年的位置——一张桌子，一张椅子，一台电脑，一个键盘。我之前就在那儿，她说。

之后我们决定离开，又穿过闸门、电梯门、电动玻璃门，离开园区。在楼下，我看到设备检测中心里密密麻麻的手机。保安狐疑地看了我们一眼。

离开工业园区，林雯决定带我去一家洗浴中心。以前她时常去那里待着。那是一家老牌洗浴中心，供应自助餐，既能洗澡，还能吃三餐。洗浴中心独享一栋办公楼，人不多。我和林雯一起洗完澡，来到空无一人的娱乐室，先打桌球，接着打乒乓。由于球技拙劣，我们很快放弃了。这时整座洗浴中心变得灰暗。窗外，一场暴雨即将来临，传来男人的鼾声。

躺在懒人沙发上，林雯捧着手机，说起和朋友见面，她们与她分享婚姻生活常见的争吵、欺骗与妥协，还有孩子。更年轻的小乐说在找女朋友，相亲，生活似已不再有可能的变化。他们留在这里，而她选择离开。

我问林雯，她觉得和这几位朋友的区别在哪。她想了

想说，可能他们家庭幸福，工作过得去，并不想走，可能也想走吧，只是结婚早，也有孩子。“也可能是我足够自私，”她笑了笑，“这没什么不可以说的，人本来就自私。”

从常州到鹤岗，林雯的出走，除了从历史或社会的视角去理解，更重要的还有她的自我寻求——这是后来来到常州的小镇，来到她的家里，走到那栋办公楼下我在思考的——她走出这一步，走向远方，要摆脱的是惯性多么强韧的旧秩序：那座工业园区，办公楼，那些敲打键盘的声音，坐在酒店前台的无数个夜晚，让人冻得哆嗦的冷库，口水鸡，蚕豆，那个没有声音的家庭，那张沙发和沉默寡言的父亲，交易一般的相亲 and 婚姻……她要走出的是整个旧秩序对她的判定和期望。

我想到弗洛姆的那句话：如果我只是我以为别人期望的我，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那“我”是谁？

林雯的行动与脚步正是对此的追问——“我”究竟是谁？“我”究竟希望过上何种生活？

即便如我在鹤岗的所见所闻所识，出走并非终点，远方也并非最终答案。但人们总有越过眼前藩篱的冲动，对自我位置的追问不会停歇。

林雯规划未来，她也许会一直在鹤岗待下去，待到四十岁、五十岁，始终一个人过，如果猫死了，就再养一只。

“什么情况下必须回来？”

“也许只有爸妈走的时候了。”她说。

从洗浴中心出来，雨停了。我们从常州新北区回小镇。江浙沪，中国经济的中心地带。高速路上，她指着路边两栋高楼，这里，那里，都是新建起来的。有一栋楼在黑暗中发出蓝色的光，那些楼像在水里面一样，还有面前这条路，原来是村子，后来拆了，变成医疗器械厂。她小时候和玩伴在马路上玩，到处下雨，路上是泥巴堆成的小山丘，还有水洼，在那些泥泞里，孩子们捡走针头做玩具。

回到小镇，路上是别墅群；三四层楼高，意大利式风情。售楼中心在黑夜中亮着灯，“××镇最后的独栋别墅，尊享美景”。别墅群黑漆漆的，有些亮着灯，我们站在马路上看房子里的人影。

“世界变得真快。”

“但好像这些和我没什么关系。”她又说。

随后一周过得很快。我和林雯一起在镇上四处走。镇子以老街、新街、更新的街来划分。我们先走到老街。她的初中曾经在这里，后来拆掉，搬到新街，老校区荒废了几年，现在是家职业技术学校。老街是曾经小镇的位置。后来拆迁，大家都搬到新街，现在再往北去，又有更新的街，一切都要更快，要更新。

我们一眼就能认出哪里属于老街——那些低矮的楼房，灰色雨水的痕迹，金叶烟酒店，渔具店门口的鱼竿和

鱼饵，街道两侧杂乱的电线。唯一一家影剧院堆放着倾斜的木梯、扫帚、红木桌。老街的边缘地带，景象愈加荒凉。水泥路面裂开了。我们绕了一圈，围着老去的楼，老去的路，老去的人们养的蓝星草。

然后我们来到新街。新街尽头是一个公园。园里的河很深，曾有人淹死在里面。林雯上次到公园是三年前，那时新冠还没有发生，公园只是女人来跳舞的地方。但现在，公园正在举办集会，大大小小的摊贩，卖的还是那些人们能在任何一条步行街上吃到的东西：旋转薯塔、冰淇淋、臭豆腐、肉夹馍、烤冷面。人挤着人。还有碰碰车、气枪、小孩的蹦极、钓鱼、划船、从1连续写到500的游戏。舞台上有人正在表演川剧变脸。“四川的川剧魅力，也是我们中国的川剧魅力。你看看，变脸速度非常快，千万不要眨眼，眼睛眨一眨，老母鸡都能变成唐老鸭。”

人群中有人牵着鹅。绳子绑在鹅的脖子上，男人拽着绳子，将鹅拖走。鹅展开翅膀，脚掌划过粗糙的地面。紧接着又有男人抱着鹅走来。我和林雯走到一个热闹的摊位前。那真热闹，是个支起的大棚，铁丝网将一大群鹅围起来。套圈游戏，奖品不是娃娃、玩偶、恐龙玩具，而是活着的鹅。外侧有许多人。他们手中拿着一摞圈，圈很小，只比手腕粗。每当有人扔出一个圈——铁丝网里白色的鹅们蹲低脑袋，动作齐整，就像一片起伏的海浪。

“你快看。”林雯咯咯笑。她第一次见到套鹅。她打开手机将这一幕拍下来，发抖音。

“你们快看！”她边录边说。

不过人太多了。人群中混杂着汗味。我们看了一会儿套鹅，随后失去了兴趣。我问林雯，能否带我去她的故乡看看——真正意义上的故乡，不是这个崭新的小镇，而是她出生、度过童年、对世界还抱有好奇时的地方。如果那个村子还存在的话。

但那里都被围起来了，林雯说，都是厂子，我们进不去。

存在于林雯记忆中的故乡是什么样子？十二岁以前，2005年以前。那时候她家是个大家族，全家和爷爷奶奶一起住在河边的一间平房。那时候最好吃的东西是妈妈做的拌面。一碗水煮挂面，加一勺豆瓣酱，酱油，放一点糖和辣椒。家里穷，还是吃不饱，她和同村伙伴一起，拿瓷碗的碎片在田埂上生火，烤从田里摘来的东西。秋天，水稻收割后，在田里捡没脱壳的稻谷。把火熄了，稻谷扔在灰烬里，过一会儿就炸开，变成不甜的米花。河边有棵桑葚树，她去摘桑葚，有时在草丛中摘到野草莓。村子边缘还有一排树，树干上黏黏的胶，以为是野果，采完才知道是别人种的桃子。隔壁村的河，水下有菱角。女孩一起去水里捞菱角。有人掉到水里，其余人慌乱找来一根竹竿，将落水的人拉过来。父母争吵时，她来到村子旁边的松树

林，躺在松软的泥地上。

另一个下午，太阳暴晒，林雯同意带我去曾经的故乡看看。她多年未曾回去，我们也做好什么都看不到的打算。离开镇子入口，通过一条土路，车程五分钟，定位的地方就在这里。

现在，我们站在这个装着林雯童年记忆的村子。路的尽头是一道灰色的墙。这道墙沿着河流修建，里面是蓝色铁皮瓦和玻璃建成的厂房。河流里，墙角源源不断地排出污水，黄色的、白色的、绿色的泡沫，反射着彩色的油渍在水面上荡漾开来，还有死掉的水草。通向河道的石板路上只有垃圾。一种不知名的树垂下来像葡萄一样的花叶，招来苍蝇。

“我们的家之前就在那。”她用手指向前方，河流在的地方。河流另一侧，高大的榆树枝叶垂落下来。

村子变成包材厂、干燥厂、科技厂。祖坟迁走了，从村旁迁到更远的山。整座村子被连根拔起，一路都是厂房，灰色的水泥，蓝色的玻璃，红色的砖墙，机器的嗡鸣声，空气中的塑料味。

隔壁村没有被征收，还维持着原来的样子，零星几个老人在喂鸡，犁地。林雯带着我往那里走。那就像是她记忆中的村子：两层高的白色平房，路边有枸杞叶，一些农户种的桃子树、苹果树，结了果，罩住网。在电站，我们走到一个小的开闸处，河水会被抽到坑里，再放掉，留下

草鱼、鲫鱼，她和玩伴一起捉。往下走是另一条河，河旁有一片玉米。一个女人在石砖上淘洗衣服，旁边的孩子挥舞着扫帚。我们站在河边。一丛柳条垂下来。风吹动柳尖，河面生出波纹。

这边一片全都是草，潮湿，虫子就多。小时候这里还有一种紫色花。你看，那些桃子熟了。林雯一样样介绍给我。忽然飞来一只白鸟，翅膀雪白，身体棕色。鸟儿停在水面，嘴巴钻到水下，又抬起头来，不急不缓展开翅膀，离开河流，往远处的树林飞去。那只鸟真是漂亮。

“你看那只鸟。”林雯说，像是想起了些什么，“以前我们这还有白鹭呢。”但此后再没有见过了。

分别时，林雯先下车，在车窗外，她对我笑了笑。下次见面应该是很久以后了，她说。我隔天离开常州。两天后，林雯对我说，她已经打包完所有的行李。她再次坐上了去往鹤岗的火车。

致谢

三年前，当我第一次开始搜索与隐居吧相关的故事时，我并没有想到这会成为一本书。这三年我去了很多地方，一些是隐居者们的所在地，鹤壁、六安、淮南、乳山、廊坊燕郊、万宁、鹤岗，一些是隐居者们的来处，比如常州和大同。一路上我遇到了很多人，与很多人交谈。起初我只是好奇年轻人为什么不工作、不社交、不恋爱，但后来，我的写作动机逐渐转变为另一种好奇：人将会为自己选择何种生活？换言之，人都在为自己选择什么样的存在方式？我想知道“选择”的时刻如何发生，也想知道，在“选择”过后，人们的生活究竟会发生什么变化。

如书中所写，我得到了一些答案，也依然有困惑没有得到解答。

我想首先感谢书中所有受访者，非虚构写作建立在真实的生命经验上，感谢你们慷慨地与我分享了自己的经验和故事。在鹤岗生活时，我得到了很多照顾与善意。

此书出版前，我将书中内容分别分享给了受访者。也应她和他的要求，书中除了李海、郑前、梁云鹏、袁长庚

外，其余人的名字都为化名。

我也得知了书中主要人物的生活近况：左杰在山中待了两年后，因为经济原因离开了山里；杨亮度过了一段在河南鹤壁和上海来回迁徙的生活，如他设想，在上海打工，在鹤壁隐居，不过我最后一次联系他时，他说打算去西藏做光伏生意了，要大干一场；王浩回家照顾父亲，直至父亲离世，随后开始学针灸，想独自开一家推拿按摩店。我在鹤岗认识的人们大多仍在那里继续生活（除了宁夏男人去了越南），女孩A出门旅游了几趟，回到鹤岗。养了六只猫的C也还在。林雯继续开着炸串店，养了第三只猫。男生们照常鹤岗打游戏、炒股、滑雪、养猫。A还对我说，有越来越多的人来鹤岗生活了。

也是在与鹤岗的女生联系时，我们再次谈论起已经离世的王荔。有人给她在河边点了孔明灯，有人说要去大同看她，还有人找出她很久以前的照片发给了我。

是否要完整写下寻找王荔的故事，对此，我犹豫了很长一段时间。

在王荔生前，我曾在一篇报道中写到她去鹤岗生活的故事。她当时说，给陌生人看，她不介意。我因此相信她内心仍然渴望得到理解，渴望着与人交流。当她莫名失踪，我们一起寻找，得知死讯。死因成谜。凭借本能，我找到了她的家人和其他的朋友，每个人都向我诉说了许多，可似乎每个人都并不真正理解她。

为什么？每个人都这样问。

我最后选择将寻找的过程和人们的叙述写下，写下这些碎片，可能与人们给她点孔明灯、写悼文、起初不停地谈论她一样：因为没办法真正理解她的选择，只好自己做些没有意义的事情，来缓解睡前那种一想到死就意味着无的焦虑。

关于死亡，叙述的权力始终在生者身上。我仍然不知道我做的是否正确。

* * *

本书的部分篇章曾发表在《时尚先生 Esquire》杂志。感谢这本杂志提供的帮助。

感谢谢丁老师。是他第一个让我意识到“报道”与“写作”的不同。我开始试着跳脱原来的媒体报道框架，用一种全新的视角看待写作。在写隐居吧相关的内容时，也是谢丁老师第一个意识到这个选题的价值，给予准确的判断，说这可以写成一本书。他的帮助不仅是本书的基础，也真正开始改变了我的写作。

感谢本书的编辑，周劭婷、郑科鹏和毛毛。劭婷和科鹏充满耐心地与我一起重新推翻、梳理本书的结构，反复讨论和修改书中的内容，使之真正具有了一本书的面貌。我很幸运遇到这样尽责的编辑。

在和毛毛沟通时，我第一次阅读了西蒙娜·薇依和弗洛姆，更理解自我和他人的关系，作者与书写对象的关系，不再受困于观念的约束，而是书写更具体的感受。也是他始终提醒我，语言的准确是第一重要的。对此我受益良多。

小张为我设计了令人眼前一亮的封面插画。还有小聂，我的家人刘老师，你们不但给本书提供了建议，也是你们的陪伴帮助我度过精神上痛苦的时候，先是恢复了健康，才有精力和动力写作。感谢我的父母，陈女士和李先生，你们曾教我保持对他人的关心。

如果您读完有什么想法、建议，或者是报道与写作的线索，欢迎联系我：echoliyingdi@gmail.com。

书中的林雯在读完她的故事后说：“就像我从卧室走向客厅的脚步，走了很多年，我可以随便在客厅待多久了。”

本书也献给每一位自觉敏感、脆弱、与外部世界格格不入的人。祝愿每一位读者，你和我，我们都能找到自己的客厅，自己的角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逃走的人 / 李颖迪著. -- 上海 : 文汇出版社,
2024. 8
ISBN 978-7-5496-4264-9

I. ①逃… II. ①李…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2024)第102335号

逃走的人

作 者 / 李颖迪
出版统筹 / 杨静武 郑科鹏
责任编辑 / 何 璟
特邀编辑 / 毛 毛 周劭婷
营销编辑 / 朱雨清 潘佳佳 胡 琛
封面图片 / 张楚婕
装帧设计 / 韩 笑 陈慕阳
内文制作 / 王春雪
出 版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发 行 /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 话 / 010-68423599 邮 箱 / editor@readinglife.com
印刷装订 /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2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2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50×1168 1/32
字 数 / 120 千
印 张 / 7.5

ISBN 978-7-5496-4264-9
定 价 / 59.00 元

敬启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发行方联系。

出版统筹_杨静武 郑科鹏

责任编辑_何 璟

特邀编辑_毛 毛 周劭婷

营销编辑_朱雨清 潘佳佳 胡 琛

封面图片_张楚婕

装帧设计_韩 笑 陈慕阳

内文制作_王春雪